◯ 世界史精览 ◯

铁骑将军克伦威尔

——一波三折的革命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铁骑将军克伦威尔

——一波三折的革命

冯超 赵岩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铁骑将军克伦威尔
冯超　赵岩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2.3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4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5.5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昔日的光彩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什么东西气数已尽的时候，昔日的光彩再盛，也只能给后来者做做陪衬而已，16世纪末的封建英国现在就是这样。

姓别人的姓？你千万别奇怪！

公元1599年4月25日，在英格兰的亨廷顿，罗伯特·克伦威尔的二儿子出世了，取名为：奥利弗·克伦威尔。

亨廷顿位于剑桥的西北面。乌塞河从她身边蜿蜒流过。作为亨廷顿郡的中心，有居民1000～1200人，是个典型的乡下小镇，安静而详和。

乡绅罗伯特·克伦威尔的宅第就坐落在镇旁。罗伯特祖父原名理查·威廉斯，后来，一位叫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亲戚发迹，于是便袭用

了后者的姓氏，改姓克伦威尔。

托马斯是英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本是一个普通的呢绒商，后来成为亨利八世的宠臣。在宗教改革和教会财产世俗化中发了大财，虽然于1540年被处死，但仍留给其后人和亲戚一部分财产，主要是被封寺院的土地。

罗伯特·克伦威尔是这个姓氏的最小支系，只有乡绅称号，所以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出身，充其量不过是个末流贵族。

小奥利弗的啼哭声传遍整个小镇，人们都知道罗伯特家里添了个儿子，却根本不可能想到40年后，他竟然成为英格兰划时代的主宰。

英国的老伊丽莎白并不象中国的武则天或慈禧太后，人家是正宗皇家血统，而且终身独居。

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统治的英王国中，爱尔兰发生了第四次叛乱。就在小奥利弗嗷嗷待哺的时候，女王的宠臣埃塞克斯获准率领一支英格兰大军前往爱尔兰镇压反叛。但他在那里一败涂地。军队损失惨重，而他自己却骑马

逃回伦敦。

他被女王训斥了一顿之后，被关在家里。几个星期之后，埃塞克斯同南安普敦伯爵一同策划了一场阴谋，计划发动政变，进攻白厅，逮捕女王伊丽莎白。

“不幸”的是阴谋未能得逞，埃塞克斯被囚伦敦塔，最终身首异处。南安普敦伯爵保住了性命，正因如此，在其荫下受益的莎士比亚才能继续创作。他的《查理二世》反映了整个阴谋的结局。

面对埃塞克斯的背叛，女王伊丽莎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虽然粉碎了他的阴谋，但是她明显感到她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曾以卓越的文治武功使欧陆国家为之瞠目的伊丽莎白女王却在悲凉凄怆中迎来了她的晚年。她过去的支持者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摆脱她控制的时刻的到来；国会抵制她的特权；人民对若干年前（1588 年）战胜“无敌舰队”的忠王热情逐渐减退，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暮年”的苍老。

1603 年 1 月，伊丽莎白受了一场风寒，一病不起。

3月24日清晨，神圣的光环终于从她头上消失了，伊丽莎白离开了人世。

“伊丽莎白时代”就这样结束了。这个70岁的独身女王作为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选定了侄孙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为英国王位继承人。

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即将开始，而此时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还不满4岁。

作为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大大的脑袋，苏格兰口音，说起话来舌头不是很灵活，细长的身躯，X型的双腿，走起路来有点象要跌倒。据说他从来不洗手，只是用湿手巾擦一擦而已。

1603年4月，詹姆斯春风得意，携妻带子，长长的王家车队从霍利鲁德宫出发，渡过特威特界河，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英格兰。

4月的英国已是阳光明媚、春光满眼了。在欢呼着的人群、大臣的簇拥下，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王家车队，穿过一个个城镇，装满一辆又一辆的大车，一路南下，直奔伦敦。人们争相出来观看这位英格兰的新主人，向他表示热情、友好和敬意。但是，他毕竟是个外族人，统治英格兰

的能力尚待考验。

当詹姆斯骑着骏马，佩着宝剑，踌躇满志地向伦敦行进的时候，他也许未曾想到过，他能否驾驭得了英格兰这艘在海上颠簸得快散了架的巨舰？要知道，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表面上的歌舞升平掩盖不了封建统治末期各种阶级力量的冲突。让我们将詹姆斯的车队暂时定格在前往伦敦的途中，简单回顾一下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詹姆斯后来所做的一系列蠢事。

羊吃人？现在羊的确不吃人了，但照样有人被别的什么猫啊、狗啊的吃掉！

英国在中世纪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到了14世纪时农民还在封建主的压迫下，但到了15世纪末，英国的农奴制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绝大多数的英国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人。

世袭贵族手中有大量土地，但他们自己使用的仅是少部分农村耕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分配给两种农民：世袭领有农和公簿持有农。二者虽然都以货币支付地租，但是却有很大不同。

世袭领有农一般比较自由，对封建主（贵族）依附性小，地位也比公簿持有农高。

公簿持有农是农奴制解体后的一种延生。他们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大，社会地位较低。他们根据庄园法庭的记录簿而使用份地，而死后其子嗣继承份地时，必须向地主交纳“死后税”，如果想要转让土地，也必须交纳“许可税”，这两种税金的多少，完全由地主随意更定，因此，所有的决定权都在封建地主手中。

农村的土地一般被分成条田，互相交错地混杂在一起。各家都有自己的一份。除此以外，还有供全村使用的村社附属地，供每个村民放牧、采石、伐木等。

同时，由于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猛烈增涨，使农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这就加速了农业生产向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步伐。谷物的生产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城市附近，作为农业独立部门的蔬菜栽培和园艺，也越来越兴旺，各种经济作物也得到普遍推广。

这时的英国社会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所谓的“平民”。这只是粗略的分法，事实上，我们很难看出上层自由农和小

贵族的界限。这一时期，中间阶级身份杂陈，过渡环节纵横交错，虽然英国贵族是世袭的，世代相传，但它经常从其他等级得到补充；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贵族世家子弟落入其他等级。

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是英国贵族的最大特点。上至王亲国戚，下有小小乡绅，都不遗余力地从工商业中捞取油水，填满自己的腰包。其中占最多数的是中小贵族，他们从来不曾拥有过足够的封建财产，必须靠从事各种经营来发财，以期提高社会地位。随着许多大的封建贵族没落破产，这个阶层的相当一部人却兴旺发达起来。

这些贵族，虽然基本上仍是地主阶级，但由于受封建传统束缚较少而容易领会经济生活的新需要，因此，他们已经是新的了，他们懂得利用地产牟取高额地租，懂得投资到能带来高收益的工商企业去赚取利润。这一切都说明"新贵族"就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都铎王朝末期，人们已经清楚，英国贵族向往的不是战斗的荣誉，不是骑马佩剑耀武扬威，而是如何才能得到财富。新贵族们急于搜刮公簿持有农，他们提高地租，增加土地由公簿持有

农传给继承人的费用，禁止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放牧等等。总之，“大地主们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地发明压迫公簿持有农的新办法，把地租增加一倍、两倍甚至原来的七倍，在极细小的借口下夺走他们的份地。”

土地革命，一场资本主义关系侵入农村引起的强力夺取土地和破坏农民村社的新过程，就这样在英国开始了，这种革命一开始，就向农民发起了疯狂地进攻。

养羊业在英国的历史可谓长矣。英国羊毛在欧洲市场上一直畅销，是欧洲大陆各地呢绒业原料的主要供应者。早在13世纪，大地主们便已经通过“圈地”来扩大牧场，放养牧羊。到了14、15世纪，英国羊毛越来越受到外国工业的重视，成为不可缺少的贵重原料。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大陆诸国出现的呢绒工业蓬勃发展起来，羊毛价格急剧上涨，养羊成了比农业更加赚钱的买卖，而且成本低，收效快。

有世袭土地的贵族和乡绅变成了养羊户，只要有土地的地方，人们都改去养羊。但养羊所需要的土地比农业所需的土地多得多，贵族、乡

绅们纷纷攫取原来属于村社的牧场、草地、甚至荒地，用篱笆圈起来，拆屋毁林，将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大量农民失去了牧场和土地，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和依靠，农户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资料表明，仅1597～1607的10年间，被圈占的土地面积占最近50年圈地总面积的40%以上。从1578年到1607年，被圈占土地共达68758英亩，拆毁农舍549家。这仅是官方资料，事实远不止于此。难怪托马斯·莫尔写道："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善，吃一点就满足，现在却变成十分贪婪凶猛，甚至要把人吃掉，……"

这就是17世纪初英国农村的基本状况，经济基础决定相应的意识形态，而此时英国的社会政治却远非阶级的粗略划分那样简单，宗教对立斗争更是矛盾的焦点。

在清教徒那里，打扑克仍是"罪恶行为"，但有一天当他们听说：上帝本人也耐不住寂寞，不知会有何感想。

都铎王朝末期，在英国开展了一场广泛的

宗教政治运动，称为清教运动。清教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purus，意为清洁的。16世纪中叶，爆发了不彻底的宗教改革，虽然否定了一部分国教的权限，没收了一批大寺院的地产，但仍保留了很多原国教会中和天主教会中的东西。包括清教徒最为不满和愤恨的天主教教义和仪式，他们认为，主教制的英国国教介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同时批评国教教会已经成为政府的附庸，并日益腐化堕落。

整个社会激烈地辩论着国内宗教与罗马教庭的关系，国教会与君主的关系，修道院的财产问题等等。在国会内，清教徒形成了反对派，不停地抨击国教，形成了强大的力量。

清教徒根据加尔文的理想，痛斥了旧的封建世界那种“道德败坏”、“放荡不羁”、“懒惰浪费”的享乐主义，提出了“虔诚的、严肃的、勤劳的生活理想，认为禁欲、戒酒、节俭和积蓄是最大的美德”。

同时，清教徒是宗教的狂信者，他们认为自己天生“优越和正确”，他们看不起穷人，为自己的发财致富不择手段；他们清楚地知道，要想在大量世袭贵族存在的条件下，提高社会地位

而更接近王宫，必须有足够的金钱作为后盾。他们主张一切从俭，无限止地积累财富。他们整天穿着用粗布制作的黑袍，不苟言笑，勤奋得要命，同那些衣着绸缎、放荡无束的贵族形成鲜明的对比。

清教运动不单纯是为了英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而要求改组教会的一种宗教运动，它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思想体系的，他们具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这客观上与一定的政治目的相呼应。清教在当时并不是大多数居民的宗教，但它在行动和结果上有助于新兴阶级组织起来反对专制制度。

对于清教内部，在16世纪后期，在新的教会组织形式问题上，分裂成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有长老派和独立派。

长老派是最富有的一部分清教徒，即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相当富裕的新贵族的代表。他们认为教会应采取严格的加尔文教组织形式。他们不承认上面任命的主教而拥护长老在教会中起的重要作用。这些长老是从世俗人物中选出的特殊人士，由他们组成集团，负责领导加尔文教团的主要事务。长老派一致认为：教会应脱

离国家政权，获得独立地位；定期召开全国的宗教会议；废除现行国教中所保留的天主教仪式等……，不难看出，这时的清教内部，已经初步具备了重要的民主氛围。

长老派对国家贵族式的英国教会进行猛烈的批判，但同时他们又看不起那些比较激进的带有极强民主倾向的清教派。它本质上是用一种新的权威——长老会和宗教会议来取代另一种权威——主教。

独立派作为清教中另一大派别，是稍后于长老派而形成的。他们认为每一个教团都享有充分独立的自主权，不受国家政权和某些总教会权力的干涉。同时独立派认为祈祷应当是从内心发出的，是绝对自由的，不应当拘泥于强制的固定形式，主张自由地理解圣经。

独立派在组织上分为许多小教派，极端分散。从城市中的中、小资产者到贵族、乡绅及至农民都是不同独立派的成员。因此，它是个十分复杂的宗教派别。但总的来说，这些清教信徒比长老派更为激进，主张民主的愿望也更强。

清教徒的不断扩大和流行，直接威胁到了“王权”。因此，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曾致信詹

姆斯，当时他还是苏格兰国王，告诫他说："我想提醒您：一个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新教派已经在你和我的国家中出现了。他们根本不要国王，只要长老；他们力图在上帝言辞的掩盖下篡夺我们的王位，否定我们的权力，应当特别当心这个教派。"伊丽莎白的担心并非多余。她自己对清教徒进行了大肆的迫害，使许多清教徒坐牢，被绞死或远走他乡。

苏格兰的詹姆斯听从了伊丽莎白的劝告，在他入主英格兰之后，对清教徒的迫害变本加厉。但他只不过是个螳臂挡车的小丑而已，他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清教的帷幔中逐渐酝酿成熟，最终将高举清教旗帜，而同封建王权斗争到底。

克伦威尔是查理的克星，这一点早就定了，因为三岁的未来英王同四岁的克伦威尔在第一次抓扯中鼻破血出，败下阵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詹姆斯的旅途上来吧！

他的下一站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小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同名伯父——的赫琴布鲁克

城堡。那里将举行迎接国王的盛大庆典。这将为一度黯然失色的克伦威尔家族带来莫大的荣光。

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国王驾到"，众宾客在老奥利弗的带领下迎出城堡，号乐声大作，人们纷纷跪下来向国王表示尊敬。

宴会开始了，在国王的带领下，宾客们开怀畅饮。大厅一角宾客席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老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弟弟们。有刚从印度回来的亨利·克伦威尔，他在海外淘金发了大财，刚刚被选为议员。在亨利身边，则正是亨廷顿的罗伯特·克伦威尔，带着他的儿子小奥利弗·克伦威尔。

传说在宴会中，4 岁的小奥利弗遇到了詹姆斯的王子，年仅 3 岁的未来英王查理，本来在一起玩，后来撕打起来，把查理抓得鼻破血流。

盛宴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国王册封老奥利弗·克伦威尔为骑士，并给他系上佩剑。克伦威尔家的荣光达到了顶点，而老奥利弗则把自己的纯种阿拉伯跑马和一群上等猎狗及一些细软赠给了国王。

国王上路了，他将在伦敦举行加冕仪式。宾

客们四散回家，罗伯特又回到亨廷顿去做他的啤酒生意，照看他的田庄，当然带回他的小儿子奥利弗。

国王去了伦敦，谁知道将来会怎样！人们依旧过着同以前一样的生活。罗伯特家作为清教的信徒，照例每星期日带上小奥利弗去教堂，午饭后，进行枯燥而冗长的祈祷。对小奥利弗来说，这一切是那么难以理解，但他那幼小的心灵，却已经深深受到了清教的熏陶。

这时，我们的詹姆斯国王已经到达伦敦。臣民们自然少不了一番欢迎。举国上下似乎都在欢呼新王的到来。1603 年 7 月 25 日，在伦敦斯敏斯特国会大厦的教堂内，新王举行了加冕典礼。据说当天，天不作美，阴云密布，细雨不停，典礼结束后，贵族大臣们纷纷返回，连新王登基时例行的国会也未能召开。

詹姆斯对国会大言不惭地说："国王产生于法律之前。"

詹姆斯登上了英国国王的宝座，史称詹姆斯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就这样开始了。随着新王

登基，一场国王同清教和议会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詹姆斯一世是个认定君权至上理论的狂徒。早在1598年，他就曾写过两篇举世瞩目的论文：《国王的天赋能力》和《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虽然这两篇论文是他的意大利秘书阿贝里科·詹蒂利代其所作，但他的专制思想已经暴露无遗。文中写道：“在等级制度产生，国会建立和法律颁布之前，国王就已经存在。是国王在贵族之间分配土地，划分设置各种等级，并且建立政府机构，”因此，“是国王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国王。”

他在前往伦敦途中曾抓获一个小偷，未经审讯凭他一句话就要把这个小偷绞死。当然这个命令没有得到执行，却充分暴露了詹姆斯国王对英格兰法律的无知。

在英格兰，议会是国家机器的中枢。从亨利三世时期产生的雏形发展至都铎王朝，在法律、经济、宗教等社会各个方面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格兰人民富于民主传统，议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正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詹姆斯一世现在所面临的议会可分为上、

下两院。

贵族勋爵们在上院，多数为大封建主或世袭的议员。但也有少部分受到特别重用或奖赏的人进入上院。主教作为宗教代表理所当然是上院议员。当时的英国上院同今天的上院不同，他们拥有很大权力，主要是讨论通过或否决下院提出的议案。

而下院则人数众多，其中贵族较少，一般是城镇中被选出的代表。而那些享有选举权的人是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的，有明确规定为年收入不下两镑的世袭份地领有者，或城市中十分富裕的工商业资产者。因此，在当时的英国议会，即使在人员庞杂的下院，也很难找到自耕农和手工业工人。

作为地方各级机关，英国的乡绅制可谓独特。他们不领王家薪水，无报酬地执行法院和警察的全部职能，因此，他们有控制当地居民的巨大权力。各级行政长官均由本地区内的贵族担任，他们由国王任命，逐年更换。

这样，作为国王，他的权威在上要受到议会的制约，在下则分散为各领地的贵族所有。君主要执行新政策必须经下院批准，贵族支持才能

行得通；同时，要维持皇家每年的巨大开支，国王只有召开国会，通过国会募集款项或增加税金。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也大大削弱了国王的特权。

按詹姆斯一世的理论，他要强化王权，就必须压制国会的力量，甚至取消下院的立法权，从而否定国会对王权的任何限制。但他上台后遇到的问题却绝不仅于此。

詹姆斯在苏格兰的时候，是在苏格兰长老派的教养下长大的，因此，他是个清教徒。但是，事实上他极端痛恨苏格兰加尔文教士们的反专制情绪。他认为臣民们没有理由同国王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他曾因为一位清教士在同他争辩时抓住他胸衣不放而大为光火。詹姆斯清楚地看到了在清教背后鲜明的政治目的，因此，在他心里，老早就想借国教之手，清理清教，现在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

他刚到伦敦不久，就收到了一份由1000多名清教教士和世俗人士签名的请愿书。按照国内清教士的想法，作为清教信徒的国王理应支持他们，并期望通过国王来改善他们的地位。因此，在千人请愿书中向国王要求改革国教，如：

洗礼时不用在受礼者头上划十字；举行婚礼时不必由牧师给新婚者戴上戒指；允许牧师在讲道时不穿白色法衣；不要求信徒在听到主基督名字时就下跪；坚持安息日子应停止工作；缩短圣仪时间；坚持振礼必须废除等等……，他们还提出由居住本教区的长老担任圣职，主教不能靠领受圣职俸禄生活，不能随便将人开除教籍。这一切都反映了清教徒对国教的繁文缛节、浪费及对神职人员的剥削的不满。

遗憾的是，新国王对他们的提议并不热心。1604 年在伦敦西郊汉普顿宫的教堂内詹姆斯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由两个教派的代表参加。代表国教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格夫特、代表主教班克罗夫特，以及大约 15 名高级教士和神职人员，代表清教的是由国王遴选的以雷诺兹为首的 4 名教士。

会议的第一天，詹姆斯单独召见了那些原来忧心忡忡的国教代表，向他们表明，他不想对国教进行任何改革，国教的教规和教义是神圣的，不能更改的。

清教徒们被国王出卖了，会议第二天，清教士的提议和改革均遭到了国王的驳斥。清教教

士在失望之余，提出把改革国教的问题交给牧师们去讨论决定。詹姆斯对此大为光火："他们要一个长老会制的教会，这是与君主政治势不两立的，正如魔鬼与上帝势不两立一样。"

就这样，清教教徒们遭到了灭顶之灾。

会后不久，国王把10名请愿书的呈递者监禁了起来，理由是维护社会安定，防止引起叛乱。3月15日，国王颁布了新法，对不从国教者予以严惩。许多清教士被投进监狱，没收田产，数百名牧师和教区长老被赶出领地，远走海外。

詹姆斯相当清楚，在清教组织和讲坛上所发起的对政府的公开议论和抨击中，蕴含着一种威胁他王位的民主体制，他曾摧毁苏格兰的主教这一国教权威，而在宗教改革背后，也正深深埋藏着对封建专制的不满和反抗，其目标当然是世俗界权威——国王。因此，詹姆斯为巩固王权，达到专制，必须消灭清教势力。这就必然使后来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有以清教反国教的色彩。

处理了清教，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国会。

詹姆斯一向认为：议会不能享有立法权。只

有得到国王的批准，议会才可以颁布法律。他极力宣扬：王权神授，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君主是上帝的化身……除了上帝之外，谁还能作国王及其臣民之间的裁判官呢?”国王可以不受国家任何法律的约束，因为国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法律不是源于上帝而是源于世俗的人，因此，国王高于法律；国王只对上帝负责，而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王，否则便是大逆不道。

在第一届国会上他说：“议论上帝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亵渎神明；议论君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大逆不道。我不允许议论我的政权。君主制度是地球上最高级的制度，君主是上帝的全权代表。他们坐在上帝的宝座上，上帝本人也称他们为上帝。”同时，詹姆斯一世一再声称，他是以最大的耐心容忍英国议会，议会的使命只限于向国王禀告自己的愿望。“我对我的祖先准许建立这样的机构感到惊讶，我来到英国时，它已是既成事实。我不得不容忍这个怎么也摆脱不掉的事实。”

面对国王的狂妄，国会作出了反应。1604 年有人提出警告：“假若有人使陛下深信英国国王

本身有什么绝对权力，或者国王可以擅自修改国家现行法律，这就会使陛下陷入错误之中。”同时，下院坚持它所拥有的各项权力，并以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抗衡。

詹姆斯一世所继承的英格兰国库已十分空虚，加上国王本人挥霍浪费，詹姆斯已陷入了紧张的财政处境之中。

议会刚刚召开，国王便开口要求议会集资补助。而下议院则抓住这个时机，大肆指责国王登位后的一系列错误。国王于是又抬出臣下不能指责国王的盾牌。但毕竟，只要詹姆斯还在独断专行，只要下院的目的没有达到，议会是绝对不会为国王征收一分钱的。

双方僵持不下。詹姆斯要么低头承认议会的立法权和地位，要么同议会顽抗到底。而下院则建议以补助金的名义，每年给予国王 20 万英镑，但交换的条件是国王放弃封建监护权，停征一部分苛捐杂税。

詹姆斯没有同意，因为他觉得不上算，并且因为议会的顶撞而气恼。他终于铤而走险，未经议会许可而向国民征收新税。议会立刻提出强烈抗议，而詹姆斯则狂叫道：“既然法国、丹麦的

国王都能征税，为什么我不能呢？”

就这样，1604 年召集的议会在争吵中，断断续续地一直开到 1611 年。议会曾提交国王一份特别的《下院陈情书》指出：詹姆斯一世对“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的不够正确。国王并没有绝对的权力，他应尊重议会的立法权，这作为英国人民的天赋特权是不受国王干涉的。如果认为议会的特权，特别是下院的特权是出自于国王的恩赐，而不是根据权利取得的，那就是天大的误解。正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从我们的祖先继承下来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一样，我们是从我们祖先继承下来的这项权力。”

同时，议会中的法学家声称，捐税权属于最高权力，只能由国王在议会中行使。

但詹姆斯根本不理这一套，为满足自己的花销，除了非法征税外，还在国内出售一些商品的专卖权。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的极大愤怒。一时间，肥皂、明矾、煤炭、食盐、纸张、皮革、玻璃、啤酒等商品都因实行专卖而大幅度上涨。据统计，专卖每年给国王带来 7～8 万镑的收入，而民众却要为此多付出 20～30 万镑。

1609 年，议会忍无可忍地提出反专卖的抗

议，1611年要求废止一切未经下院批准而由国王私自征收的捐税。但詹姆斯冷笑几声，拂袖而去。

1614年议会是在1611年间断近4年后召开的。但只开了两个月。会中下院议员再次要求国王不得征收一切未经议会批准的捐税。詹姆斯对反对派的发言非常愤怒，竟下令烧毁议会就征税问题提交给他的备忘录，甚至将几个言词激烈的议员投进伦敦塔。

詹姆斯凶相毕露，此后的七年中没有召开议会，一切都以国王的个人意志为准。这期间由于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詹姆斯出售了更多的特许专卖证。同时，卖官鬻爵之风盛行，男爵一千镑，伯爵二万镑。封得最多的要算骑士，想不要都不行。至于盗窃公款、接受贿赂，钻营舞弊者更是比比皆是，一时朝野之间一片乌烟瘴气。

七岁的克伦威尔稀里糊涂地被一个半神半鬼的家伙告知："你将成为伟人。"

就在詹姆斯国王在伦敦胡作非为同议会争权夺利时，亨廷顿的罗伯特·克伦威尔一家却

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小奥利弗被送进镇上唯一的一座小学，由于他的兄弟都过早夭折，所以他成了全家的希望。

在学校里，小奥利弗受到的是完全清教气氛的教育。他的老师比尔德就是该地区十分著名的清教士。小学的启蒙教育尽是一些有关阴间及地狱如何可怕，不许唱歌跳舞，及严守教规等。小克伦威尔生性活泼、聪明，不愿受太多的约束，于是经常被老师苛以体罚。传说有一天七岁的克伦威尔在黄昏中玩耍，忽然看见暮色中有一双火红的眼睛盯着他，他并没有害怕，却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你将成为伟人。"

童年的时光是短暂而容易令人淡忘的，1614 年 4 月罗伯特把他 17 岁的儿子奥利弗·克伦威尔送进剑桥大学这个古老的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克伦威尔的青年时代。

第二章　俩对手的成长

这几年，决定英国历史的两个家伙都已长大成人，如果不是历史的决择，他们俩很可能于某一天见上一面，然后都被对方超人的气质所吸引，进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们各走各的路，而最终成了死敌。

在英国，早在17世纪象克伦威尔这样出身的人都能进入高等学府学习。

1616年，17岁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就读于剑桥学院。他父亲把他托付给塞缪尔·沃尔德博士，一位虔诚的清教徒。克伦威尔在学院学习的课程很多，除必修的神学外，还有几何，算术，修辞，逻辑，及拉丁语、希腊语等。据说他的功

课并不十分优异，读书也不十分刻苦，更没有显露出他军事方面的天份。那时，他毕竟还是个大孩子。

但是，他在乡下就特别喜欢骑马打猎。到大学后十分喜欢游泳、球、射箭、击剑等运动。尤其是骑术，堪称一绝，令他身边的人大为敬佩。喜动不喜静，喜欢冒险刺激，这显示出他巨大的潜在精力和活跃的头脑。这里我们虽还看不出他成为伟人的痕迹，却已能隐约觉察到那个驰骋疆场的将军的轮廓了。

大学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那些深居在剑桥学府的博学的知识分子，浓厚的学术气氛使他获益匪浅。他掌握了相当广博的知识，至少在历史方面是如此。后来，他曾教导儿子读他推荐的雷利的《历史》一书，并说："该书对历史的叙述具有连贯性，它比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作品对你有益得多。"

1617 年夏，小镇亨廷顿上又出现了克伦威尔那策马急驰，灵活结实的身影。父亲忽然亡故，使克伦威尔不得不中止学业，回到家帮助他母亲料理农庄，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勤勉、谦逊、能干，加上有丰富的知识，使

他深受小镇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帮助母亲照顾家中的生意还是管理农庄，一切都做得条理分明。

作为地方乡绅和农庄主，不懂法是不行的。1619 年，他前往伦敦去学习法律。

兴致冲冲地疾驰在前往伦敦的土道上，克伦威尔思绪飞扬：现在的伦敦是个什么样子呢？要知道，此时的英国比 20 年前，无论工业，商业，贸易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17 世纪，英国人冶铁技术同中国千把年前差不多，但 50 多年后，就大不一样了。

本来英国工业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已经打下十分雄厚的基础。进入 17 世纪后，仍然继续高涨。随着新技术、新发明的不断出现应用和推广，生产力获得迅速更新。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工业生产劳动中已经开始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并使之日益趋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呢绒制造业作为 16～17 世纪期间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西南地区。1607 年颁行的呢绒制造条例，大致说明了英国各地呢绒工

业的发展情况。当时，英国西南地区几乎能制造市场上所需的所有种类的呢绒产品。主要向尼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输出。而东北的呢绒则远销波兰和俄国。

市场的扩大，产品的增加，使分散的个体操作满足不了需要，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纷纷出现。威尔特郡有个克利斯托弗·波蒂克恩，他的工厂里有近1000名纺工，织工。伦敦的商人萨莫尔则用了几千名工人在一些羊毛工业工场里做工，并将这些工场的产品销往海外。

同呢绒业并行的还有炼铁和采矿业。

英国的炼铁业很早就有，多塞特·威尔特、萨默塞特、格洛斯特等郡都有铁矿、煤矿和森林。但作为炼铁重镇，首推格洛斯特郡的迪恩森林区。要知道，在十六、十七世纪，人们从铁矿石中提取铁所用的燃料是木材，因此，这种工业吞没了大量的林木。大规模用煤炼铁是18世纪的事。

当时英国铁的采矿和就地冶炼仍带有小生产的性质，但在配有手工机械的锻铁场里，工人之间已经有了劳动分工。如有些人专司铸工，有

人搬运矿石，有些人专门负责装卸，还有专职的烧炭工，专门为这些小工场供应木炭。这说明在炼铁工业中，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工场手工业。

同样，煤矿工业在英国的经济生活中已起着重要的作用。17世纪，煤已经成为伦敦通用的燃料，而代替英国越来越缺的木柴。在北方的诺森伯兰郡泰恩河的纽卡斯尔附近，煤的开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里的煤是由"自由矿工"采掘的，但许多矿工把自己的采矿权卖与一些不从事专业采矿的人，这些人又转手卖给另外一些拥有资本的人。这样使矿物开采日益集中、强大。

风泵排除矿井内积水，使采矿更进一步，鼓风箱的改进，大大提高了炼铁的质量与产量。这时在英国工场手工业从事工作的，不仅有城市中的工匠、帮工、学徒和工人，还有英国西南部和东部农村的居民，这些农民在农庄中从事分散的工场手工业。

大量工业、半工业人口的存在是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条件。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在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下应运而

生的商人、贸易家。

要不是倒霉的哥伦布，"弗吉尼亚"也许仍就是个"处女"，但后来到底让英国人给弄到了手，结果成了个腰缠万贯的富婆。

英国的对外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进入斯图亚特王朝后更是蓬勃发展。西欧、东欧、北非、西亚、印度、美洲，到处都可看到英国商人。

地理大发现使作为欧洲边陲之地的英国一跃成为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并很快发展成为四通八达、客商云集的世界商品集散地。

但是，海上运输风险极大，因为西班牙的海盗们经常袭击截持英国商船。1588 年在海上运输争夺战中，英国成功地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控制了制海权，为英国的对外贸易打开了门户，确立了保障。于是商业冒险家们纷纷开始了他们的"海上事业"。

1606 年，一批投机商得到国王的特许，成立了弗吉尼亚公司。在黑克卢伊特等专家共同研究之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殖民计划。1607 年 5 月，头一批几百人在弗吉尼亚海岸切萨皮克湾

詹姆斯敦定居下来。土耳其战争中的军事冒险家约翰·史密斯成为这小块殖民地的总督，实行着严厉的统治。据说他在当地曾被印第安人所擒，几乎丢了性命。后来，由于博得印第安首领女儿的钟情，才免于一死。

这些人在弗吉尼亚，当时的伦敦政府根本控制不了他们，那里的管理工作十分混乱。在新乐园面前，人们的目标分散：当局希望向外殖民，以减轻国内的负担，而商人们则希望在北美沿海发展渔业，还有的则希望从那里得到原料，以减少对外依赖。但在弗吉尼亚，他们找到的宝贝不是别的，而是烟草。

当时，西班牙人已经将烟草带入了欧洲，吸烟习惯迅速扩散，英国及欧洲对烟草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有人偶然种了一次烟草，结果获得意外的好收成。这样，小农田被人收买成为大种植园，弗吉尼亚的第一季烟草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就这样，这个殖民地开始了自力更生，随着不断发展和繁荣，开始形成了象母国那样的社会，出现了庄园。庄园主则相当于国内的乡绅。

英国在海外商业冒险取得成功的绝不止弗

吉尼亚一家。

早在1553年，英国船长钱斯勒就到达北德维河口，于1554年建立了莫斯科公司。其后，1575年建立了摩洛哥公司；1579年成立了控制波罗的海沿岸贸易的东陆公司；1581年成立了与地中海的一些国家进行贸易的近东公司；1588年成立了垄断非洲西岸贸易的几内亚公司。

1600年最有名的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来了，它拥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诸国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可称得上是新世代的宠儿，到1617年已拥有股东9514人，资本1629000英磅。

这些公司的利润是令人眼红的。国王也乐于批准这些公司的成立，因为不仅可以通过颁发特许证而使国库获得大宗收益，同时，宫廷还可以无偿地得到一部分公司的股票，每年坐收红利。

无疑，殖民贸易的巨额利润，使伦敦商业区的贸易巨头们积累了大量资本。这给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客观上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年轻的克伦威尔似乎注定与权贵无缘，只娶了一个小皮货商家的勤劳肯干的女人为妻。

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伦敦。

作为英国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在17世纪已显示出大都市的繁华。这里居住着20万人，这在当时世界各国首都已经是相当多了。

泰晤士河从市区中间缓缓流过，每天早晨初升的太阳隔着浓浓的雾照过来，阳光懒洋洋地泻在河面，岸上尖顶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刺向天空，悠扬的钟声从教堂的高塔中传来，缓缓地漂荡在城区上空。

太阳越来越高，街头上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行色匆匆，衣着朴素，一望便知是去赶着做工。也有的身着华服，悠哉悠哉的贵族，或骑马，或乘车，去寻亲访友。

人流慢慢汇集到伦敦桥上。这里人头攒动，小贩们的叫卖声，卖艺人的吼叫声，车马的嘈杂声响成一片。

人群中有一位20岁左右，宽肩阔背的青年，宽宽的前额，机敏的双眼，紧闭的嘴角给人

以刚毅之感。一身粗布衣服，略微矜持的表情，一望便知是个乡村绅士。他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同那些华服放荡的纨绔子弟相比，克伦威尔同这座城市似乎很不相称。在伦敦期间，他经常在早晨上码头那儿，听人们谈论政治和新闻。

伦敦的码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繁忙的码头，每天有无数只大大小小的船从世界各地抵达这里，同时也有无数只船从这里前往各地。

就在这里英国商人把羊毛、粗呢绒、啤酒输往尼德兰和德国北部各城市，并从那里运回夏布、铜制品和服饰品。

把蜂蜡、脂油、黄油、干酪、小麦、黑麦、大豆、蜡烛、皮革运往法国，并从那里运回葡萄酒、松香、树胶；

把粗毛织品、皮革、小麦、黄油、干酪运到西班牙，并从那里运回橙子、柠檬、胡桃和铁；

把细毛织品、铅、锡、皮革运往里斯本，并从那里运回植物油、肥皂、香料；

把布匹和服饰品、皮革、干鱼和加工过的锡送到近东，并从那里获得各种丝和棉花、植物油、明矾和磷；

把粗毛织品、酒、盐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并

从那里运出亚麻、大麻、云母、蜂蜡及毛皮。

当然还有北美的烟草，矿石和金银及印度的丝和香料。

从上述如此繁杂的商品中，人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英格兰人几乎在贩运着一切可以赚钱的东西。水手们从海上带来了堆积如山的货物，各种走俏的商品，急缺的原料，同时，也带来了海外的新闻。

码头上的人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大声谈笑，有的交头接耳。他们也许在谈论着海上的奇异经历，也许在议论行情的涨落，也许在向别人透露某位贵族的风流韵事。偶有一两位神秘地宣布国王要采取哪些哪些新政策；德国新教对天主教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或者告诫人们千万别再做粗毛生意了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这里几乎就是伦敦的信息中心，克伦威尔经常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述，许多事使他大开眼界，耳目一新。尤其是战争的新发展和人们对战况的分析议论，更对他的胃口。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620 年 8 月 22 日，21 岁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娶了一个伦敦皮货商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她比克伦威尔大 1

岁。

离开伦敦，克伦威尔回到乡下。这时英国农村正处于萧条时期，小麦价格下跌，而且收成不好，地租大大降低，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作为地方小乡绅的克伦威尔一家。

克伦威尔只有两英亩牧场，四英亩草地和数量不多的耕地。虽然他继承了每年收入为三百镑的父亲的田庄，但他还要照养他的母亲、妻子和相继出生的儿子们，而且他必须为四个妹妹分出一部分作嫁妆，因此，这剩下的收入对于一个小乡绅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坏消息不断传来，克伦威尔家族最富有的代表，赫琴布鲁克的主人——老奥利弗破产了。他不得不贱价卖去了他的豪华邸院，到僻处沼地的村舍中去度他的残年。

在那困难的时日中，年轻的克伦威尔一天忙到晚，农庄的大小事务都落在他的肩上，他必须亲自过问农庄的各种琐事。每天早上他都得骑上马去田间察看庄稼和草地上放养的牛，羊；去听听份地领有农的诉苦；去催促别的农户交租；查阅自家的帐目，量入为出。

时光就这样过去了，但纷乱的农庄和家庭

杂事并未压垮他，他照样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喜欢在乡间纵马奔驰，喜欢提起猎枪一连几天出去打猎，或经常出现在镇上的小酒馆狂饮。当然，他也仍旧保持着特有的政治上的机敏和热情。

年轻浪漫的查理王子在回家的路上一见倾心于一位法国公主，使这个女人多少在英国历史上也有那么一笔。

克伦威尔在亨廷顿过着紧张而潇洒的田园生活，而伦敦的詹姆斯一世却已经走进他昏庸统治的末期。

1621年，中止了7年的议会重新召开。詹姆斯实在出于无奈，内忧外患，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国会。但议会刚一开幕，议员们就对国王出现大量专利权表示不满，议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处理了一些大发横财的令人痛恨的专卖商，议会司法权也得到了恢复。同时，对幕后那些支持并签发专利特许证的国家大臣进行了追究，许多人因受贿而被撤职。其中包括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大法官兼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议会还指责了国王詹姆斯的对外政策。本来，自伊丽莎白政府实行的是彻底的反西班牙和反天主教的政策。这对英国资产阶级发展十分有利。但詹姆斯继位后，却宣布同西班牙处于非交战状态。因为自1588年海战后，双方一直敌对，而今詹姆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同西班牙接近。

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詹姆斯也被卷入其中。他的女婿、德意志新教的领袖腓特烈自白山战役失败后，处境十分悲惨，作为新教国家的国王和腓特烈岳父的詹姆斯，本来应当极力支持德意志新教反抗哈布斯堡家族，为此，议会于1621年春拨给他70万镑的巨款，但是詹姆斯却背着议会暗中实行着一项异想天开的计划：同天主教国家西班牙结盟，并通过西班牙来解救腓特烈。为此他想让王储查理与西班牙公主结婚。

1621年冬季议会就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议员们认为同西班牙接近十分危险，王储查理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后果将不堪设想。12月3日，下院递交一份请愿书，大骂西班牙国王，并把同西班牙亲善的全部计划称之为教皇主义施展的恶毒诡计。下院断然反对

王储与西班牙的婚事，并希望“亲王及时地和幸福地同一位信仰我们自己的宗教（新教而非天主教）的公主结婚。”

詹姆斯火了，他反对议会干涉“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并绝对不许议会谈论王储同西班牙公主的联姻问题。”双方争执不下，当议会于12月18日仍然根据自己的特权就这一问题讨论并表决时，詹姆斯解散了议会。12月30日，他亲自来到议会，撕下了议会记录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的一页。随后又逮捕了几名带头不服的议员。

没人再敢反抗国王，没人再敢指责他的政策，于是詹姆斯便加紧了同西班牙的联络。

1623年，在国王的授意下，王储查理在国王的宠臣白金汉公爵的陪同下，进行了一次浪漫的旅行，去马德里相亲。

白金汉公爵何许人也?

自从詹姆斯的得力贤臣罗伯特·西塞尔去世后，一个名叫乔治·维利尔斯的青年，走进了英国王宫。他就是后来的白金汉公爵。

乔治1592年生于莱斯特郡的布鲁斯贝，其父是郡长。他年青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法国完

成学业后，1610 年被引见给詹姆斯一世。乔治仪表堂堂，聪明伶俐，放荡不羁，具有“傲慢气质和纵情的慷慨”，深得国王宠爱。他很快成为宫里的实力人物，并同威尔士亲王查理王子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友情。

1623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两个年轻人带着 3 个仆从，从伦敦向南部的肯特郡奔去。这两个人化名约翰·史密斯和托马斯·史密斯的正是王储查理和白金汉公爵。他们中途混过盘查，顺利地在多佛港渡海踏上欧洲大陆，奔向西班牙。

3 月 7 日，经过 11 天的奔波，二人到达了马德里，直奔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迪格比的官邸，一行人隐密地住进这里。

第二天，3 月 8 日，白金汉公爵由大使陪同，来到马德里王宫，秘密拜见菲利普四世，说明来意。

这位西班牙国王吃了一惊，要知道，当时的西班牙王族是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又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主要支柱，而查理王子则是信奉新教的人，同他联姻，无疑会开罪于罗马教皇。同时，查理是腓特烈的大舅哥，腓特烈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死对头，菲利普四世怎么敢轻

易将公主嫁给他呢?

但是,查理作为未来的英格兰之王,亲自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这面子太大了,菲利普并不是惧怕英格兰的势力,但如果简单的回绝,则一定处于被动,思前想后,他决定打一场消耗战。

国王接见了白金汉公爵后,立刻前去看望查理王子,并把他安顿在一幢精致的住宅里,送去最好的家具,选用最优秀的仆人,让其随意使用。然后,又安排了隆重的仪式,正式接见王子查理。当王子要求见一见公主时,菲利普四世就安排了一次王室成员的盛大郊游,让查理有机会一睹公主的迷人娇容。

西班牙国王尽心尽意地款待王子和公爵,不断大排延宴,安排庆典、娱乐、舞会、打猎,使王子不亦乐乎。但一涉及具体的谈判和商议条件,菲利普请了几个神学家,从宗教角度反复刁难。查理和白金汉公爵一再退让,保证英国不会破坏天主教徒,同意改变对罗马教庭的态度,甚至远在伦敦的詹姆斯国王也至函准许公主及其侍从到英国后,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并答应王后的孩子可以接受天主教教育。

但半年时间过去了,查理的希望渐渐破灭

了，他看出对方缺乏诚意。欧洲战场上天主教军队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形势对查理越来越不利。双方最后终于摊牌。

查理强烈要求西班牙政府出面，对旧教联盟的首领德意志皇帝予以有力干涉。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西班牙国王从来不为反对德意志帝国的君侯而作战……我们不能反对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如果你们坚持这样，"查理回答说，"那一切就到此结束。"

就这样，历时7个月的谈判终于破裂，查理王子和白金汉公爵垂头丧气地回到伦敦。

查理乔装西班牙联姻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国，人们纷纷为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的破产而欢呼。在伦敦，人们敲起了钟，点起了篝火，街头巷尾一片喜悦。

联姻的失败使詹姆斯醒悟，而英国国内各界纷纷要求对抗西班牙，如有必要，不惜一战。

白金汉公爵也因此次失利而脸上无光，他知道事情不妙，从联姻派变成主战派，鼓动如簧之舌，极力说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国王，同时骗取了国会和人民的支持，邀请上、下两院发表意

见，最后得出结论：如果继续同西班牙谈判有损国王的尊严，违背人民利益，……应当采取一定措施。于是国会便为即将来临的战争筹集资金。好一个白金汉公爵，就在这种紧要关头，还不忘利用在国会所受的支持打跨了他的政敌，财政大臣克兰菲尔德，以巩固他在英国政坛的地位。

同时，白金汉公爵极力讨好查理王子，并促成了查理同法国公主玛丽·德梅迪西的女儿路易十三的妹妹昂里埃塔·玛丽亚的婚事。道理很简单，同西班牙联姻失败后，就只能靠联合法国以对抗西班牙了。当然，查理王子在从马德里的归途中经过巴黎时也曾为玛丽亚小姐的芳容所动。

老国王詹姆斯想看到他儿子结婚，他说他现在只为这个儿子才多活这么几天。他如愿了，1624 年 12 月，他批准了查理的婚事。3 个月后，詹姆斯便带着他那可笑的历史安息了。

但乱子却刚刚开始。

第三章　为了上帝打仗

英格兰的乱子开始了。宗教冲突是一切的根源。他们信奉同一个上帝，所不同的是一个说上帝有一千根胡子而另一个说有一千零一根，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

人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新国王查理继位后，却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受，人们禁不住要问：查理比他爹强吗？

1625年3月17日，查理一世登位。全英格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分明的希望和乱哄哄的欢乐。

据说查理王子为人严肃，行为端正，公认他奉教诚笃，勤朴好学。他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毫不放荡，寡言少语但不难亲近，庄重

威严而不傲慢。他在家中一直彬彬有礼，有条不紊，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表示他是个高尚正派主持公道的人，他的仪态与风度令廷臣们敬畏，也叫人民喜欢；他的良好的品德赢得了所有好人的敬重。英国人看够了詹姆斯的卑鄙行为，他喋喋多言，迂腐不化，呆板而优柔寡断。现在英国人受治于一个国人能够尊敬的国王之下，就有了得以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英国人也许不知道他们君民之间已经相互敌对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正确理解久已存在的、力量日见强大的造成敌对的诸多社会根源，这将使双方保持一致意见的希望成为泡影。

查理一世于4月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会，这无异于一个绝对君主召集许多位国王来开会一样。君主和人民在进行真正权力的接触之前，并不十分清楚各自力量所及的幅度，他们想要合作，但骨子里已经格格不入了，道理很简单，双方在思想上都以统治者自居！

议会一开始，国王关心的是准备远征西班牙的财政支持，而下院却开始精密地检查政府的各部院，包括外交、谈判、联盟及将来的财政

补助究竟已经怎样使用或将要怎样使用。他们自认为无事不可过问；对王家海军表示不满；要求打破外交事务中的王室垄断；抱怨英格兰商业没有得到应有保护，他们期望由新国王为他们申冤雪耻，否则就不同意拨款给国王或征收新税。

查理不过是刚开始执政，下院还只是轻微地责备他的政府，但他们检查政事范围如此之大，态度又咄咄逼人，使新王查理特别反感。议员们的直率言论，使他觉得国王的权威受到了污辱。在"王权至上"这一点上，查理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他并未立刻公开表示不满，他需要得到补助款项。他父亲的最后一届国会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议会当然不能拒绝支持战争。国王认为国会应当给他钱资助战争，一刻也不容缓。同时，他也答允消除民众确确实实的痛苦。

但是议会的表现令他失望，议会并不相信国王的许诺，下院并没有说他们不肯供给更多的款项，但是他们却开始着手调查人民的各种疾苦，认为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国王的建议被

置于一边。

下院说他们是效忠于国王的，但决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权；国王也说他尊重他的臣民的自由，但他立意要自己来治理国家，议员们不应该横加干预。就这样双方谁也不肯让步。

查理终于容忍不了议会对国王的怠慢，他不允许人们忽视他的君权，8月12日，他解散了议会。

国王要打仗了，目标是西班牙的海港加的斯，以期截劫其从拉美殖民地运回金银的船只。

打仗是费钱的事，国会解散了，钱从哪儿来？查理不得不以国王尊驾向臣民们借债，从伦敦到乡下，地方官们奉着国王的指令四处集资，如有不愿者，将其名记下，上交给国王，这一切都靠的是国王的“爱戴”。士兵的来源则是农村破了产的农户和城市中的贫民，他们但得有一条生路也绝不会去打仗。至于船，由于原有舰只不够用，国王下令征用商船，连同水手一起，准备开赴战场。

这纯粹是一支杂牌军，士兵和军官心里想的不是为英国争光，打败西班牙人，而是怎样才能平安回来。

10月8日，1万名远征军组成的三支船队分乘80多只船，从西部德之郡的普利茅斯港启程，出英吉利海峡，经比斯开湾，向西班牙海岸驶去，直逼位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咽喉要道的加的斯。

旗舰上坐着英格兰著名的陆军将领爱德华·塞西尔爵士。他是个陆军勇士，却不是海军的统帅，大西洋上风大浪高，对那些根本就没出过海的士兵们，颠簸之苦，实在是难以忍受。

到达西班牙南端海岸之后，塞西尔下令进攻加的斯港口的要塞。毕竟英国人还是海上的强者。他们装备精良而且人多势众，敌人无心恋战，很快撤了出去。塞西尔弃舟登陆。

第一仗虽然胜了，但这1万多名远征在天边的士兵，就象与世隔绝了一样，没有人侧应，没有人提供情报，加上粮草不足，长距离的行军后，士兵饥肠辘辘，势气低落，牢骚满腹。

据说就在人困马乏之际，先头士兵闯进了一座葡萄园，在那里发现了大桶大桶的葡萄酒，这真是上帝赐与的礼物。军官和士兵们停了下来，开怀狂饮，喝得酩酊大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就在这时，一支西班牙的小股部队突然出

现在他们眼前，可英格兰士兵连上马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地被歼。

塞西尔闻讯赶到，但敌人已经撤去，只留下许多死伤的士兵，本来就涣散不堪的队伍，更加一蹶不振，而西班牙人却乘机调整了部署，加强了防卫。

陆战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好结果，塞西尔便打起在海上抢劫西班牙商船的主意来。但是西班牙商船事先得到消息绕道而行，避开了加的斯湾，英国船队又一无所获。

在外出征已经一个月了，进攻失利，拦截不成，军心不稳，疾病蔓延，塞西尔不得不下令返航。11 月中旬，七零八落的英国舰队晃晃悠悠地回到英格兰。

白金汉是个不甘寂寞、狂傲风流的家伙，很自然让人联想起皇帝跟前的宦官。不过英国王宫并没有中国皇宫中的“坏习惯”，他们那儿只能娶一个老婆，国王也不例外。

就在塞西尔于加的斯进退无主的时候，白

金汉公爵正在欧洲大陆为筹组新教联盟而四处活动，以取得同欧洲国家结盟，从而达成外交上的优势。他期待着塞西尔的胜利，并想以此来增强欧洲诸国对他的信心，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远征加的斯受挫后，国王查理一世和白金汉也无法居高临下地同议会对话，因此，不到六个月，国王就考虑到有召开第二届议会的必要了。

但"聪明"的国王采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辩的几个议员不能出席会议。布里士托尔伯爵是白金汉的对头，也没有得到入会之召。还有几位国王认为可能捣乱的人物都"奉命"充任各州郡的行政官，就不能出席议会，这样，下院议员们就该唯命是从了吧？因为有人说人民是爱戴国王的，而领他们走邪路的只不过是"几个"喜好犯上作乱的人罢了。恰恰相反，下院的议员们倒认为是一位国王自己被人领着走上邪路的，要把国王拉回人民这一边，必须使他摆脱宠臣们的控制。

第一次议会，只是通过延付款项等办法迫使国王解除人民的疾苦，而现在这个议会却决心攻击国王座前最宠信的人，因为此人就是民间疾苦的制造者。2月21日，下院提出弹劾白

金汉公爵。是他，顺从老国王詹姆斯的亲西班牙政策，主动提出陪王子匿名出访，搞王室联姻，结果失败，使英格兰受辱，又是他在国会慷慨陈词，指责西班牙政府口是心非，极力主张派军支持荷兰的反西班牙战争，结果12000多英国士兵中有9000人伤亡；是他，耗用已近于枯竭的国库资金，无视人民的宗教情绪，安排了国王查理与天主教的法国公主的奢侈的婚礼，是他，不顾及国会反对，一意孤行，远征加的斯，结果损兵折将，民怨沸腾。

他无美德可言，连伪善也不装一下。

他治国而无良谋，野心勃勃却缺乏实现的天才。

他胆大妄为，自命不凡。

他凌驾于朝野之上，但充其量不过是个不光彩的暴发户，一个有胆无才的幸臣。

下院攻击得很凶，但要证明白金汉犯了什么违法的罪行却是困难的。4月22日，议会作出决议说，只要有公民的报告就足以成为起诉的根据，于是便搜集一般的流言作为主要指控。

白金汉公爵轻易的回拒了大多数控诉，但下议院坚持要改革政府的治理政策，白金汉虽

然不偷，不杀，又不叛国，但他作为一种危害国家的势力，必须消除。下院的大胆鼓起了宫廷里的对头们的勇气。布里斯托尔伯爵发牢骚说，他童年被召赴议会，白金汉害怕他，因此想拒他于议会门外，但贵族们都承认伯爵的出席权利，查理只好用他并承认他的权力，但却以一道命令，要他留在庄园。伯爵第二次向贵族院上诉，要求他们核查一下，全国所有贵族的特权中是否有规定，否认他出席议会的权力。国王大怒，于5月1日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伯爵。而布里斯托尔却反过来弹劾白金汉，于是，白金汉面临的就绝不仅仅是几个下院议员了，整个议会和人民都在向他兴师问罪。

面对这样情形，查理受到了极大的镇惊，下院虽然没有能给白金汉定下任何罪名，但这次打击显然是针对国王及其宠臣，查理对下院说道："我要你们知道，我不允许你们讯问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说不允许你们讯问居于显要地位以及在我左右的人物……我要你们赶快拨款给我，不然于你们将有不利，因为，若有祸害发生，我将是最后感受这样祸害的人。"他禁止法官们对布里斯托尔伯爵的问话作出回答，法官

们缄默不言。但下院却不肯就此罢手。5月3日，八个下议院议员奉派与上院一起开会，支持对白金汉的弹劾。但他们的会议一结束，国王就命人拘捕了其中的达德利·迪格斯和约翰·埃利奥特，理由是他们说话太无理。5月11日，下院被国王的专横所激怒，并以停止办公来胁迫国王释放二人。国王无奈只好放了达德利和约翰二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王服输，议员们本是国王招集的，现在反而做了他的对头，屡次被议会所击败，令查理觉得这实在是一种有损国王威严的事，他自己原本想向议会表示友好，但这未能阻止任何事态的发生，令他处于难堪的处境。

现在他又听说下院在筹备一篇全面的谏书，对政府和白金汉发起新一轮攻击，他再也没有耐心同他们周旋。“可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6月15日，查理一世宣布立即解散议会。当众烧毁了下院所拟的谏议书。并声明无论任何人，凡藏有这份谏书的，必须立即烧毁。布里斯托尔伯爵被投入伦敦塔。白金汉保住了自己，查理也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国王了。

他的快乐和他的眼光一样短浅。要知道在

西班牙和奥地利战场上，他的士兵为数不多，缺乏训练，但花费却大得惊人；在海军内是清教徒占优势；他宫廷内巨大的开销无法满足……他把议会搬倒，但麻烦却一样也没少。而这样白金汉与奥地利的安妮公主的大胆的爱情得手。要去巴黎与她相见，但黎歇留大主教却阻止他进巴黎半步，为了泄愤，他劝查理进攻法兰西，借口是新教的利益。当时法国新教领袖罗歇尔正被围，如果英格兰不出援兵，法兰西新教将面临惨败。查理认为人民应当支持这一出战理由。于是下令进行大借款。

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往诘问议员中的倔强分子，问为什么拒绝借款，还要了解是谁劝说他们抗拒的，使用什么理由，存在什么阴谋。同时，在几个郡内分驻了大批军队，他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海口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和装备的船只，并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又下令要求伦敦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从前为了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女王伊丽莎白用的船也还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的回答是："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不是指手划脚。"

于是，国王命令动员全国的教士四处宣讲

人民要听命于王，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群众所爱戴的人，他拒绝在他的教区内进行这种拥护绝对权力的宣讲，国王于是下令停止这个大主教行使职权，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查理对人民的感情估计过高了。人们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接受劝说，而忘却他们的自由。况且他们对于这种新的热情是否出于真诚是不相信的。人们提出：如果让他们自由，应重新召开议会，这必定会给大陆上为宗教改革而战的弟兄们以更扎实的支持。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一些无名之辈与无权力的人被强拉去陆军或海军服役。一些强硬的人则被监禁或被派遣到远方，人们无力抗拒国王的命令，只得遵从，虽然人民的不满还未上升到公然暴动的地步，却已不限于敢怒不敢言了。

有5个绅士被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权力可以取得释放，就向高等法院声明行使这个权力。这样，一个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要法院宣布，作为一个原则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得释；而人民却要求知

道是否今后一切保卫自己自由的保障都没有了？

1627年11月28日，法院驳回五人的请求，将其发回监狱；但法院也不肯确定国王要求确定的总的原则。

法官们被双重的恐惧所打击，他们既不敢作国王的奴隶，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判案；他们竭尽所能地来躲闪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与支持。

但是，人民对这一决议当然不满，他们热情专注地维护他们的全部自由和权力，虽然尚无强大力量，但却日益采取攻势，而不再被动地受人欺压。

与此同时，白金汉亲自率军去援助法兰西的罗歇尔。但是，由于统帅指挥无能，他未能取得雷岛，而且损兵折将，败回本土。

英格兰已经有好久不曾为这么一件丢脸的事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了。许多为人民所敬爱的家族，不论住在城市，或住在乡下，都在默悼举哀，整个英格兰都陷入愤怒和耻辱之中。

乱世出英雄。但英雄在出名之前总是默默无闻的，克伦威尔现在只能在他的啤酒店里发愁和发闷。

这些消息和哀痛传到了亨廷顿，在伊丽莎白开的啤酒店里，人们围坐在桌旁，烟雾缭绕，屋子里安静得异乎寻常，人们都在听一位刚从伦敦回来的商人讲述王军在法国的惨败：战争持续了5个多月，2000英军丧命，而敌军无一死亡，“我们的荣誉毁了，我们的船只沉了，我们的士兵死了！这一切不是因为敌人如何厉害，不是出于偶然，而完全在于那些我们所委任的人！”

国王和议会不合，互不相让，宫内派系分裂，宠臣当道，人民苦难深重，天灾人祸不断，这一切都象一块块巨石压在人们心头。

国王在想些什么啊？议会在做些什么啊？小屋里的人们纷纷发出哀叹之声无奈地摇着头，直到深夜忧心忡忡地散去。

顾客们都走光了，只剩下满地的烟蒂。克伦威尔的妻子出来收拾打扫，却看见奥利弗仍坐

在屋子的一角，眼睛深深地凝视着桌子的油灯。是啊！坏消息不断传来，他已经失眠好几个晚上了，每一个还有一点爱国之心的人在这多难的岁月，又怎能睡得着呢？从前欢欢笑笑的克伦威尔不见了，他变得少言寡语，成天独自呆在屋里，他不断思索着国内一天一变的复杂形势，他理不出头绪，想不出问题的根由所在和解决办法，他曾求助于《圣经》，但英国国教的恶行让他感到强烈的憎恶。克伦威尔是个虔诚的清教徒，但清教自从詹姆斯执政以来受到很大迫害，一蹶不振；而当今国王查理竟娶了一位信天主教的法国公主为妻，这无疑更令人感到难以容忍；还有议会，这本是先祖们留给人民的最好礼物，但如今国王说解散就解散，根本没有一点权威，那些敢于站出来替人民说话的议员动辄遭到监禁，连根本的自由都受到了侵剥。至于广大的市民和农民，更是被人欺骗，蒙在鼓里，空有忧国之心，爱国之情，却被国王和他的宠臣愚弄，没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但他们仍在一味地默默忍受。

“上帝啊！难道这一切都是公平的吗？我们该做些什么啊？”克伦威尔痛苦地思索着……

"也许我真的该做些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脸色苍白但两眼炯炯放光的克伦威尔来到街上，偶尔碰上了两年前和他赌博时输给他几镑的一个乡绅，他把这个人招呼到自己跟前说:"请收下自己的钱吧!这是你过去输给我的!"这位乡绅愣了半天，在证实自己听到的不是疯话或玩笑之后，高兴地接过了钱。有关克伦威尔诸如此类的传说流传起来，他引起所有人的惊讶和人们真诚的尊敬，克伦威尔绅士成了亨廷顿正义和善良的化身，在国王召开第三次议会的时候，他被推选为代表亨廷顿的议员，前往威斯敏斯特。

这是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一场民主运动，已经有一帮满腔热忱的人团结在一起，要同国王查理作对了。

白金汉回到伦敦后，仍那么不可一世。但他已觉察出人民对他恨入骨髓，开始设法拯救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想出紧急的办法来扫除这些障碍，筹集款项。

在罗伯特·柯顿爵士温和、坦白而且明智

的劝说下，国王同意重新召开议会，并使白金汉与人民言归于好。

1628年3月17日，第三届议会开会。

国王当天就在议会上说道："现在人人都得凭着他的良心办事，由于现在国家有许多需要，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起见，只好学用另外的方法，以弥补可能被某些人的愚蠢造成的损失。你们不要把我这几句话当作恐吓，而只当作一种劝告，因为我从本性与责任出发，都是以你们的安全与繁荣为己任的。"

查理就这样企图用语言来掩饰他的处境，明明是有求于人，却反而盛气凌人。他已经被一切沉重的错误与失败压得一蹶不振了，却仍在虚张声势，卖弄他的独立的君主威严，自认为是绝对的，超然于一切错误及失败，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国家会遭到损害；他真心地自豪，以为他的荣耀与地位都应该使他保留他的权力，即使正在求助于自由的时候，他也舍不得抛开专制暴君所使用的语言。

下院议员们听了国王这番恐吓话之后，完全不为所动，他们的出自衷心的自傲绝不下于

国王，他们不肯后退半步，坚持他们的自由权利，让国王知道，这种权利是天生的，是独立的，并以法律肯定这种权利。

全国都紧靠在议会的周围，许多杰出的人物都在为国家利益而商讨。其中有爱德华·科克爵士，他是司法届的明星，是公认的英国普通法和古老法规、宪章的名家和解释者；托马斯·温特沃斯，他是约克郡乡绅的代表，后来成为斯特拉福德伯爵，年轻热忱，长于辞令；约翰·皮姆，有学问的律师，尤其熟悉议会的权利与习惯，冷静而大胆，最适宜做群众热情谨慎的领袖，以及约翰·汉普登、登乔尔、霍利斯等人。总还有很多人员注定要在将来各个方面作出不同的事业。他们将依附于截然不同的党，而现在却在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希望下联合起来。面对这样可怕的对手，宫廷只会使用习惯的力量，白金汉的反复无常的鲁莽以及国王的傲慢与执拗。

在议员们进行各项磋商时，最初是友好的，虽然查理的态度仍带有威吓，但觉得有让步的必要，下议员们一面决心要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一面还是全心愿意表示忠于国王。因此，议

会在考虑到解除人民痛苦的同时，也考虑到国王的财政需要。4 月 14 日，一致作出决议，借给国王以一笔可观的款项，但却没有保证这一决议案变成法律。

查理极其高兴：“我初时原是喜欢议会的，后来不晓得怎样，我变成不喜欢议会了，但是现在我又喜欢啦，我爱议员们，我将以常常同我的人民相见为乐。”

白金汉也庆幸国王与议会能够协同一致，这不仅仅是供应几笔款项，这是打开了供应的矿藏，那是藏在他们心中的矿藏……仇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离间上下，使国王与人民隔阂，使人民与国王异心的人；但是我希望将来有人明白他们忖度错了，误以为我是一个兴风作浪的人，使一个贤君和良民分离的人，其实陛下若是允许我，我将永远努力证实我是个好人，除全心全意为他们出力外，并无二心。

但是，国王和白金汉的话音还未落，下议院与上议院会商，共同决定人民应得的正当权利，要求国王予以新的庄严的批准。下议员的委员们在会议中透露他们的计划，就有人告诉查理，他听后皱皱眉，不大高兴。他派人前去劝说下院

应尽量投票决议财政供应问题。

于是，国王召集两院，很郑重地开会，并宣称，宪章是不能违反的，当时的法令也是不能违背的，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他要求他们信赖他的话，并且说他的话能向他们提供比任何新的法律所能提供的更大的保障。

但是，现在的下院既不怕国王的威吓，也不轻易上当受骗：国王在新近滥用君权，已经远远超出法律的预见程度。因此，现在必须要有新的、明确无误的、得到整个议会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承诺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国王屡次食言、年深日久法律已经为人们所疏忽淡忘了。下院对国王的态度未浪费多少言词，只是毕恭毕敬地、豪不通融地摆好那篇有名的“民权请愿书”，在本院通过后，便交付上院要求同意。

《权利请愿书》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强迫任何人承担或缴纳任何杂税、强制性借款、租赋或类似费用；第二，除非依据国家法律和法庭裁决，不得逮捕、加罪于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第三，在普通居民家中，不得专断违法地派驻军队，不得按战时戒严法令审讯和处罚普通居民；第四，在每一个案件

中，任何人不得干预或中止案件的审讯进程，或者建立临时法庭进行审判。

5月17日，上院不明白怎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而又不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力！他们尝试采用修正的办法，议案是通过了，但却附加一条："我们向陛下谦卑地呈上这份请愿书，不仅关心保持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适当注意君权的完好无缺，陛下受托拥有这样权力，是为了便于陛下给予人民以保护、安全和幸福。"

当天，下院接到带着修正条文的议案时，奥尔福德先生说："法律给国王多少权力，我们就给国王多少权力，再不能多给。"而皮姆则更为坚决："我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请愿，是为了求得英国的法律，而这种权力好象是有别于法律的另外一种独特的权力。我晓得怎样将'无上'的字眼加在国王的身份上，却不晓得怎样将'无上的'加在他的权力上，因为我们手中从来没有这个东西。"

下议员们坚持他们的立场毫不让步，公众的压力更与日俱增，贵族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公开要求自由，又没有足够胆量公然批驳专制。

为顾全下议院的面子，他们取消了修正条款，而代以一句无意义可言的话，于是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民权议案，5月28日，并郑重地交与国王。

国王以很大的自我克制，接受下来，6月2日，他的答复既空洞又闪烁其词，他没有批准议案，只是重述了议院对之拒绝表示满意的那些话。但是下院绝不会就此罢休。第二天，6月3日下院开会重新攻击。约翰·坎利奥特爵士很激愤地把所有民间疾苦扼要申说一番，纠察员奉命守门，不让议员离开，最后，大会决议送一通总抗议书给国王，指定由管理供应款项的委员会起草。

就在这时，有些议员害怕起来了，这是眼见将有惊天动地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害怕，他们感到某种不祥的预兆，怕遭到迫害。

国王以为这种情况可以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不恢复他的威信，他将禁止下议院干预国家政事。全体议员动了公愤，这是再也不能容忍的了，即使是最温和的议员们也认为这是对议会的侮辱。"现在我们必须讲话，不然就永不开口吧。当国王与家庭于祸患之中的时候，我们还是默不作声，这是很不恰当的……我晓得不

说话对我们自己是较为安全的，但是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却不安全了……难道我们就坐着不动，不做事，然后就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议会厅沸腾起来，议员们纷纷站起，同时发言，秩序乱到极点。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国王，是国家的公爵使得他对他们言听计从；让我们现在打定主意，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给我们以灵心巧手和利剑杀尽他与我们的全部仇敌。”老迈年高的科克激动地说：“不许你们干预国事，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而是白金汉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吼道，“是他，是他！”整个会场乱成一片。

当沸腾的下院正在要决议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地出去，将国王危险临头的情况告知他。第二天，有人来议会传达一些较为温和的信息，以解释激怒议员的不当言行，但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国王所要的款项仍然无着落，查理与他的宠臣们害怕再激怒势力日见高涨的反对派。6 月 7 日，国王来到议会，查理用向来惯用

的形式回答了议员们关于权力申请书的问题："愿如所愿地定为法律。"

下议员们得胜回院，经过这一番努力，他们终于取得了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力的庄严承认。并决定将民权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要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于是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地通过了。查理国王不无感激地说："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罪过，与我无干。"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只是改革的原则算是完成了；但若不同时进行实际的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是没用的。而落实到具体，就是要改革国王的内阁。因为到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仍接二连三地不经国会认可而抽取关税。

议员们决心毫不耽搁进行最后一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两篇抗议书。6月13日，一篇目标直指公爵，6月21日，一篇声明吨税与磅税的非法性。

国王很不耐烦，他觉得下院不应对他不依不饶，他召来下院议员，要求休会。

议会答应拨款，而且不久就得到落实，有了钱，白金汉当然要一雪法兰西所受之辱。上次远征的失败，使他在情人面前丢脸，他气急败坏，劝说国王以支持新教为由准备再次远征法兰西。

1628年7月，12辆王宫马车，从伦敦奔出，向西南汉普郡的朴茨茅斯港疾驰而去，一会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埃中。

车中坐着查理一世，白金汉公爵以及随从人员。在离港口五英里的索斯威克，国王下了车，住到一个贵族庄园里，公爵仍然驱车直奔港口，那里集结着一支22000吨的舰队，正准备扬帆出海。白金汉亲自前来督阵，加速准备。眼下国人对他群情激愤，矛头纷纷指向白金汉专权当道，弄宠擅权，为避开民愤，他想通过扬威海上来改变人们对他的态度。迎接他的一个朋友劝他穿上一件贴身胸甲以防万一。“对于群众性的激愤，”他不以为然地说：“一件胸甲只是一种愚蠢和不智的防卫，至于个别人的暗害偷袭，我认为我的处境并不危险。”

8月23日清晨，公爵仍然从一份情报中获悉，法兰西彼岸的新教徒已经自行突围。他嘱咐

侍者从速预备马车和早餐，自己走进房内去修饰衣着，他要尽快去见国王，进行商榷。

这时房里宾客很多，社会名流、陆海军将校和来自法国的绅士，他们都是来支持这次远征和前来欢送的。人们激动地谈论着法国新教突围的消息。

侍者进来传报，一切准备停当，公爵离开喧嚷的人群走出房，直奔饭厅，在行经西边帷帘卷起的过道时，他回过头同身材矮小的托马斯·弗列勒上校耳语。突然，一把尖刀越过上校的肩头直向公爵胸口飞去，刺进他的心窝。"恶棍杀了我！"公爵几步踉跄，奔向壁炉，依着炉台，用力拔出匕首，来不及说第二句话，便侧身倒地而死。他妻子听到叫声，穿着睡衣从卧室冲出，惊叫着奔到现场，伏尸痛哭。

人们围着尸体，一阵忙乱和惊恐，是谁干的？是谁？人们惊疑法国来的绅士，猜想里面可能有奸细，但法国人极力申辩。人们大骂是哪个无赖刺死了这位高贵的公爵，就在喧扰吵闹之中，一个身材修长满头红发的青年人站了出来："不是无赖干的，而是一个正直的人干的，是我杀死了他！"面对满面怒容、持剑而来的人们，他

泰然自若，平静地伸出双手，黝黑的面孔显出一副傲然的神色：“我知道你们心里在为我的行动而欢呼。”

这个青年的名字叫约翰·费尔顿，是公爵手下的一个退役军官，他是在前一天晚上赶到港口的，隐蔽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他到公爵住处门口，等候公爵外出，他发现里面人声杂乱，无人注意，便悄悄走到走廊入口，佯装拿起卷起的帷帘，乘公爵与人耳语之际下了手。

国王听到这一消息，下令一定要查出主谋，但是费尔顿轻蔑的宣称：“你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自寻烦恼，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其声望和威势足以促使或安排我做出这一切行动；我也从未把我的意图和决定交托给任何人；这是也只是我自己着手的，本着自己的良知和激情；至于动机，要是那顶帽子能够找到的话，那里面有，而且我把它放在那里，因为我认为自己可能在这一行动中丧生。”

人们在现场找回费尔顿的帽子，里面缝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国蒙难受苦的全部根源，人民的公敌。”

在押往伦敦的路上，人们围着他高呼：“上

帝祝福你!”全国上下一片沸腾。白金汉的死对国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次刺杀也使国王摆脱了窘境,国会的不满随着白金汉的死亡而减弱,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给王后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对人们由此而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人们认为取得了胜利,而国王却在采取新的手段。白金汉死了,但他又重新宠幸议会的对头们:曾经受到议会控告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被谴责的梅因沃林博士也得了个肥缺;而早就以崇拜君权至上、教权至上而闻名的劳德则升至到了伦敦主教。与此同时,国王仍旧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仍继续存在。而且他成功地争取了最杰出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但不顾从前的朋友们的责备和威吓,受封男爵,参加了枢密院。

皮姆与他最后一次以友谊相见同他话别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但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扬,拼命向上爬。不久就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于是其他变节

的人也继他而起。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在他的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为稳重，更有才干，却不象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议会休会后很快就要召开，但这次，查理却满怀信心和希望。

专制同民主的冲突总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查理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我今天来这里为的是解散议会。"

1629年1月21日，下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发生什么效果，并核实权利申请书的刊印情况。但事实令他们镇惊：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国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将法案后附加上的国王的答复加以更换，载有真正答复的印件全数压下不发。下院立刻索要印刷的文稿，结果已被人偷换。他们没有再说什么，要把这种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的了，但他们不声不响。这不能说明一切已经销声匿迹。

于是对政府过于纵容天主教的攻击又起，因为王后是天主教徒，而且据说她还毫无羞耻

地登台演戏。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当然指国王新提拔的勋爵），反对非正式谈话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力的藐视。

下院情绪十分激动，但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并颇有好感地听取一个新人物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是第一次站起来发言，他用很愤慨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教士为非作歹。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夺取吨税及磅税，但毫无结果。他召集下院后本就为这一目的，于是他运用新的威吓，新的劝说，他承认他把所有这样的捐税就象其他捐税一样，都看作是人民对他的纯粹的效忠，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规定合法征收，不过同时他再三坚持说，这几种捐税应该给他终身享用。但下院的议员们寸步不让，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必申诉民间疾苦，但他们此时却都被一种激烈的无名的惊惶所扰，好象觉得将有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防范，心神不定。国王有些不耐烦了。

3月2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提议作出一项抗议反对抽取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力求交付表决。

议长离席欲退，但议员们站起来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上，议长威吓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议员们怒不可遏，他们逼他再次坐到位子上。

国王听说议院出事，下令强压官将权杖由议院取出，按照惯例，这就会令议会全体停止讨论，但议员们逼强压官坐在椅子上不动，如同逼议长一般，把议会厅的钥匙取出，交与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但派去的人几处的门都上了锁，而且是从里面上的锁，他根本进不去。查理暴跳如雷，立即传侍卫出来，命令他们去攻门。但当时，下院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已经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甚至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都已成为不可能的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我多次到这里来过，以这次最为不愉快，我今天来这里为的是解散议会，下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

其后立刻发布宣言书："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说明国王喜欢用议会办事，尽管如此，近因在开议会的过程中，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几

个不良的目的，最近的这种权力滥用，已迫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胆敢限国王召集议会日期，就将以擅权论处。”

他说到做到，在此后开始了他长达11年的无国会统治。

人难免有落魄的时候，克伦威尔几乎携妻带子踏上一条开往新英格兰的船，赴去海外淘金。

1628年，议会解散之后，克伦威尔又回到了乡下，过着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查理一世开始了专制统治，迫使他忧心忡忡，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又令他兴奋不已。正是在这其间他结识了皮姆等人，有机会同他们进行探讨和争论，但在亨廷顿的日子并不安稳，国王对清教的迫害，直接波及到克伦威尔。

1631年5月，他卖出亨廷顿的全部财产，移居到乌塞河下游五英里的圣·艾符斯镇，在那里租了几处牧场，成为别人的土地租户。

查理一世独裁的最初几年中，英格兰成了清教徒的活地狱，当局对长老派和独立派都横

加迫害。两个特别法庭，星室法院和高等法庭，因清教徒进行反对国教的宣传而对清教徒加以逮捕、拷打、罚款，施以种种野蛮残忍的刑罚。

1630年，星室法院因长老派作家亚历山大·莱顿在荷兰出版了一本反对主教的书而叛处他1万镑的罚金和终身监禁。此外，莱顿还遭到鞭挞，脸上烙印，挖去鼻孔，割掉耳朵，残遭迫害。

清教徒们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暴力独裁。许多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开始考虑离开国内，到荒僻的地方去寻求自由与正义。于是，大批的清教徒离乡背井，前往大洋彼岸去寻找“自由的庇护所”。在新大陆每个新来的人都可以得到土地，享受自由，不受英国那些压迫，禁令的限制。

据说也正是在此期间，克伦威尔也曾打算永远离开英国，他带着家眷登上一条开往新英格兰的船，但船还没开，就被扣留，乘客不得不返回岸上，克伦威尔没有走成。

如果他真的搭上那条去美洲的船的话，那么他以后的生活就很难说了，而英国的历史也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查理的法国王后在国人眼中是个不祥的异教徒，但每当国王同王后"谈判"时，总是以查理的顺从而告终。

民主和专制的对立，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但是，查理一世并非一开始就想废除英格兰的法律和产生它的议会，也许他并非不怀好意，但是他和他的宠臣们傲慢无礼，目光短浅，总想以强权来代替一切。他们认为国王让过许多步，答应了议会许多要求，但是下议院实在太难满足了，按照下院的意思，国王无异于一个附属的，被他们所操纵的木偶，这一点国王办不到。因为在国王和国会之间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时候，让步的应该是议会，因为国王才是统治者，而当下院不肯退让，就只好撇开不管，直到想起需要议会的时候，再召集开会。

至于宫廷内的阁员们，只知道解散议会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阻碍，因为每当议会开会，廷臣们老觉着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追逐财富，谁也不敢放手享受他们的特权，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议会的指责。现在好了，议会解散了，这样

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了，于是旧日的豪华放浪又重新出现，个人的野心，权力的欲望，对金钱的追求，对物欲的享乐，现在统统可以施展。也许他们并未意识到这只是末日到来之前的狂欢。

在人民心中，都已经明显地感到了一种不安和愤怒。议会解散了，一些人遭到迫害，但并没有死亡。它仍在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仍然通过议会的领导人的声音在全国的审判官们面前奋斗着。被抓的议员坚决不屈，这使他们受到鼓舞，但同时也感到一阵莫名的茫然，要知道，站在他们对面的是国王，而不是什么别的。

被捕的议员一次次地从伦敦塔被提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了又从威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大审判结束了；有几个议员，因为受到恫吓或是被诱惑交付了罚款，奉命远离首都，至少要离王宫10英里，归隐田园，以掩饰他们的软弱。其余的节操高尚的则坚持到底，始终不屈，仍然被关在牢里。

大权在握的人见没有公开的反对，便以为自己已获全胜，人民已经一败涂地，1629年4月11日，查理同法兰西订立和约，1630年11月5

日，又同西班牙订立了和约，现在他可以自慰“内无劲敌，外无寇敌”了。但是国王面临的新麻烦，很快显露出来，在人民同国王的斗争告一段落之后，在国王身边，立刻发生了两派的争夺，看谁能够左右这个重新获得新生的专制，其中，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

也许我们有必要提一提这位法兰西的英国王后，他一到英国，一点也不掩饰她对新教国家沉闷的感觉。英格兰的宗教、制度、风格、语言，全部令她不快。她曾同查理闹翻，使查理不得已把她来到英国时带来的随从都送回大陆。

但自从白金汉死后，查理同王后的感情日益亲密没多久，王后就以她仪态和谒而活泼来开始操纵一个具有高度纯洁原则性的青年国王。我们没有必要指责她，也没必要指责查理国王，查理对玛丽亚是很感激的，她能够降格相从，与他为侣，他已经感到受宠若惊，他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王后聪明、好动、性格坚强，因此，王后对国王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绝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甚至把她当成罪魁祸首，问题是在于她周围的一些人。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天主教士。因为王后本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显然新教英国曾严厉地对待天主教徒，但还没有达到使之绝迹的地步。而且自詹姆斯以来对天主教政策放宽，使他们很快又壮大起来，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天主教徒中不会因重商而富贵。

在王臣身边的另一群人则是那些富贵的轻佻之徒和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的廷臣们，他们早已前赴巴黎学会了谄媚她的秘诀。这些人口口声声说，只有依赖她才有富贵，才有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解救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都去谒见王后，同她谈论大陆上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宫里无一不是外国式的，而且无一不是触犯英国的信仰与风习。对这些国王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查理喜欢看见她有求于他；或要求他爱她，因此，只是一味想着如何为她分忧，如何消她的怒气，因此，每当玛丽亚同他“谈判”时，总是以查理的顺从而告终。

王后的喜怒左右着国王的头脑，纵使最富于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肯不加抗拒而服从。查理有两个顾问大臣，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是死心塌地地忠诚于国王的事

业，却不愿见国王受王后的指使转而指使他们。

斯特拉福德抛弃其同伴而依附国王，这并不要求他牺牲什么十分确定的原则，也用不着卑鄙地违背他的良心。他原本是个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才一变而成为一个爱国者，这只是当由于思慕荣华，向往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他饱满的精力，而并不是出于正直和深刻的信念。他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升官，在于整治别人，与其说是目的，不如是他天生的需要。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象他从前为自由出力，而现在的热劲不减于前，只是他目前要做一个严肃的、高傲的、有才力的、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轻浮的、专事巴结上峰的廷臣而已。他的心路十分宽广，因此不甘心自闭于宫廷阴谋的卑琐范围之内。他的性格过于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礼节与见解。他热心办事，不怕任何敌手、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力，现在国王的权力也就是他自己的权力，而且自议会废除后，他忙于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凡是他认为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凡是他认为不致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性烈如火的专制家，但是这不能说他

全无爱国之心，也不能说他一点也不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完全了解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应用什么手段才能够赢来专制权力。他的目标，他治国的特色，他努力使人们从国王的统治中得到的印象就是：一个虽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前后一致的，是勤奋的，它藐视民权，但却关心人民的幸福，他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施政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与上下、不分宫廷与民间，统统听命于政府的意志和观点。

另一位出名的人物就是劳德大主教。他是斯特拉福德的朋友。这个人尘世激情较少，但无私心的热心却相当丰富。他为人严肃，生活简单，他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抑或是他自己手中持有的权力。从他看来，限制人民的行动和惩罚人民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在他看来，这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着，但是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相对立的利益，又不肯尊重人们的权利，闭目低头，向前横冲直撞，既反对自由又反对滥权；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弊害，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他对待廷臣与对待市民，是同

等鲁莽从事，而且同样地毫不通融。他不企求任何人做朋友，他没有预期会有什么抗拒，也不容忍有什么抗拒，一句话，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手就无往不利。他常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定见所控制，这种定见以狂热的激情和过分的权威左右着他。

这样两个枢密顾问，正符合查理一世的英格兰的新形势。这两个人既不在宫廷之列，也就不急于要讨好宫廷，却更多要效力于他们的国王。二人既无幸臣的傲世力，又无他们的所谓贪求。他们两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劳苦，有胆有为，忠于所事。

在爱尔兰，斯特拉福德掌管政务不久，这个一向是国王的麻烦，又耗费国王许多钱财的小国，就一下子变成国王的财富及势力的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从前的捐税，一向是无系统地征收进来，又恬不知耻地滥挪掉的，现在则办得很有条理，不久便可以应付各种支出，贵族不敢肆无忌惮地欺压平民，也不再允许贵族派系和宗教派系象从前那样互相勾心斗角。当初，斯特拉福德刚到任，看到的是军队疲弱，无衣装，纪律涣散，在他重新整顿之后，军队变得纪律良

好，粮饷充足，抢劫居民的现象也能杜绝。治安能保证，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起，农业获得进步，简单地说爱尔兰现在是应用专制；依靠严刑治理的，有时甚至使用不名誉的暴烈手段。从前，到处受大大小小税官的层层剥削，到处受自私自利的和无知无识的贵族们的欺压，而现在则对于一般的文明以及君主权都有裨益了。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似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的权力那样广泛而集中。他的才能不及这位朋友，但却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任为管理国库的专员，于是便禁止一切的侵吞与非法的支出，他还竭力研究以便明了各项税收系统，且要想出方法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令征税中出现许多留难和弊端。劳德听了商人们的申诉，同他们会谈，在逐步明了有关商业贸易的许多利害关系以后，就废除许多有害于国库的障碍。劳德始终认为：自己既然为国王和教会服务，就可以压制人民，而且可以提出很不公道的建议。但是一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他就以善良与真理为目标，毫不畏惧，也丝毫不顾到其他的利益。

正因为斯特拉福德与劳德是国王的最忠实的奴仆，而且只听从国王的差遣，只保护国王利益，这必然招致宫内廷臣们的怨恨，道理很简单，他们二人触及了宫内宠臣的利益，廷臣们群起而攻之，反对斯特拉福德和劳德，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更多。

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噘起嘴巴嗤笑他，说他是个暴发户，笑他是个粗鄙乡绅。他们听惯了关于他在议会里反对宫廷的说法，坚决排斥他。

对劳德也一样，他们不喜欢劳德的严肃的态度，以及他说话的直率，讥笑他是个讲神学的书呆子。

但这两个却可称得上杰出，他们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而且两个人都看不起阴谋并主张节约，喜欢谈公务与国家的需要，而这些正是宫廷所不愿意听到的。王后对他们也渐生反感，因为他们二人是阻碍她影响国王的一道屏障；高等贵族嫉妒他们二人的权力，因此，不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虽然各自怀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却给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造成不小的

麻烦。

所幸国王查理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没有抛弃他们。国王很欣赏他们二人的才智，许多见解上他们能达成一致，而且尤为敬爱劳德的奉教虔笃。尽管他不理睬宫廷的看法而重用这两个人替他掌政，但他却无法令宫廷授给他们二人的治理权。查理经常专心于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忽视实行统治所需要的因素而更多地注重统治全国的乐趣。他很少考虑王后和宫廷对斯特拉福德和劳德的压力，而认为只要把他们二人留在位子上，就已经尽了他的力量。国王要二人实行专制，但他们一旦要宫廷有所牺牲，或要求实行与白厅的方法或条规相反的事，他们的权力就行不通了。于是有人说在斯特拉福德的言语中间藐视了王后，又有很有势力的贵族说他高傲，这使他不得不为他的言行剖白，为他的态度申辩。所有这些无根据的控诉，都逼他一次次从都柏林作出回答，以辩白他所说的话以及宫廷中所盛传的关于他的谣言。更糟的是，他不一定常得到国王关于保证他无事的答复，这些答复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尽管国王的忠诚臣仆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还太平无事，又尽管国王自己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但政府也仍是软弱无力的，不受人敬重的。本来划一向上的力量被各种矛盾因素所抵消，政府不断受到国内纠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反的势力所支配，这使它行事无一定计划，而且每当转折的时期，就忘了自己的计划。这使它经常表现出缺乏决断，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一块钱的税款而走上英国最高法庭，弄出乱子来。

如此无能的政府，仅仅是依靠表面上的平静来维持。但国王自己却认为具有的威严得到了承认。在财政上的蠢行是引发其后一系列致命变革的导火线。

17世纪30年代中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其中以吨税和磅税为甚。吨税和磅锐是两种向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税，出现于14世纪中期，前者向进口的酒按吨征收，后者向出口的羊毛等货物按价抽征。1373年它们第一次经国会同意

后准予国王在一段时期内征收。15世纪起，每个国王即位，国会即授予终身征收之权。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此类税金不断增长，成为王室的主要财源之一。查理二世登基时，国会为了限制王权，只同意给他为期一年的征收权，但国王现在已经解散了议会，所以毫无顾忌地征收。海关人员东翻西搜，寻找着没有纳税的商品，凡漏税者，立逼补交。

同时，古老的骑士捐又严格起来，拥有年收入40先令地租的大批乡绅地主，没有参加骑士头衔的典礼，被逼交纳钱款。

还有关于国王森林领地，在国王领地附近占有土地的贵族被认为是“侵犯”了王室林地权，被迫缴纳罚金。在行政市区内和城郊新增加的迁移住户要向王室交纳三年地皮税，理由是破坏了不准扩展行政城全的法令。

古老的对天主教徒不从国政的处罚令也重新有效，对天主教徒进行一定数额的罚款，但并不是严酷剥夺其信教自由。

还有就是专卖商品的进一步扩大，只要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无一不烙上专卖商品印证，而国王便从中捞取金钱。

如果说上述这种种巧立名目的滥收苛税，还没有引起广大人民的普遍不满的话，那么船税的征收则成为人们反抗的焦点。

船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捐税，起源于中世纪早期，那时，英国王室为了防备海盗袭击，向沿海居民征用船舶，有时允许以金钱折交。到了17世纪后，一向被认为是一种与国会无关的捐税，而且是早已废止不征，但查理为了聚敛钱财，1634年起重新开征。这一年征收到8万英镑，但慑于群众压力，他不得不把这笔钱用于海军船舶的维修上。

1635年，政府发布船税征收令，规定总的税金是每年20万英镑，征收地区从沿海推广到内陆。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过去征收船是战争需要，而且限于沿海城镇，现在是和平时期，反而向全国各地征收；过去是税款有限额，只作为海防的费用，现在却是款额由国王任意确定，用于任何用途。

使本来一项战时应急的政策性税捐变成了按财产、人头计算的直接税，这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

约翰·汉普登出生于白金汉郡的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1621年第一次当选国会下议员，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以反对专制的税收政策而知名。在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国会同意国王征税时，汉普登力争把他财产的税额降低。1627年，他因抵制国王"强制性借款"而下狱。查理一世征收船税一开始，他就反对。

1635年1月，元旦刚过，两个船税征收吏奉命前来白金汉郡汉普登的家乡，准备在大基姆布尔教堂召集教区全体居民会议，确定征税的税率。

这里的人们世代山居，历来只知道用弓箭和马匹来保卫自己的家乡，从未见过船的影子，对于船税更是大惑不解。税吏到达的消息传出，人们相互转告、窃窃私语。11日那天，朔风凛冽，寒气袭人，奇尔顿山麓的居民们赶来出席会议。税吏吃惊地发现，所有到会者：乡绅、农民、技师，连教堂打钟人都拒绝缴纳哪怕是一个便士的船税。

这些抗税者草拟了一份联合抗议书，领头的是约翰·汉普登。他的税金据说不足二十先令，这点小钱对他来说微不足道，但是，他拒绝

的是以船税为名的不合理的税款，他认为这是专制勒索，要求将这个问题提法庭审议。

面对这种情况，两个税吏无可奈何，只得带着这份抗议书复命去了。奇尔顿山民们的抗税风云，迅速吹到各地，形成全国范围的抗税浪潮。汉普登坚持将这个问题提到法庭，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

汉普登坐拥厚资，行为检点，从不炫耀豪富，他态度持重而单纯，从不流露严厉；他以性格恬静，平易近人著称，邻居们无论哪一派都敬重他，他通情达理，反对交税但不是一个奉教到发狂的人，亦不是一个喜欢作乱的人。所以该郡的法官并不怕他，但也不想伤害他。本来以二十先令敷衍了事，汉普登不肯。但他既不感情用事，也不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则，要求司法方面郑重裁定国家有无权力抽收此税。他在监牢里时很安静也很沉默，他只求将案子交给法官们审问，他说他乐于用法律处置这个问题，并希望国王也能愿意这样做，而国王也以真正的热情和自信同意打这场官司。

国王同星室法院的法官进行了磋商，法官们的意见是：当王国的普遍利益和安全濒临存

亡关头，整个国家处于危殆之中的时候，陛下可以令所有臣民提供相当数量的船舶，连同弹药和给养在内，谁拒绝就对谁强制执行。同样，唯有陛下可以决定这种危殆之存在与否，决定何时以及如何予以防止。”国王把法官的话公之于众，作为对待船税的行动准则，尽管如此，汉普登仍然坚持不缴。汉普登的律师在办理这件案子时，同汉普登一样审慎，说国王和君权时都是毕恭毕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说及危险的原则，并只以本国的法律及历史为依据。律师罗伯特·霍尔本及奥利弗·圣约翰认为：如果对国家的威胁是被感受到了的话，如果国王因国家确实处于危险状态，迫切需要装备船舶的话，事情应由国会进行讨论；如果国王要决定这一切，人们的自由和财产安全就将遭殃罹难。”霍尔本在发言的时候，有几次停住不往下说，而求法庭饶恕他辩驳得太激烈，且求法庭若是看见他超越礼貌及法律的范围，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师们也赞扬汉普登的温和。这场官司在人们的慷慨声中审了十三天，本国的根本法律经过了争辩，并没有人说民权辩护人感情冲动，更没有人怀疑他们有任何反叛意图。

星室法院的法官伯克利坚持认为：国王除了依据国会的一致同意以外，不能从其臣民处取得钱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从未读到或听到过：法律是君王，而常见且最真实的却是：君王是法律。

首席法官芬奇也说："剥夺国王卫国权力的国会法案是无效的，它们是无效的国会法案，因为他们束缚国王，使他不得支配其臣民，不得支配其臣民的人身和财产。"

6月12日宣判，表决时12位法官有四个法官投了有利于汉普登的票，二票弃权，最后以二票多数判汉普登有罪缴纳罚金。

国王听到这个判决就为自己庆幸，认为是专制的决定性的胜利。而人民的看法是认为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指望法官或法律为他们主持公道了。

查理也许过于自鸣得意了，要知道：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民一向是极其不满的，但缺少团结力，以致未能一致行动，可是这次的判决一下来，乡绅、市民、农民、商人、长老会、奉仰异端的教民，总而言之，全国无不觉得身受这个判决的损害。人人嘴里都讲汉普

登，一提起他的名字，人民都表示爱戴与骄傲，因为他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行为的典范，而他的行为就是国人的光荣。

宫廷的朋友和党羽都不敢说这次打赢是合法的。法官为自己辩解，几乎到了公开承认自己怯懦的地步，并企图借此取得饶恕。比较温和的市民表现一片忧郁的沉默，较为胆大正直的人，直言不讳地表现出他们的愤怒。以此私下得到一点满足，伦敦与外省，不久就有许多怨恨满腔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领导人，一起聚众来讨论前途。各处都定出措施，决定到必要的时候就联络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支持。

简单地说，一个党派已经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但却得到全国的公认。国王与他的内阁仍然在为他们最近的胜利而庆贺，谁知他们的对手已经找到起事的时机和行动的方法了。

克伦威尔由于经常替乡亲排水排涝，被人称作“泽地勋爵”。

1636年，对克伦威尔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一

年，他的舅父托马斯·斯图亚特死后，使他在伊里城（剑桥郡）获得了一大笔可观的遗产。托马斯是该地大教堂的堂表，有权有势，克伦威尔赶到伊里后，一下子就成了该郡的最大的乡绅之一。他的生活随之焕然一新，使他能跻身上层社会，并受到人们的更强的新奋发的尊重。

克伦威尔曾经生活过的，靠近圣玛丽亚教堂的两层住宅楼，一直保存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豪华，围绕着宽敞庭院的一系列库房表明他的收入相当可观。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他本人越来越广泛地被卷入新贵族的阶层。

但在伦敦，克伦威尔这个名字仍然不为人所知，在整整11年中，宫廷总是只有两三次接触到克伦威尔这个名字，而且是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其中有一次他拒不接受骑士封号，因而被国会课处罚款。但是在那些效仿汉普登拒交“船税”的人中，没有见到克伦威尔这个名字。

可是在这几年里，克伦威尔已经成了剑桥及邻郡最受欢迎的人物了。众所周知他是个严肃、虔诚的清教徒，英国的土地所有制使他有可

能有效地影响处于依附地位的份地领有农的“公众舆论”。

30年代，他成了加尔文的信徒，经过长时间令人痛苦的疑虑后，他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造民”，“注定要得救”，“我生活在黑暗中，我憎恨光明，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这是真的”。虽然清教徒关于自己的自白，一般总是这样，但这却足以证明克伦威尔斗争的激情，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这场风暴中的先锋。

克伦威尔刚迁居伊里不久，一家皇家沼地排干者公然动手把排干了的从前属于村社使用的土地攫为私产。这时克伦威尔挺身而出，为维护小份土地领有农的利益而斗争。“沼泽地勋爵”以后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深信，促使他在这种情况下激动的并非同情农民本身的命运，在克伦威尔看来，排干者公司的所为，仍是依靠颁发特许证的国王所授与的权力干出来的暴行，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起来反对这一暴行，然而广大的份地领有农阶层则认为克伦威尔是他们村社土地权利的捍卫者。克伦威尔以这种举动，在整个英国东部为自己赢得了被侵犯的“村社的自由与权利的捍卫者”的声誉。

“打死他！”随着一声高喊，一个70来岁的老太婆跳起来，抓起小板凳向副主教扔去……

1637年7月23日（星期日）是国王指定要在苏格兰开始采用英国国教仪式的日子。这一天，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的居民来到当地主教座堂圣·贾尔斯教堂时，发现教堂内的陈设变了，恢复了宗教改革前的样子。教堂入口处放有圣水器，神坛设置在教堂的东端，祭桌上供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一根细长的烛芯在盛器内露出了头，发出微弱的火光，整个礼拜堂显得格外“神圣庄严”。主持仪式的副主教身着黑长袍，外面罩着白色法衣，跪在祭桌前面。教堂里挤满了人，最前面的是大主教，主教，法官，高级教士和枢密院成员。

礼拜仪式开始了，副主教慢慢起立，庄重地翻开《公祷书》，他还未出口，人群中已经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少数人在低声咕哝，接着许多人开始咒骂，最后出现了全场激动的喧闹声。“他是一个罗马主教，我们不要他！”“一个伪基督，

他要领我们去地狱，打死他!”紧接着，一个老太婆跳了起来，抓起坐着的小凳子，向副主教扔去。教堂内一片混乱，妇女们冲上前去，要抓副主教，他慌慌张张，东躲西藏地从人群中溜了出去。大主教眼看仪式无法继续，就站到神坛上企图说服群众。不料，石块、木棒却一齐向他飞来，要不是那些在场的政府官员保驾，他准会被当场揍死。

圣·贾尔斯教堂的风波不是偶然的。自从查理登位以来，就效法他父亲的榜样，不停地努力推翻苏格兰教会从加尔文派借用来的共和宪法，并恢复建立苏格兰的主教制度，他们为使这个计划成功，用尽了欺骗、暴力、威吓、贿赂的手段，专制甚至采用柔和耐心等待的手法，有时迎合教士们的个人野心，有时利用小地主重视自身利益的心理，使小地主可以很容易恢复他们的什一税，而对教士们则升任他们为教会的高级人员与朝廷的高官。到了1636年，这样的工作好象要接近完成，主教们恢复了他们的宗教司法权，圣安得鲁大主教担任王国的大法官，罗斯主教即将任财政部长。在14个主教中有9个做了枢密顾问官，而且在会议中占举足轻重

的地位。查理和劳德认为大功告成的时机已到，不用与教士和人民商讨就硬将一套宗教法典和礼拜仪式强加于这个教会之上，以适合新的情况。于是便发生了圣·贯尔教堂的骚乱。

在苏格兰宗教改革与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的意志及廷臣们的奴颜婢膝所产生和维持的。而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为舆论所赞成，以其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碍，然后自下而上登了高位，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颁布的。从一开始它就没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来分裂其党徒。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们习惯于交替抗拒权力，或自己行使权利。苏格兰的传教士们可以夸口说，他们已经提高了民族地位，他们的团结是很坚强的。他们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国王的大臣及本地区的自己的教民指名道姓地进行谴责。就在这样一个学校里，人民学会了大胆思考和大胆说话，他们认为改革宗教的胜利应该全部归功于人民自己，毫未仰赖他人。因此他们不仅视宗教改革为他们的信条，也视为他们自己手创的业绩。他们坚持以拥护教会的精神上的独立而反对国王操纵宗教的最高无上权来作为

他们的根本指导原则。他们认为他们具有条件，而且赋有职责保卫宗教的独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权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这些都是国王用来反对他们的。

查理自以为能够破坏苏格兰的民众宗教改革，这种尝试的后果是使专制制度的臣仆们惊讶与苦恼，而等到成功似乎有明显在望的时候，失败却偏偏来到。恢复主教制，废除旧法律，能做的都做了，而最直接的就是改变公众礼拜的仪式，而就在将新礼拜仪节输进爱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什么都完了。几个星期内，一个突发的，遍及各地的起义，将大群的地主、农民、市民、工匠从王国的四面八方招到爱丁堡，反对威胁了他们的礼拜的新形式，并且亲身前来作抗议的后盾。房舍与大街挤满了人，有些人在城门下城墙下安营扎寨，人们包围了枢密院的大厅，该厅当即要求地方自治局援助，而该局本身也在被包围，无能为力。主教们只要一在街上走过，就遭到群众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写了一篇控诉书，攻击主教们的苛政和偶像崇拜，在其上签字的有教士，乡绅，还有些贵族。国王不答复他们的控诉，命令送控诉书的人回家；他们从了

命，这多半是由于实际需要，而不是甘心服从。但是一个月后（11月5日），他们又来了，而且人数比从前更多。第二次来并无扰乱秩序的事，他们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级人士参加了这个争执；两个星期后，就提议组织正式的抵抗，决议后就立即实行，由各阶级中的人们选出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受托进行办理这件大事，各郡各镇都有分会奉行总会指示。暴动似乎并未发生，但是只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一声令下，暴动便会发生。

12月7日，查理终于作出答复，不过只是坚持要遵行新的礼拜仪式，禁止请愿者集会，违者以叛逆罪论处，苏格兰内阁奉命严守秘密，不许宣布国王命令的内容而待以后公布。不料命令还未到苏格兰，起义的魁首们已经知道命令的内容了，他们立刻号召人民支持他们的代表。内阁为了抢先一步，立刻公布国王的命令内容（1638年2月19日）。这时，有两个贵族，休姆和林赛勋爵，紧跟着国王的传令官的脚后跟，命人以他们的同胞的名义公布并张挂抗议书，他们两人在这份抗议书上签过字，凡是在有人宣读国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干这样的事，宣读与

张挂人民的抗议书。起义的人们日益斗志昂扬，日益感到威胁，也日益团结一致，终于决定结成严肃的同盟，借以在全体人们前面宣告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自己的信条以及自己的愿望，最有势力的教士亚历山大·亨德森及一个有名的律师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也就是后来的沃里斯顿勋爵，共同制定这个同盟的规章。1638 年 3 月 1 日，代表们到苏格兰西部阿尔及利的格兰·弗兰尔斯教堂集会，在庄严的祈祷声中，宣读了这份《民族圣约》，这是经巴尔默林活劳登和罗恩的修改和赞同，与会者神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的。《圣约》里除了载有详细的及已经成为古老的信仰声名以外，还表示正式拒绝接受新的宗教法律与新的礼拜仪式，以及民众联合会的誓词，誓愿针对各种危险来保卫君主、宗教以及国家的法律与自由。《圣约》一经提出，人民就普遍地欢呼赞成，于是派出信徒，按站替换，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将盟约从一村送到另一村，一直传到王国的穷乡僻壤，这好像山上的酋长将一个点燃的火炬，派人迅速传送到各处的脚下。像号召即刻赴战一样。乡绅、教士、市民、工人、妇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教堂里和大街上，

宣誓一致服从《圣约》，甚至苏格兰高地的人们，为民族的感情所激动，暂时忘了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平日如何激烈地反对低地的人，也加入起义行列。

不到6个星期，整个苏格兰都在《圣约》法令之下联合起来了，只有政府雇用的人，几千名天主教徒以及整个阿伯丁市，拒绝参加联盟。

这样大胆的反抗使查理大惊失色：有人告诉他说，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狂疯闹事，爱丁堡地方自治会议甚至还谦恭地请求国会开恩饶恕，并答应立即严罚乱民，国会的苏格兰廷臣也天天夸海口，说他们所得的情报，都说是各处平静无事，或说几乎平静无事。查理觉得自己的意见寸步难行，大发雷霆，决计借助于武力。

但是归国王调动的兵力有限，而且还要考虑到作战的费用，查理不得不实行缓兵计划，于是派汉密尔顿侯爵前往苏格兰，嘱咐他们稍微奉承一下乱党，让他们存些希望，但却不要说什么可能束缚国王的话，或进行任何解决。

1638年6月，2万人聚集在爱丁堡，举行斋戒，前去见汉密尔顿，有七百人穿上教袍，站在道旁的高处，当他走过时，就高唱圣歌。人们要

向侯爵显示他们的力量。

汉密尔顿因为要在苏格兰保持他的信用，同时又要服从国王的指示，有意地表现和解姿态，但是他所建议的让步，在人民看来，是明显不够的，而且带有欺骗性。他尝试提出一个国王的建议以代替群众的联盟《圣约》，但这被人们嘲笑着拒绝了。他同人们的代表进行了几次无效的会商，几次往返于爱丁堡及伦敦之间，但事情并没有一丝好转。

事情在变好之前必须变得更坏

9月间，一天汉密尔顿忽然奉到国王的命令，叫他许诺乱党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应召开教会的会议，召开议会，准许自由辩论任何问题，甚至弹劾主教。苏格兰人闻讯之下，既高兴又惊讶，但他们不肯予以信任，而且国王的如此爽快的答复令他们怀疑。11月21日，在格拉斯召开了一个宗教大会，他们不久就看出，汉密尔顿的唯一目的只在阻挠他们的继续前进，且要在决议中加入消极的条款。实际上这正是国王的指示。尽管如

此，大会仍旧进行，并正在设法传主教们来受审，但汉密尔顿突然于11月28日解散会议。人们同时又听说，查理一世在准备战争，正要乘船来苏格兰。汉密尔顿返回伦敦，但大会拒绝解散继续开会，谴责国王颁发的所有新法，肯定圣约中所提出的权力，取消主教制度。许多开始保持中立的贵族纷纷公开拥护国民的主张。苏格兰商人到国外购买军火武器，把《圣约》送给在大陆当军人的苏格兰人，其中有一个最好的军官叫亚历山大·莱斯利奉邀回国，准备到必要时统领起义者。1639年2月27日，以苏格兰人民的名义对英吉利国民发表了宣言，把他们的痛苦告诉他们，而且驳斥了两者的公敌对他们的诽谤和诬陷。

宫廷在收到这通宣言之后，付诸一笑，他们嗤笑暴乱分子的行为，认为他们是无理取闹。廷臣们一致认为唯一的麻烦是屈尊同其进行战争。廷臣们问：同这样贫穷，这样粗俗，这样无名之辈打战，能够有什么好处，什么光彩？查理自己虽然是苏格兰人，但仍深信英格兰人素来憎恶与藐视苏格兰人，这一点将会阻碍《圣约》及有关宣传在南方人的心理上产生什么效果。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团结各国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双方的界线，英格兰的不满分子从苏格兰人的事业中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所在。于是两个王国之间很快建立起秘密通讯。苏格兰人的宣言传到英国各地，人们所谈论的是他们的疾苦，他们的举动和他们的希望。为时不久，苏格兰人获得了朋友及支持。遍布伦敦各州及陆军中，甚至在宫廷里也有他们的暗中的支持者，经常透露出一些消息，有时对其他廷臣夸大暴乱者的兵力，或说他们军纪严明，并装作很为国王担心的样子，并假装对由于国王不肯通融，一意孤行而招致许多困难和危险而感到不胜惋惜。

当国王的军队开往苏格兰的时候，有人恳切地劝告部队的司令官埃塞克斯要小心提防，最好等援兵到来再向前进。人们传说敌军比他们装备精良得多，又说有人看见敌军在某处，离边界不远，又说敌军占领了全部要塞在国王的军队到来之前具里克就已陷落在敌人手里。埃塞克斯伯爵本是个小心谨慎、忠诚可靠的军人，他麾兵直入具里克。不久就发现：叛党并不如传说的那样人数众多，那样准备周全。但这样的说

法既能粗心地被产生传播，就自然会有人热心听信，很叫人心神不宁。

4月1日，国王来到约克，亲自督战。摆出了炫人眼目的盛大排场，他还在那里以皇家的威仪不可抗拒的优势自鸣得意，他很高兴地自慰，认为单凭这样的威仪就足够叫叛党俯首就范，各回原地了。

贵族们与一群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约克，如赶赴节庆一般，这个市镇与军营，显出了宫廷和比赛大会的景象，一点也不像一支将要投入战斗的军队。这使查理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环绕在他前后左右的，却都是阴谋、混乱和拒不听令。

而此时苏格兰的3万精兵，在莱斯利的率领下却挥师南下，赶往边境。6月5日，他们进驻具里克城，在近郊的斯劳山丘上扎下营，与国王的23000人马一南一北地对峙着。

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就数量上讲双方旗鼓相当，王军的骑兵还占优势。但苏格兰军队有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在营地上每天击鼓，集会祈祷，宗教激情鼓舞士兵的斗志。而国王率领的却是一支不知为何而战的队伍，军心涣散、

士气低落。他这次出兵，遭到许多人的咒骂，所以军官和士兵们都迟疑不肯开战。苏格兰人深知敌情，就利用这样的优势，用温和和恭维的语气写信给对方的头领，表示完全信任英格兰贵族及人民的善意，求他们居间调停，代求国王赐与他们公道与恩惠。

当霍兰勋爵指挥着王军骑兵进入凯索阵地时，士兵们从心里不愿打仗，一遇见苏格兰人，转身就逃，一哄而散。

不久，苏格兰人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后，就很谦恭地对国王自己上书，但丝毫没有放松他们的要求。国王此时左右为难，进攻不得手，没别的办法，6月11日召开会议，国王高傲如常，却急于要了结这件事。苏格兰虽然执迷不悟，但还不算无礼，而且态度毕恭毕敬，这使查理自尊心勉强得到满足。劳德觉得危险在前，力劝国王于1639年6月18日在具里克签订和约，解散军队，承认长老会全国大会，保证苏格兰国会的自由召开。

双方都已料到，战事不过是暂时中止。当遣散军队的时候，苏格兰方面颁发了军官的薪俸，吩咐他们预备随时打仗。在查理这方面，刚遣散

他的军队，又开始秘密地招募另一支军队。订立和约之后一个月，查理召斯特拉福德来伦敦咨询军事，斯特拉福德奉召后立刻动手，到达伦敦后，以全副精力来对付反对国王的人。埃塞克斯受了冷落，尽管他仗打得很好。但此时却只好心怀不满地告退了。军官们仍以无能无勇互相责备不休。王后的幸臣起劲地活动，企图利用普遍的不安于法来增进自己的富贵，打击自己的劲敌，而国王自己却是灰心丧气，焦躁不安。过了不久，斯特拉福德便开始感到吃力，他不能使国王采纳他认为必要的计划。宫廷的阴谋不久就指向他了。群众们带着焦虑的眼光看他入朝，但人们不知他将怎样运用权力。当人民不久就得悉他怂恿国王使用最严厉的手段时，人民大众就开始咒骂他。“我真想给这些百姓们一顿鞭子，叫他们知理一点！”斯特拉福德气哼哼地说。于是他决定打仗以拿回威信。但拿什么支持战争呢？国王和国库都已囊空如洗，而且再也没有什么新鲜动人的理由来对全国人民说为打仗而捐钱。向外国借款？但这会激起整个英格兰的愤怒。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国王决定召集一个新议会。

当英格兰听说要召集议会开会，都非常惊奇。英国人现在对于一个合于法律的改革已不存什么希望，虽然他们曾经十分企望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但国王的专横使他们对此失去了信心。

在英国人的思想中，暴力的手段是相当陌生的。因此，他们还是在各选区选举出代表去伦敦参加议会。

1640 年 4 月 15 日，中断了 11 年之久的英格兰国会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大厦重新开幕了。国王发言简短，强调苏格兰的危险，对苏格兰人的大逆不道大肆渲染了一番，出示他所获得的密信以证实苏格兰人勾结外敌入侵的“叛逆”阴谋。上院议长接着发言，点明陛下期待的不是国会对他的忠告，也不是对王政提出的异议，而是国会提供的军费。

国王承认，要他们先议决军事供应，然后才考虑民间疾苦，并许诺，那时他将认真听他们发言。但是国王并没能压制住下院，一个议员严正地说：“苏格兰人入侵的危险，远不及专制统治的危险那样可怕，国王所说的危险在遥远的地方，而我说的危险就在这里，在家里。”反对派

领袖皮姆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他慷慨陈词，历数王政弊端，尖锐地指出：王政弊端最大的就是国会的中断。下院决议：拨款的前提，必须是惩办国王近臣；并取消近年来的一切暴政。双方僵持不下，国王感到这次议会同前几次一样难以相处。于是他决定换个方法。5月4日，派人送信给下院，提出：如国会同意3年内征收12项特种捐税（约60万英镑）作为王室经费，他同意未经议会允许，绝不征收船税。但这是很不充分的让步，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原则上认定，无论以往或将来，抽收船税，统统非法的。但下院此时还不想完全与国王闹翻。

正当他们准备表决允许供给款项但不确定数目时，大臣哈里文站起来说："除非议会决定照办国王信中的全部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下去。因为国王绝不肯接受少于他所要求的数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赞同哈里文的半恐吓半无礼的意见。至此，全场大惊，怒不可遏，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愤愤不平。议会上的闹剧传到国王的耳朵里，第二天，他便宣布解散议会，这就是只形成三个星期的短期国会。

后来成为克拉伦勋爵的爱·海德，去会见

了汉普登的朋友，圣约翰，海德感到沮丧，而圣约翰却不然："这很好，事情在好转之前，必须变得更坏！"

在召开短期议会期间，斯特拉福德前往爱尔兰王国在筹划拨款。4 月 4 日，他从爱尔兰回来，他从爱尔兰议会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全部东西。得到了供应，武装人员，贡献和承诺。随后，他又在国内号召进行捐款，并自己为榜样，不到三个星期，就募集了 3000 万英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给的，可见苏格兰的国教教民和广大英国人民的宗教热情，已经被出卖了。另一部分则是靠勒借、船捐、专卖来获得。很快，国王就同斯特拉福德一起与检阅聚集在苏格兰边界的军队了。

他们在途中得悉，苏格兰人已采取攻势，已于 8 月 18 日在纽伯恩打败了和他们初次遭遇的苏格兰军队，8 月 21 日进入英格兰境内。

苏格兰人在英国境内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同伦敦许多心怀不满的人物缔结了紧密的联盟，答应如果开战，将有支人数很多的队伍帮助他们，甚至还派遣了一个使者到苏格兰，带着一根空心手杖，内藏一件公文，密谋相助。

公文末尾，有萨维尔勋爵所伪造的6个英国最伟大的贵族的签名，以促进苏格兰人的更大的信任。

英国国内这时也是群情激奋，议会刚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开表现反战情绪，伦敦贴出告示，要将劳德揪出来碎尸万段，一群狂怒的人攻打劳德的住宅，使他只好逃往白厅藏身。另一群人围攻设在圣保罗大教堂里的高等委员会的法庭，高呼："不要主教，不要高等委员会。"

政府在各地征兵，只有用暴力手段才能征到兵，许多人为避免入伍，不惜自残肢体，甚至自缢相抗。对于那些不抵抗而服命入伍的人，在街走过，就被人羞辱，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懦夫。所到之处尽遭白眼。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伦威尔军队，大旗上锈着圣约，在空中飘扬，鼓声咚咚作响，叫士兵呼口号听讲经，太阳一出便可听见全军朗朗的唱诗与祷告声。

英军眼见这种情况，又听说苏格兰人以友好、虔敬的热情对待英国人，士兵们软了心肠，大骂这次是一场渎神的战争。他们认为这次作战是反对自己的同胞兄弟和上帝的。英军未战

已先败。

苏格兰2万步兵和2500名骑兵，长驱直下，杀到泰恩河畔，他们申明并无敌意，只是请英兵允许他们渡河，一个英国哨兵开枪打他们，他们便放炮作答。战斗开始，但英军一触即溃，此后，苏格兰人攻克纽勃恩，进入达勒姆群，占领纽卡斯尔，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英军骑兵司令康韦勋爵，犹图顽抗，但先是受到莱利尔炮兵的轰击，接着又被一支小分队迂回包抄，几乎全军覆没。王军全线崩溃，士兵成群结队地哗变或逃亡。

斯特拉福德所指挥的爱尔兰军队，是批既不因胁迫就范，也不为祈祷所动情的下层群众，而且毫无作战经验，没有两个月的训练，根本无法进行战斗。

在国王左右，在他的营里，甚至在他的家里，都有许多人同苏格兰士兵暗通消息。苏格兰人虽然所向披靡，但行动仍很审慎，谦恭，对所入侵之处秋毫不犯，对俘虏仁至义尽。他们占领纽卡斯尔后向国王提出和谈建议，要求偿还巨额赔款，并就此事召开英格兰国会，并陈兵国王所在的约克城下，等待答复。

这时，英国宫内有人对斯特拉福德伯爵提出弹劾，于是他奉命不得离开自己的住处。

10月初，双方在约克郡的雷旁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在问题解决之前，让苏格兰军队占领英格兰北部一些地区，并支付每天850镑的费用。

11月3日准备定为议会的开幕日。有人力劝换一天，因为这是个不详的日子，亨利八世在位之时，曾于11月3日开会议，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并没有理会这些预言，他同国王一样，已经属于奋斗，只寄希望于未来的机运。但有谁知道，结果将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双方都远远不曾猜想得到的。

第四章　无家可归的国王

敢站出来跟国王斗的人并不多，但克伦威尔就是其中一个。

国王的处境不妙，上自己的会议厅开会，都得象贼似的偷偷溜进去。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开议会，他未带仪仗队，也几乎没有几个随从，就前往威斯敏斯特；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国王没有骑着马耀武扬威的在大街上走过，而是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以避人耳目。在议会上，他的讲话空空洞洞，扭扭捏捏，丝毫激不起议员的同情。下院代表神情木然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但一种不屑与傲慢却始终洋溢在他们脸上。他们现在个个表情冷漠，不再有人谈到和解。他们认为，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是该运用议会的权力以铲除所有的滥用权力的事，如斩草除根一般，不留一点剩余。

刚一开始，议员先将人民的所有的疾苦毫不含糊地宣布出来，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市镇或一郡的请愿书带来，读给众人听，然后以它作为演说词的内容；建议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于是，在几天之中，国内各处地方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就是这样地把所有苛政如专卖、船捐、渔捐、主教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

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议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以至国王根本没有机会反驳。

尽管如此，议员们好像认为这些措施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了四十多个议员调查社会弊病，并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民成群地骑马来议会呈递他们本镇或本区的申诉书，议会号召各方各处都来陈诉；有许多人在讲演台上发出呼吁，有的在大街上痛陈民间疾苦，无论是以什么方式写出来，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收受，又无论是冷冷地控告整个政府，抑或是指名道姓地控告某人，

要求严惩，议会都一一认真接纳并审理，不管对方是谁。

国王的臣仆们看到下议院拥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大权，又有使用此权的决心，因此凡是怕人控告或晓得自己有仇家的无不人人自危，他们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宫廷唯一的愿望就是避免人们的注意，免生事端。

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了占有他们原来的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随便流通。国王和主教们的专制虽然仍然存在，但都是动弹不得，没有人再听他们的。

这时，国王十分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下了命令说保证不许议会动他一根头发。斯特拉福德开始犹豫不决，国王再三派人请他来，他只好冒着风暴的危险，决心在上议院根据他新近收集到的证据，亲自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

皮姆和他的朋友们晓得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决定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 11 月 9 日到达伦敦，10 日因劳累而生病在床。11 日，下议

院就根据皮姆的提议，突然弹劾他大逆不道。

只有一个人提出异议，皮姆坚决地说："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假使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却不是当裁判官。"于是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刻将弹劾案送与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这时正与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到上议院，而皮姆已先他而到，他看到院门紧闭，门官迟疑拒绝他入院，他很生气地怪责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有人叫他退出，伯爵立住脚，四面看看，犹豫了一会儿只好退出。

一小时后议会传他进来，他奉命在栏前跪下，上议院于是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的陈诉，并且根据下议院要求，决定送他到伦敦塔；他想申辩，但议会没有给他机会，于是命令执行了。不久，又跟着弹劾劳德；他一向自觉良心无愧，因此当他听到议院要弹劾他后，他非常惊讶："在下议院里，没有一个人会从心里相信我是一个叛国的人。"埃塞克斯伯爵立即就这句话提出抗议，塞伊勋爵愤愤地说："他怎么敢指手划脚，指示我们该用什么程序进行！"对国王驾

前宠臣的惩治，无疑是向国王权发出真正挑战的序曲。1641 年 1 月 19 日，下院提出了一个议案规定至少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 12 个贵族在威斯 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合作而召集议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实行选举议员，如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民举行代表的选举，若不经过两院的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规定只能于开会后五十日解散或停止议会（暂时）。

又规定选举各自的议长之权，完全属于两院各自本身。国王一听到议案，就打破了已久的沉默，他召集两院的议员到白厅（1 月 23 日），对议会说："我喜欢多多召开议会，这也是我殷切的愿望，因为它是沟通我们之间正当了解的工具。但你们要求把大权交给郡长及地方警官们以及不管什么人，来办该由我办的事，我绝对不能让步！"

下院不予理会，仍然进行表决，国王现已只有让步，但为保持他的尊严，却要说几句话来表示他不愉快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因为截至此时为止，你们的

确不曾鼓舞我为你们尽过什么大力，因为你们所进行的只是与你们本身有关系的事，而不是与富国强民有关系的事。……现在我既已经做了所有我份内该做的事，你们也已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

两院决议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连议决要求废除皇室法院、地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及所有非常法庭。

没有人反对这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众人的一致要求就是改革政治，而不顾及社会情况或宗教意见。这个时候尚未有人用心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及其影响的程度，人们都赞成改革，可是没有人追问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是有若干目光远大思想高人一等的人物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克伦威尔等人，都已经在那里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的权力从国王手中夺走。这是国民的权利，这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

在宗教事务方面情况却大不相同，从第一天起，就可以显然看出人们的见解与愿望是极不相同的，伦敦市递上一张 15000 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全部废除主教制。几乎与此同时，700

名教士则要求废止主教们的干预政治权，废除他们在教堂里的专制，废止他们管理财政之权。不久，又有从各郡递来的十几件请愿书，据说有10多万人签名的，呈请保持主教制。在上院和下院之间也发生激烈的争执，1641年1月16日，下议员们凭借自己的权威，甚至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了神像、神经、十字架以及偶象崇拜所有的其他物品。

对于这一问题，当时并不存在任何占绝对优势或普及全国的意见或意向。在赞成主教制的人们中，有人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亦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所不能缺少的，因此认为如果主教制度受到了严重打击，君权也不免受损。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应该保留某种形式上的东西，为了传统，为了法律，也为了国家的利益。

在反对的人中间，意见也不尽一致，许多人都不以主教制为然，许多人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力，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地位，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改变的，议会永远有权可以更改它。公共利益是决定主教制应否存在的唯一根据，维持或废除主教制，本就无一

定的原则。

但长老会的长老们和他们的牧师们，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所谴责的偶像崇拜，这是天主教的传统。因此，长老们以笃诚信仰而产生的愤怒起来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和礼拜形式，为了教会的民主体制，他们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因此，就在政治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这许多不同意见的争议阻止了议会的发展。一到把宗教问题交付讨论的时候，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甚至互相反对起来。没有哪一派人每次都是被同样的精神所鼓舞，致力于同一个计划。

皮姆、汉普顿着意地支持长老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是人们都晓得他们并不同情长老派如痴如迷的激情，且知道他们心里想的只是消减主教们的干预之权，而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但最为众望所归贵族之中，主教制却有许多拥护的人。

谈判开始了，但双方都对它不存多大希望，甚至也许根本就不希望其成功，问题马上涉及军队，有人提议将陆军开往伦敦，并立即将国王

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它较为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忠于国王和教会。

但许多心怀不满的人们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手写的短篇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通。

对斯特拉福德的审判轰动了整个伦敦。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到法庭出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同他们一起出席的，有为此案专程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委员们，80位贵族充当法官。下院议员们坚持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因为对有关生死的重案，主教们向来都是不愿到庭的。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隔开了的厢座里，他们急于要看清楚全场的动静，但国王还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掩饰不住她的好奇心。成群看热闹的人，男男女女，有的在四面的走廊里，有的高踞在台阶上的，都是被这个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周知的特色所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提到威斯敏斯特，他在道口拥挤的人群中走过，既无纷乱，

也没有人侮辱他，尽管为众人所恨，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大人物”，他的令人生畏的“威名”，仍能令人“起敬”。他的背微微有些驼，但眼睛仍烔烔发光，傲然自若。群众见他走来，免冠让路，他亦还礼致谢，但人们如此多礼，却未必是个吉兆。他显然看不起他的对手们，曾经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能够洗刷他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大吃一惊，而且隐隐难过，他没有想到那些一直对他唯命是从，献媚取宠的人能够突然间改变了态度转而向他兴师问罪。

第二天一个偶然的事使他晓得他对自己的处境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我的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但皮姆听了这句话马上驳斥说：“他的过错是这番侮辱性的话是针对下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下，道歉求饶。从此后，他变作完全的镇静，能够控制自己，不叫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或不耐烦的神色，不再说一句可以招人反对的他的话。

有 13 个人轮番控告他，达 17 小时之久，他

单枪匹马地就他们所提出的罪名辩驳，并没有人协助他。有许多条控诉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但其余诸条不是很愚蠢地言过其实，便是被盲目的仇怨所障，不符事实。斯特拉福德拼了全身的气力为叛国的指控洗刷，他很雅贵地批评自己的短处、自己的弱点，他以谦恭的尊严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并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所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是于法不合的。

但他们对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排除了很大的困难，克服了下议院的阻挠，才得着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允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又不许，等到开审的前三天，才准许传讯证人，而大多数的证人却远在爱尔兰。

斯特拉福德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承认他的权利，他就感谢他们，法官们拒不承认他的权利的时候，他也不出怨言，他从容自若："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亦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由于斯特拉福德的成功辩解，原告们感到

十分沮丧，下议员们曾两次催促贵族加速进行审讯。如果继续迟缓就是糟塌了国家非常珍贵的时光，但贵族们拒绝了。

人们明显感到事情不妙，下议员们此时十分不安，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自己具有的天才具有决定性地给了他极大的便宜。他快要逃出了他的对手们的手掌心了。

下院怎能眼睁睁看着改革的事业几乎还没有诞生就要被最危险的仇敌击溃呢？于是下定决心，采取突然的大胆的一击。

1641 年 4 月 10 日，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斯特拉福德的刑。这种程序，无须依照法律办事。并非是没有前例，在国务大臣哈里·文的文件中，找出由他的儿子交给皮姆的几张字条，以此作为证据以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罪，这些字条上说，斯特拉福德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劝国王同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

4 月 13 日，斯特拉福德又为自己辩护，他的发言很长，以卓越的雄辩的才能专心致志地

证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的任何行动犯了叛国罪，相反，斯特拉福德却振振有词："各位勋爵，这些先生们告诉我：他们所说的话原是为了国家，以免受专制法律之害，请允许我说，'我说过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国家，以便免受他们的专横的大逆不道之害。诸位勋爵，我们不是靠法律生活吗？诸位勋爵啊！假设这些罪名（他们称之为大逆不道）曾被无论哪一位熟悉法律的人所指出，我便不能以我不知有这法律为理由而宽恕自己，但倘若根本并不存在这种法律，那么怎么能单凭高压和严厉定我的罪呢？我请你们当心，不要弄醒那许多睡狮，不要利用搜寻出来的忽视已久，已被虫蛀的档案，那些睡狮也许有一天会把你们的子孙们撕成碎片。当年你们的祖先们十分小心，把那些睡狮镇在议会所定的法令的笼子里，希望你们切勿在杀人的艺术上野心勃勃地和他们争斗。说到我的可怜的自身，假使我不是为你们诸位大人的利益，为了一个圣人在天之灵，她把神圣不可侵犯的誓言交付给了我，"

说到这儿，他停止不语，泪如雨下，但立刻抬头前望，"我绝不该费事把我的朽旧的皮囊保

持下去，我满身都是病，我也真的不乐于再拖我的病体走来走去。”他又说不下去了，好久才呻吟着：“诸位——勋爵，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但我的声音和精神都不行了，我说在谦恭地跪在你们面前，无论你们断我生，断我死，我都认为是公正的，我将一样赞美上帝……。”

会场静得出奇，起先人们的宣闹声不在了，人们听了他这番话，都可怜他。

皮姆持着最大的毅力念完了写在一张纸上的关于斯特拉福德罪行的答话，但明显与议员的感情格格不入。

激情似乎过去了，但愤怒还在，人们或许同情斯特拉福德本人，但他是作为反王权的第一道靶子，却必须铲倒。皮姆与他的朋友们匆匆地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等等的二读。显然有几个人反对二读书，但众人都深知，必须办斯特拉福德的罪。

贵族们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听取了斯特拉福德的律师的陈述，可众议员们却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4天之后，斯特拉福德的判案通过了第三读。

国王听了这一消息后，写信给斯特拉福德：

“你只管放心相信我的话，无论你的生命或你的财产都绝不会受到损害。”于是国王开始与下院谈判，但议会寸步不让。有人愿以2万镑贿赂伦敦塔总管威廉·贝尔福爵士，并且他许以斯特拉福德的一个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还有人提出接收100名经过精心挑选的人入狱，作为卫兵。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但一个个都失败了。

5月1日后，国王只好召集两院，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不启用他，但同时宣布，无论什么辩论，什么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置斯特拉福德于死地。

但，人们和议员的大胆超出了国王的意料，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舞刀弄剑，游行示威，包围了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疑不投票的贵族们。还有传言有人在下院地下埋了炸药，不久就会爆炸。民团已经武装戒备，成群的人围着威斯敏斯特。

下院正在开会，两个异常肥胖的人，半德尔顿和莫伊尔先生站起来发言，于是地板咯吱一声，立即有人喊：“炸药爆炸了！”人们都惊恐地冲出大厅……

整个伦敦人心惶惶，此时下院巧妙地利用了局势，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不久上院就被下院征服，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斯特拉福德犯的是叛国死罪。

剥夺公权的议案交付最后评议；除去缺席的34名贵族，出席的人中有26票赞同，19票反对，现在就差国王的批准了。

查理陷于两难之地，他确实想救斯特拉福德，但上下两院却寸步不让，反而逼得更紧了。有人劝国王“宁要国王的良心，而不要一个个人的良心。”牺牲一个人以保全君位，但国王始终没有同意。

就在这时，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了国王：

“国王陛下，在长时间的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得到了对我的唯一的结论：一切私人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的神圣本身幸福，以及国家的幸福。我求陛下通过批准议案，以移开阻止国王与臣民们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

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您更可以告无罪于上帝，比全世界任何人更能告无罪于上帝。一个人既出于自愿，就无所谓受到损害，

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宽宥所有的人和所有我所做的事，我只求陛下施惠于我的可怜的儿子和他的三个姐妹，陛下所施的恩惠既不宜多于，又不宜少于他们的不幸的父亲所应该受惠的……”

次日，国王同意了那个决定命运的议案：“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只为情便！”

议会读了此信两次，但没理会国王，便吩咐次日行刑。

第二天，5 月 12 日，斯特拉福德走出伦敦塔，他走在卫兵的前头，向四周顾盼，当他走过劳德的囚室时，一躬到地，“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劳德两手向他，但竟受不了刺激，仰身跌倒，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继续往前走：“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护你的无辜。”

他走到断头台前，从容地登了上去，稍稍跪了一会，便站起来对围观的群众说：“我愿我们王国享受人间的一切繁荣，我生在世上一日，一直为此进行不息的努力，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但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

们扪心自问，认真地检查你们自己，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鲜血写这个改革？当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得想想这个问题，你们切勿让我的最小的一滴血，起而判断你们之中的任何人有罪，那将使我为之不欢。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了路。”他又跪下，祈祷了片刻，随后掉过脸来，对着他的朋友们，向他们告别，同每一个握手，“我快要完啦！一刀下来，就将使我妻成为无夫之妇，使我子女成为无父之儿，使我的仆人成为无主之仆，使我和我的亲兄弟及所有的朋友分离，唯求上帝：爱你们如爱他们一样。”他脱下袍子，“我感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亦不会被害怕所产生的任何灰心所吓倒，现在很高兴地脱下我的衣衫，如同我平日上床睡觉之时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又祈祷了片刻，便把头放在石台上，自己给刽子手动手的信号。——他的头落了下来。

刽子手高举起这个头给众人看，口中念道："上帝保佑国王。”人群一阵狂呼乱喊，散往市中，去庆祝胜利，但也有人低着头，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刚才亲眼看到如愿以偿地杀了人，但似乎并没什么欢呼可言。

查理使了个缓兵之计，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

国王丢尽了脸面，忽然想起了他原定访问苏格兰的计划，并说因为要签订即将达成协议的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也就在这时，有人说王后身体有恙，准备赴大陆就医。

本来人们就怀疑王后与大陆国家有秘密往来，如今国王和王后突然同时出行，便使人疑虑重重。事实很简单，查理在伦敦可以说是无权无势，在他左右的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廷臣和心惊胆战的枢密顾问官们。他早就想借他祖先的王国和欧洲的专制帝王之力，重新掌权。

下议员们并没有将他们的怀疑形之如口，但是他们要求王后不能离开伦敦，国王应暂缓起程，查理为此大为不快，但仍作出让步。

下院暂时放心，但仍紧紧催促查理遣散军队，但因无遣款，和有些军官反对而进展很慢。

国王暂缓出行的期限到了，下院要求国王再次延期，但国王没有答应，他指定了埃塞克斯为特伦敦以南的大将军，负责摄政，便于8月10

日怀着满肚子希望离开了伦敦。下院很快看出，国王不在，正是他们有所作为的时候，汉普登指挥的一个委员会奉命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的近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一些人在议会休息期间，以皮姆为委员长坐镇威斯敏斯特。上院也有许多议员散往全国各处奔走，寻找新的力量，两党都在考虑新的战争。

而国王在苏格兰过得并不安宁，他不得不暂时俯就于苏格兰教会的要求，放弃一些国王的古老的权力，并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而优待盟约党的党魁们，给其加官进爵。

但暗地里，他却一直在思考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仇敌，他相当清楚正是英格兰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同苏格兰人互相通信，苏格兰人才敢兴兵进犯，因此，他始终惦记着抓住一些证据以制服他所憎恶的人。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叫蒙特罗斯的伯爵在一天夜里，悄悄被带进国王的卧室。这个蒙特罗斯伯爵是一个年轻大胆的家伙，起初效忠于盟约党，但后来重新得到了国王的恩宠，他曾答应国王寻找一些文件作证据。就在这天夜里，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合盘托出，并控告汉密尔顿和

阿尔盖参与了不逞之徒的阴谋，他使国王立即拘捕这两个人，“假若他们抵抗，立斩无论”。

查理一向不惜采用大胆的决定，他完全没有考虑这样粗鲁地进行行动可能会招致的后果，他刚刚同人民“言归于好”，现在，又要举起屠刀。

但正当计划执行的时候，那两个贵族却事先得到通报，离开了议会，退居至内尔堡，并传出风说国王要刺杀他们。

这一消息传出后，人们都惶恐到了极点，国王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逃难的人这么害怕？人心惶惶之余，矛头都指向国王。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并不惧怕国王，但也不敢走极端。

国王倒是很聪明，为了掩饰他的阴谋，竟宣布提升了两个贵族，晋封汉密尔顿为公爵，晋封阿盖尔为侯爵。

但汉密尔顿与英格兰的委员会却完全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立即报知伦敦，并召开议会。

一时间，党人都很恐慌，他们虽然不完全相信查理，却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危险。下议

院第一天开大会，他们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他们认为为了保卫议会的安全，卫兵是必不可少的。伯爵立即照办。

就在这边惶惑骚动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 11 月 1 日爱尔兰发生暴动，其势甚猛，蔓延各地，到处屠杀，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威胁。

叛乱者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宣布自己同国王从英格兰的清教徒手下解放出来的计划，清教徒是他们的共同压迫者。变乱一起，势如破竹。在爱尔兰的基督教徒，到处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攻击，逐出住宅。甚至杀害。

伦敦得到了消息，说杀了至少十万人。

整个英格兰都响起反对天主教士的叫喊声，而且充满了恐怖和仇恨。

国王查理却暗暗得意：他与他的人民不同，他听见爱尔兰造反，既不发怒，也不害怕，更不忙于要平乱。他把责任交与议会，如果平乱不成，那么议会就要首当其冲受到指责，如果平叛成功，那就可以借机重新竖立尊重议会的好名声。真是一举两得。

但富于同国王斗争经验的下院领袖的手段却更为巧妙。他们痛快地接受了国王所给的平

叛的权力，但他们并不在意于平乱，他们所有的演说都是针对英格兰而发的，而他们的行动也不是去给军队补充给养，而是进一步收集新的证据，以期一举推翻什么东西！

机会终于来了！

就在议会开会不久，就有一个委员会奉命撰写了一篇“大抗议书”，指出全国所受的疾苦以及解救的途径，并宣称只有下议院才能把英格兰从天主教士、主教们及国王手中解救出来。

《大抗议书》共有206条。它详细地列举了查理一世即位15年以来内政和外交上的弊端，指斥了罗马天主教教徒、国教主教及王室大臣中“坏官”们的劣迹及其危害，其中列举了西班牙和法国远征的失败，强制性借款，未经国会同意的征税和出售专卖权等搜刮性的财政措施，对议员们的非法传讯、罚款和监禁、强行解散四届国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国会个人独裁、皇家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专横、斯特拉福德的胡作非为等等。

虽然它还没有正面指责，态度也算恭敬，但

是11月1日的议会上一经宣读，便立即招致许多温和派和保王派的反对，一些人抱怨抗议书的语言太过辛辣，又说有的疾苦已经解决，也有人指责文章对国王粗暴无礼，给奉异端的人以太多的希望。分歧逐渐的显然公开化，而且难以弥合。

11月21日，议会上又一次对大抗议书进行论辩，开了几个小时，正要散会的时候，皮姆、克伦威尔等人提出要将抗议书立刻提交投票表决，他们计算过人数认为能够通过，但由于福尔克兰勋爵、海德等人激烈反对这个动议，坚持要求改到次日投票，只好推迟一天。

克伦威尔对福尔克兰问道：

“你为什么要改到明天？今天很快就可以决定呢！”

福尔克兰勋爵推脱说：

“时间不够呀！因为这个议案必定要辩论很长时间！”

克伦威尔淡淡一笑：

“令人不快的辩论，但似乎并不能影响通过！”

159∶148，克伦威尔微微一笑："我将来再相信你说的话。"

第二天上午9时，会议开始后，温和派的人士坚持认为大抗议书要求过分，对国王的权限限制过大，有可能导致内战的爆发，而皮姆、汉普登、克伦威尔等激进派则坚决要求通过大抗议书，并声称这是为民申张正义。

这是在下院中第一次有两个党派相争，两党都挺身而出，都说是要支持公共利益与感情，两党都自称将相当高尚的独立的市民作为追随者。共同的希望将他们联合成为一体，而方向相反的畏惧，却分开了他们。二者互仇互恨、斗争激烈，由于他们要顾及一点面子，不敢按照内心的怀疑认真地扬声互控，因此，辩论就更加相持不下。

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身体孱弱、年岁稍高的及无所谓的人都倦而归家，国王的代理人尼古拉斯国务大臣不等辩论完毕就离席而去。一位议员讥笑说："这将是一个腹内无食的陪审团的一次判决。"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摇曳的烛光，照着一群群激动的议员，两党都很明智地洞察到一旦对方获胜的后果，但却都料错了本党得胜会产生的后果。

午夜2点，双方终于同意进行投票表决，结果159票对148票，《大抗议书》得以通过。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地结束。当汉普登站起来提议立即付印时，却立刻遭到对方的哄弄："我们早已晓得了，你们要抬高人民，撵走贵族。"海德说道："本院不习惯于这样地刊布其议决案，我以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若要通过这个议案，请允许我抗议。"帕尔默也说："我抗议！"这时，一些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我抗议，我抗议！"

抗议是贵族院习惯用的，而在下议院却前所未用，皮姆站起来证明抗议是非法而且危险的，但立刻遭到叫骂，并打断他说话，他不加理会，还是说下去，就有人以威吓的话对答，于是全体议员纷纷离席，有几个议员拔剑出鞘，敌对情绪达到了极点。

议员菲利普·沃里克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感到我们大家都坐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峡

谷中。”

这样又过了两个小时，东方已经发白，愤怒的双方仍没有任何让步。汉普顿温和但严肃地对这场丢脸的混乱表示惋惜，他建议暂时休会，下午再讨论，天色已经大亮，议员们拖着疲乏的双腿昏昏沉沉地离开会场，四散回家。

福尔克兰勋爵出来的时候对克伦威尔说道："这算是一场辩论么？""我将来再相信你的话，"克伦威尔又是淡淡一笑，"假使他们刚才否决了抗议书，明天我就变卖所有财产，永远不再见英格兰！"

下午的会议比较安静，双方都感到劳累，最后，凭 32 票多数去命人印刷，但命令的执行遇到了延搁，原因很简单，要先送去国王一阅，据说他每日都在期待着。

国王终于回来了，自信而又态度傲然，但人们都清楚他刚刚在苏格兰碰了钉子。

12 月 1 日，下院向国王呈递了抗议书，在宣读抗议书的时候，他很耐心地听了，随后他问道："议会想刊印这篇宣言书么？"他的委员会成员们回答说："我们无法回答"。"既是这样，我就假定你们不期望我会对这样一个长篇呈文立

刻予以答复，事关重大，我将以和这件事的重复性相称的速度作出答复！”

下院并没有就此罢休，竟然刊出了抗议书，艺徒们也递了一张呈子，把贸易反工商业所受的损失说得极为可悲，并将这些都归咎于天主教士、主教们以及行为极坏的地方议员。

面对这种局面，国王查理也在召集在下院中他的拥护者，并委以高官厚俸，在议会中拉亲信。

从此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党派开始形成。一个是剪着短发，衣着朴素的清教派教徒，他们反对国王，支持国会，称为“国颅党”。另一个戴着飘拂的卷发，骑士打扮的忠王贵族，拥护王权，反对进行改革，称之为“骑士党”。

1642 年 1 月 3 日，检察长爱德华·赫伯爵士以国王的名义进入上议院，控告金布尔顿勋爵及下议员汉普顿、皮姆、霍利斯、斯特罗德及哈斯勒哩格等五人以叛逆罪。罪名之一，阴谋推翻本国的根本大法，企图剥夺国王的法定权威；之二，散播丑恶谣言，使人民与国王离心离德；之三，兴兵抗拒国王；之四，勾结外兵即苏格兰人入侵；之五，取消两院权力，否定其存在，之

六，聚众滋事激起民变，反对国王和议会，用暴力手段使其罪恶手段得逞；之七，招兵置械，与国王宣战。赫伯特爵士同时要求上议院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所告各款，并看管五名被告。议员们听了尤如晴天霹雳，从来没人预见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没有人敢第一个发言。

金布尔顿勋爵起来说："我准备服从本院任何命令，但因弹劾我是公开的，我要求审判我也是公开的。"他坐下来后，众人还是一言不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自从大抗议书通过后，国王更加仇视下院之中的激进分子，骑士党中的许多人投向国王一边，其中有个迪格比勋爵一向以胆大妄为出名，他怂勇国王，利用现在下院不稳的时机，除掉圆颅党的头目。于是查理便一面向议会保证议员安全，暗中已经准备下手。

克伦威尔并未被列为重点，只因为国王还没有认识到他的重要性。

此时，迪格比勋爵就坐在金布尔顿勋爵的身边，附耳对他说："是谁给国王出的坏主意呀！我去打听打听，谁献的计，我就叫谁倒霉！"于是他马上走出议院，好象是去打听消息，但昨天

他还在向国王担保，只要检察官一控告，他就动手。

立即有人将消息传到下院，国王的人已经前往五位议员的住宅，正在将房内的东西封上封条。

下院当即投票表决，认为这种行为是侵害被控告议员的权利。于是命令警官尽职抗拒，并拘捕国王的官吏们作为犯人解来议会听审。

这时一个纠察官走进来说道："我以我主人国王的名义来请议长把五个议员交给我看管，我奉命前来拘捕这五个犯叛逆罪的议员。"他于是便念出五个人的姓名，5个人全在议院里，但无一人离座。议长命这个纠察官退出，议院既不喧嚷，也无人反对，于是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议会仍在开会时告诉国王，这样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成熟之后，才能答复。于是下院连同上院共同会议，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就联合议决，下令撤去贴在5个议员门上的封条，并要求派来卫队保卫议会。

要求派卫队的呈文送给国王，国王答复道："我明天作出答复。"下院于是暂时休会，定于明天一时复会，并吩咐被告们照常到威斯敏斯特

出席。

查理以为他的突袭可以得手，可是当他面对威斯敏斯特大厅中的六七个空位时，不得不说："我知道所有的鸟儿都已飞走了！"

1月4日1时，下院照预定时间开会，现在他们加倍不安加倍地愤怒，每个人心中都被一种新鲜的莫名的但却认为肯定要到来的危险的预感所激动。

保卫党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而他们对手中却传播着千百种谣言。有人说保王党已经开过会，说国王已传话要他们准备好，甚至有人说有两桶火药及武装已经从伦敦塔送往白厅。

众人都挤在五个议员那里，有种种猜测的，有报告消息的，亦有提建议的。事实上他们五个人心里要远远比众人清楚，法兰西公侯早已向他们通了秘密消息，皮姆的情妇卡莱尔伯爵夫人也早已告诉他们国王准备改变的信息。但他们却对此只字不提。

正当院里乱哄哄的时候，忽然一个军官走

进来，他是格兰里什上尉，刚从法兰西服役回来，由于他同几个被议会免职的军官有关系，因此能有机会知晓所有进行中的事态。

他告诉大家，国王即将到来，他说他看见国王已从白厅出发，有三四百人，其中有卫士、保王党、学生等，执有军器，亲自来拘捕被告的五个议员。

下院立即大乱，但是他们需要立即决定办法，因此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下院议员们力劝五个议员躲避。有几个人拔出剑来准备抵抗。皮姆、汉普登、霍利斯、哈斯勒里格四人立即走了。斯特罗德不肯走，人们就求他走，逼他走，但他仍不肯，国王已经进入庭院，最后，斯特罗德的朋友沃尔特·厄尔爵士用力把他推了出去，其余的议员全都各就各位。

国王穿过威斯敏斯大厅，在两排的随从中走过，但是只有他的卫队随他登楼到了议会大门口，他就不许他们再进一步。他免冠走进议会，陪他的只有他的一个侄儿。

全体议员免冠起立，国王走过的时候，看看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没见到皮姆，就走向议长说："议长先生，我请你让我，我要借你的位子

坐一会儿。”他坐了下来，四面看看，众人鸦雀无声。“诸位议员先生，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心里很感到歉意。昨天我因一件要事，打发纠察官来，拘捕被指控叛国的人，我本希望你们能服从，而不是得到你们的一个消息。我今天必须对你们声明，英格兰自有国王以来，决无一个比我更关心你们的权利，更愿尽其权力所及以维护这样的权利。但是你们必须晓得，一个人一旦犯了叛国罪，就无权利可言，所以我亲自到此。我想得知被控告的人中有谁仍在这里？诸位议员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们，只要我所控告的人是在这里，我就不能说议会是如我所衷心期望的那样正确，所以我到这里来告诉你们，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们，我都要拘捕他们。议长先生，他们在哪里？”

议长双膝触地答道：“陛下请听我说，我在这儿只是议院的仆人，我除了听从议员的指挥外，我自己是无眼看事，无口说话的。我诉求陛下赦宥，陛下无论怎样问我，我只能这样回答！”

“既然所有的鸟都飞了，”查理说，“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把他们送给我。”他抬起头，面对众多议员，“一个国王说话

是算数的，你们应该深信我从来不想使用武力，我将使用一种合乎法律和公平的办法，进行对他们的控告，因为我一向不想用别的办法。我必须提醒你们，他们一到这里，就应立刻送交到我那里，不然的话，我只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找他们了。”说完离席而去，他的帽子还在手中……

议员们一动不动，但当国王退出的时候，会场几个部分都有人喊道：“权利！权利！”

查理携王后坐上了一辆豪华的马车，离开了伦敦。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等他再回来时，等待他的只是一只高悬的板斧。

白厅里，王后急切盼望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她和国王心里早就对此寄予最大希望了。今天早上，查理先吻了她后答应她将于一个小时内回来，并自信他终于可以做他的王国的主人了。

王后拿表在手，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直到看到他空手而回。全盘计划失败了，国王已经不知道说如何是好，他的最聪明的朋友福尔克兰·海德和科尔佩珀都怒气冲冲，愁肠满腹，因他一意孤行而远远避开，不献什么计策了。

于是国王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市民窝藏被告。但人们都清楚这样的命令不会有什么效果，那五个议员所在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没人肯去捉拿他们。

这时，那个给国王出馊主意的迪格比自告奋勇，为了洗刷在弹劾五个议员时他的畏缩不前，借此想将功补过。他自愿同伦斯福德以及几个保王派一起，前往五个议员躲藏之处，无论是死是活，都要拿来见国王。

但查理这次却拒绝了他的建议，或许是他还剩下几分尊重法律的心，或许是他摇摆于大胆与怯懦之间，他决定第二天亲临伦敦市，郑重地命令市政厅交出那五个议员。他以为他御驾亲临，加上说几句好听的话，就会平息他们的怒气，可他万万没想到，他对这股怒气的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了。

国王于1月5日10时左右离开白厅，不带任何卫兵，以显示他对人民的信任，但是所到之处，人们冷笑无言。他来到市政厅，要求交出五个议员。他语气平和，态度友善，坚决表示他崇拜新教，并允诺按照法律办事，但没有人说恭维的话答复他，市政会同人民一样，严肃而面带愁

容。

当天下午，议员们开会，投票决议，认为他们的权力受到这样的打击之后应当得到补偿，并要求卫兵保护才可安全开会。

1月6日，在一队有力的卫兵保护之下，市政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同他们会晤，并把本市的全部兵力及市务机关交给他们，供其使用。

这个委员会是直接受控于五个议员的，他们甚至有的亲自到过委员会好几次，当他们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市民们大声欢呼，认为能够保护他们而自豪。议员们与伦敦市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亲密，而且彼此互相壮胆，要知道，五位议员还不能说不处于危险之中。

但这种担心很快就多余了。国王被彻底孤立了，他独自一人深居在白厅里，他的忠诚的党派们已经不再承认他了，保王党现在也感到受到威胁，有一些已作鸟兽散，或默不作声。

1月8日，国王试图写一封回信，再次下令拘捕五个议员，但如泥牛入海，音讯皆无。

两天之后，他听说议会又要开会了，民团、市民，连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亲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威斯敏斯特，如凯旋一般。

国王向来以为有把握得到船夫们的爱戴，而今只能愤愤地说：“怎么？连水老鼠们也弃我不顾了吗？”等到船夫们知道他说过这句话后，认为是奇耻大辱，言称此仇必报。

查理每天都听到普遍攻击他的呼声，却没有人肯出来替他说一言半语。王后一会怒不可遏，一会又怕得发抖，她力劝他离开伦敦。而保王党也向他保证，伦敦是议会的势力，但一离开伦敦，他们就能保证国王的威严，并能自由。于是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国王先退到汉普顿行宫，随后若有必要，再退远些，又打发人到各处传密令给地方官，好象他们能靠得住似的！1月10日，在下议员们复会之前一日，查理就离开了伦敦与白厅，同行的只有他的王后与他的女儿们，以及几个仆从。也许他还梦想有一天他会重返伦敦，入主白厅扫除他所厌恶的人，但是，他这一去，竟注定与伦敦永别。当他再回来时，却作为一名死囚，等待他的不是欢呼的人群，而是高悬在刑台的断头板斧。

国王弄了些兵，与国会南北对峙。虽然他是一国之君，现在只能象个有家不能归的受气的诸侯……

国王出走以后，次日下午2时，泰晤士河上出现了许多武装了的船只，这是护送那五名议员回威斯敏斯特的船队。其后有许多小船，悬挂旗帜，装满了关心拥护他们的市民。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口，五位议员向议长颂扬了伦敦市政，执行官们被介绍入议院，并领受了议长的感谢。

紧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4000名骑士、乡绅、地主等人组成的请愿团递上呈子，指控天主教的贵族，及恶劣的国王顾问们。他们每个人帽子上都有一张印好的誓词："我们誓与议会同生死，共存亡。"

几小时后，议会表决：若无议会的允许，不得用任何借口拘捕议员。并发信给朴斯茅斯的地方长官戈林，告诉他若不曾奉议会授权命令，不许在本镇接待军队或接受军火。并立即命令约翰·霍瑟姆爵士（他是约克郡的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立刻领兵前去防守赫尔要塞。这是

一个要害之地，是英格兰北部的重镇，并且那里有几处大军械库。

到了第三日（1月13日）下院议会投票议决，英格兰五国已受到威胁，宣布进入防卫状态。上院不批准这样的宣言。但这无关紧要：下议院通过了这个议案，并把他们的意愿告诉人民，因此，达到了目的。

再说查理国王，他在伦敦既无权力，又受人侮辱，但他一离开伦敦，就只有保王党一些家伙跟着他，他便不会再时时刻刻地被人指责懦弱无能，因此，他又觉得事情是可以重新出现转机的，他已下定决心：用军队来征服他的仇敌。

1642年1月12日查理前往沼泽，伦斯福德及一些保王党徒跟着国王，他们在这里秘密商定，由王后携带王室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及火药，并求取大陆的国王们的支持和援助。国王这方面则继续同议会谈条件，慢慢退到北方，定居约克，在那里等待机会和行动方式的成熟，以期发动进攻。

1月20日王后正极秘密地准备出发。而国王则请议会就他们所不满的事起草一份陈情书，并答应：立刻秉公解决一切，以结束这君民

之间无休的争论。

上院听到国王准备议和的消息，分外高兴，他们十分愿意结束这场使他们丢尽面子，而毫无利处的争执。但是下院的议员们，以汉普顿、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派却相当明白国王的用意，他们不相信国王会答应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即使口头答应，也根本不可能兑现。

极具军事头脑的克伦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战略而已，是要想一举解决我们。如果国王真的有诚意，那么，就先让出伦敦塔、国王的各处堡垒及民团的指挥权，交与议会所信得过的人掌握！"

贵族院拒绝受这一修正，但却有三十二个贵族反对这个拒绝，并在少数支持下，呈请国王。

1月28日，国王答复拒绝交出伦敦塔及各处堡垒的管理权，至于民团，却含糊其词，用躲闪的词句加以反对。他明显已不再让步，而是在拖延时间。

议会对国王及王后的行动掌握得一清二楚，已经预感到国王的阴谋。

2月2日，在议会强烈要求下，国王取消了

控告五议员一案，并撤换了伦敦塔的主管，批准了排斥天主教的呈文。但民团的领导权问题，国王没有妥协。

2月16日，他送王后到朴多佛港登舟赴荷兰求援，然后一路北上，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南北各霸一方，以此为根据地，首先开始的是口诛笔伐。双方都不断地进行谈判，双方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双方都是面向全国说话，面向人民寻求支持。国王列出君权的根据，君权的范围；而议会则指出上、下两院的特别权力，人民服从君权到什么程度，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习俗等等，都成了公开辩论的问题。

双方都争相在这一或那一事业上打上合法的印记，以求得人民的支持；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在他们的最终目标和行动上面披上合法的外衣，不独用理性而且用法律证明他们所作所为的正确性。全国人民同双方一样很热烈地参加进来，虽然几乎互相矛盾，但感情却是真挚异常的。许多新见解和新思想在他们头脑中酝酿，人们决心全力以赴地追求真理。

国王查理现在已不再统理国事，他的终极打算和他的独裁希望一古脑深藏不露，只字不提。他只是一味地命人引证法律来攻击他的敌人，那些在伦敦取代了他而执掌大权的人们。保王党的力量因国王的转变而力量增大，并以自由的名义作为武器反击他们的对手。他们反复指控皮姆，控告他是“皮姆王”，是“甜面包”，因为国王从前曾送一万英镑给他的女人作嫁妆。此外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粗话。

面对国王及保王党人的冲击，一些人恐慌起来。但这时却早有一个人看透了这一切背后即将到来的革命大潮。此刻下院还不太注意克伦威尔，但他出众的才干，比任何人更深入地明了革命的图谋。

在论战之中，他利用个人的活动和影响，在革命的前夕激发人心，准确地判断国王一伙的行动目的，细心观察，谴责以及引诱保王党走出家门，以给予严厉的打击。

克伦威尔正确地预见战争迫在眉睫，因为双方根本不可能依靠纸笔将谁打败。双方都自信一旦开战，自己一定会获胜。因此也毫不在乎付诸武力。只是有一种出乎意料的事，加速了这

一进程，将双方不可挽回地推到决斗的崖头。

4月23日，国王率领300名骑兵向赫尔前进，并打发人向守将约翰·霍瑟姆爵士打招呼，吩咐他把地方交出来。霍瑟姆为人懦弱，优柔寡断，他并不十分反对国王，可是由于不曾得到议会命令，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哀求国王暂等，以便把国王的命令告知议会。查理没有理会这些，继续前进，上午11时兵临城下。

城里原有他的党徒。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小儿子詹姆斯同约克公爵和他的侄儿及纽波特勋爵，都已经进了城，并伪称只在城里逗留一天。他们和市长及一些市民正想前去开城门，霍瑟姆命令他们各回各家，并亲自带领几个军官登上城楼。

国王在城下，骑着马亲口令他开城，霍瑟姆双膝跪下，张惶失措口称请国王饶恕他不能开城门，因为他曾宣誓守城，以候议会处置。

城下国王左右的保王党们不胜愤怒，哇喽了一遍，他们威吓霍瑟姆，大骂他反叛卖国，并对守城的煽动说："你们杀了他！你们把他扔到城外来！"但国王哪里知道，能使霍瑟姆抗拒王师的正是这帮军官，他们受皮姆、克伦威尔的嘱

托，镇守在此。

查理无论怎样威吓或引诱他们，都是枉然，对话了很久，仍无进展，国王暂时后退到离城很近的地方，同保王党人商议了一阵，似乎略有所得。一个小时后，打发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带二十骑入城，但再次遭到拒绝。霍瑟姆不无感慨地说："即使他只带十个人入城，这城也就不再归我了！"

国王查理气极败坏，回到城脚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人都是反叛，并写信给议会，要求议会惩罚这样"罪大恶极"的人。

议会完全肯定了镇守将领的行动，巧妙地回答国王说："国内的城堡与军械库都不是一个人的私产，人们能够拥有他的旧产或房舍作为己物，但国王无论引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说城堡与武库是他的私产。并申明当初把这些城堡授交他管的时候，原本是为王国的安全，因此，根据国王动机，亦可以授权于议会负责起管理之责。"这两句答复是坦白而又符合法律的，却无异于对国王宣战。双方都清楚，这就是宣战。

6月4日，议会命各郡立即组织民团，几个地方自动召集人手，并操练起来。同时议会下令

把赫尔要塞的军械、弹药等运来伦敦，虽然遇着许多阻挠，但是却办到了。并派几名委员到约克，住在国王周围，以获取敌方情报。

委员们的坚决程度，完全不逊于他们使命所带来的危险的程度。当他们到约克的时候，国王说："诸位先生，你们来此想要些什么？我命令你们走开。"委员们不肯走开，国王又说道："你们若当真不服从我，我就劝你们不要成群结党，或者妨害我的公事，你们若是违反我的话，我就把你们头押起来。"他们很恭敬地作了回答，却还是住在那里不走，他们都受到侮辱、威吓，不能自由出门，却仍设法探取约克的动静，送往伦敦。

整个约克同伦敦一样，一片骚动，国王开始组成卫队，却不敢用高压手段逼人入伍。他召集附近地方的绅士们，想依靠他们的热心来办成这件事。许多人到了会，讨论时一片喧闹，每当国王说话一次，他们就大声喝彩一次。

尽管保王党夸了许多海口，却不曾办出一件事。约克既无金钱，又无军器火药，连军粮也没有。国王几乎不能供给自己的膳食与日常的家用。王后在荷兰变卖了一些王宫的珍宝，但是

议会的威势如此之大，以致过了许久，王后才能将钱送到国王之手。

议会的情况却同国王相反。议会的问题现在很简单，上下两院走了许多保王党议员，因此，革命的领袖们得以独揽大权。大多数认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很大胆地接受这个事态，但主战的人见解和感情却不同。战争是要有巨大花销的，于是便诉之于伦敦市民的爱国心，人们都肯捐钱，捐金银器皿，捐珠宝，无论什么都捐出来，以装备几个骑兵队，这是借款，允许将来给8%的利息。教堂的讲坛上回荡着号召人民捐款的呼声，而收获远远超过了最热心的人们的要求和人们的意料。在整整10天之中，许多金银器皿川流不息地流进市政府，许多贫穷的妇女送来他们的结婚戒指，他们的金银发簪。

查理听说下议员们这个办法得手，便也照样试一试，可惜人民并不买他的帐，只有牛津大学将它的金银细软送与国王。剑桥大学也想这样，把金银包扎好了，但是被精明的克伦威尔识破，拦截住了这批细软。

国王的委员们好不容易地从这个那个贵族的乡下住宅里收到寥寥可数的几宗微小捐款，

对于将要到来的战争却只能是杯水车薪。保王党人剩下唯一的聊以自慰的消遣方法，就是嘲笑那些一毛不拔的同门，殊不知这正是一个在失败中的朝廷的最无用而富有危险的自我满足。

妥协条件到了约克，它超出了最鲁莽的保王党人的意料，也夺走了最温和的人士们的希望。议会要求完全取消国王的权力，权力完全归议会掌握，例如：册封新贵族，任免官职，教育国王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婚姻事项，全归议会作主；对于军事事务、文官事务以及宗教事务，无论有什么措施，必须先取得议会的正式许可，归根结底，这是他们骨子里的真正目的。有朝一日，这些均将成为革命的无法估价的成果。但是以议会统治权取代国王统治权，此刻尚非其时；这些是要筹划后来的制度的自然作用，加上下议员们能在日常行使的权力中发挥其虽不直接但能左右一切的影响时，方能办到。

国王读了议会所提出的条件之后，气得七窍生烟，两眼冒火："批准这些条件之后，我也许还可以光着头受人服侍，也许还会有人吻我的手，口口声声称呼我陛下，也许还可以有人捧

着我的杖与剑为前导，王冠是戴在我头上，权杖是握在我手中，但说到其实的权力，我早已被拒之于门外了，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不过拥有国王的象征而矣。”

查理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本来就没有指望有什么回复。得知国王中止了谈判，便连所有形式上的迟疑也消失了，正式提出内战议案。

激情同信念结合在一起，危险与机会并存，现在，这一天到了。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自由与枷锁在一片昏暗中交织着，即使是最具信心的人，也难免感到紧张。由于反对者极少，下院很快通过了战争措施，两院夺取了政府全部军需供自己使用。7月4日，设立了一个保安委员会，由5个贵族、10个下议员组成，奉命负责国防、监督各机关执行议会的命令。最后，下令组建了一支军队，其中包括了20营步兵，每营1000人，75支马队，每队60匹马。埃塞克斯为大元帅，统领全军。而克伦威尔同金布尔顿、布鲁克、梅里克、汉普顿、霍利斯等人一道成为各军队中的领袖。

克伦威尔从此才真正开始他的铁血生涯。

第五章　铁血生涯

幸运的克伦威尔同倒霉的查理国王在这几年中打了许多仗，结果是查理以一次次惨败，成全了克伦威尔的威名。

诺丁汉，王军起兵仪式上，一阵大风吹来，旗杆顺风倒下，险些砸着正自觉得意的国王查理。

战场是最容易产生伟人的地方。43岁的克伦威尔一生中最不平凡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对于一个小乡绅来说，今后20年将是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经历。革命的狂潮把他推向浪尖，踏上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级台阶。

1642年8月22日，位于特兰河谷的古老的诺丁汉城堡充满了忧郁沉闷的气象。天空阴云

密布，一阵阵狂风掠过，高耸在城堡塔楼上的旗杆更显得瑟瑟孤楚。小小的诺丁汉镇挤满了来自城堡周围乡村的几千名看热闹的群众，他们好奇地等待着，等待着这里将要举行的王室军旗的升旗仪式。

国王的军旗与当时流行的城市旗幡差不多，宽阔的旗面上饰有一顶王冠，王冠上面标着："该恺撒的东西当归恺撒！"的题词，旁边有一只血手直指王冠。

黄昏时分，人们可以看见这面旗帜越过平原向诺丁汉前进。受命擎旗的是布罗克斯和霍普顿爵士等人，三队骑兵和600名步兵簇拥着这面象征着王室权威的旗帜，紧随其后的是大约2000人的骑兵和步兵。这支不大不小的队伍，一声不响地在国王查理的率领下，缓步向前，由于仆仆风尘的跋涉，骑兵的轻盔和华丽的战服失去了艳丽的光泽，他们手中除了短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兵器了。

升旗仪式开始。国王站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小土包上，四周是激动万分但却心里没底的骑士。军旗在徐徐升起，查理国王盯着在夕阳余辉中升起的战旗，脸上浮现出一丝令人不易觉察

的得意，但这丝得意一闪即逝。

国王的传令官在狂风呜咽中开始宣读“勤王宣言”，无非是大骂逆贼，誓师讨伐。突然，查理好象想起了什么，从传令官手中夺过稿子，忙乱地作了一番修改。这使本来熟读了宣言的传令官心慌意乱，战战兢兢地唯恐念错，越着急越紧张却越是结结巴巴，大煞风景。

四周一片寂静，人们用不解的目光盯着国王和他的骑士们。整个空地上只回响着传令官那口齿不清的声音。仪式在少数旁观者有气无力地喊叫：“愿上帝恕免吾王！”声中凄凉地结束，若不是国王的军旗还在风中飘摆，人们真以为这是在安葬死者。

入夜，王室军旗便被移到了诺丁汉城堡的塔楼之上。但夜间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军旗由于挂得太高，被吹断系绳，坠落于地。第二天一早，国王只看到一根光秃秃的旗杆，不见了军旗，急忙命人找回，决定重新升到官邸的指挥台上。不巧的是指挥台地面坚硬，旗杆怎么也插不下去，骑兵们只好解下短剑，挖了一个小坑，才勉强将旗杆立住，但仍需4个人手不离杆地扶着才能确保不倒。

为了给升旗添上一点骑士风彩，国王在旗下举行了授予最高勋位的会议。年青的鲁伯特亲王受到了厚封，威尔士亲王则接受了最高勋位。

又一阵大风刮来，四名守旗官一不小心，旗杆顺风倒下，险些砸着正自觉得意的查理国王。人群一阵大乱，就在这时，信使来报，王军将领戈林所在的要塞朴次第斯在国会军重重包围，强攻之下，已经失守……

埃塞克斯伯爵当统帅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当他从伦敦出发的时候，很多群众大叫大喊地拥着他，在空中摇着代表他家族的桔黄色的旗子。当他到达北安普敦时已经聚集了近20000人。

本来查理一世升军旗时，队伍仅2000余人，其中训练有素的步兵仅300来名，骑兵是他的主力也不过800人。他的一个大臣曾不无恐慌地告诉他说："陛下，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人们赤手空拳就能逮住你。"因此，当时下院议长威廉·伦索满有把握地表示："两个星期之内，查理国王将请求国会对他的宽恕！"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埃塞克斯率领军队离开伦敦，直赴前线，可他到了达诺桑普敦之后，就停了下来，试图劝说国王回伦敦，于是下了一份请愿书给国王。本来他可以利用优势兵力一举发动进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寄希望于国王“回心转意”，命令部队接连“休整”。

而就在这时，向前推进的王军得到了西部和北部的新兵的补充，并且夺取了几个郡民团的军械库，得到了一些保王党的支援，半个月内迅速壮大起来，他麾下已经有精兵12000多人了。

9月22日，埃塞克斯进驻任斯特郡，此时离国王不过10多英里，但他又停止进军，并且3个星期按兵不动。

查理的部队人数日增，不久就超过了议会军。他看见埃塞克斯毫无动静，就胆大起来。

10月12日，查理悄悄离开鲁斯伯兰，向东南方向的伦敦进发，以期一击结束战争。

一周之后，埃塞克斯方获知这一消息，立刻回师追赶国王，解救议会，由于忙于追赶，沿途失散了相当一部分兵力，其中包括全部炮兵。

10月22日，埃塞克斯的先头部队在牛津郡

班伯里附近的埃吉山附近，追上了王军，展开了内战中的第一次大会战。

在叙述这次会战的进程和结局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当时英国的军事情况，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将来克伦威尔的军事天才给议会军所带来的决定性益处。

17 世纪的英国军事，不管是由于长期和平，而怎样落后于欧洲大陆诸国，但毕竟还是采用了三十年战争中初试锋芒的一些技术、战术及发明。枪炮大大提高了步兵的作用，但与骑兵相比较，仍旧是不完备和笨重的，主要适宜防守压阵。步兵手中的武器主要是大口径火枪，从枪口上弹药，靠火绳引发。因此一遇到风或天气潮湿，射击便有严重的困难：刮风会吹跑火药，潮湿会使火绳不能点着。同时，射击间隔长，效力不大，加上没有刺刀，所以对于猛冲而来的骑兵，一般只有打一枪的机会，一击不中，就只有逃命的份了。

也正因此，为了打退骑兵的猛攻，往往需要在步兵中编进一些矛兵。矛兵身穿步兵铠甲，手执 18 磅重的长矛，使敌人不能轻易靠近，而手持火枪的步兵也藉此有时间重新上枪，打击敌

人。这样的步兵队伍往往成为以速度勇猛见长的骑兵的克星。

但骑兵毕竟是机动性、突击性极强的兵种，身穿皮甲（有的还用钢甲）头戴钢盔的骑兵，用密集队形进攻，足以使任何对手胆寒，他们的武器是短枪马刀，短枪在进攻开始时使用；马刀在近战中使用。因此，在17世纪中叶，骑兵进攻的结局，通常预定了整个战役的胜负。

至于火炮，虽然英国人，特别是英格兰人，已从瑞典人那里接受了“皮炮”（即穿有皮革炮衣，发射1～3磅重炮弹的小口径轻型火炮），但大炮在内战中一般只起辅助作用，只在围攻堡垒和要塞时才有较大作用。

可是，当时战场上的技术装备，也不亚于当时欧洲大陆诸国的武装强度。

克伦威尔的功绩不在于军械技术上的革新，而在于战场上运用了独特的骑兵战术，而日后议会军对王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但在埃吉山下，克伦威尔还只是小小骑兵上尉，决定不了整个会战的结局。

第二天一早，国王发现有三分之一宣誓效忠的朋友不见了。

议会军埃塞克斯是个有能力但过于仁慈的统帅，他并不愿意同国王打仗。王军的总司令是年迈的宁德谢伊，实际统帅全军的是国王所宠信的22岁的鲁伯特亲王。他是查理的外甥，骑兵队的首领。鲁伯特本人无疑是骁勇异常的，但是，他缺乏作战的经验，缺乏将才所应有的基本素质——冷静的头脑。在进攻的时候，他过分陶醉于个人的血气之勇，在敌人局部溃逃中迷乱，丧失了对整个战场情况的正确判断，临阵的困惑阻碍了他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秉性傲慢又不允许他向敌人学习，这些都是他致命的弱点。

10月23日中午，双方排开阵势——王军和议会军都以步兵居中，骑兵位于两翼。午后2时，两军开战，鲁伯特的骑兵首先发起进攻，从左翼快速推进，议会军诚实的福蒂斯丘爵士所率领的骑兵刚与敌兵接触就溃乱投降了，一时议会左翼阵角大乱，士兵狼狈而逃。贪心的鲁伯

特想乘胜捞一把，穷追败兵2英里多路，掳到不少军输实物，但已经远远离开了主战场。而王军的右翼却遭到了斯特普里指挥的骑兵的顽强抵抗，而是反攻过来。双方的步兵都投入了战斗。王军因没了骑兵配合，大为吃力，而议会军却因有骑兵支援，得以从侧翼和后方攻击敌人，王军四处溃逃，国王的大旗也落入议会军手中，查理国王几番险遭被擒。傍晚，那位鲁伯特亲王似乎回味过来，匆匆赶回战场，但他所能做的只是解救一下支离破碎的步兵而已，幸好国王还没事。黑夜中断了战斗。

到了第二天天亮，查理查看他的军队，发觉有1/3的步兵和许多保王党人失踪。并非全部阵亡，其中大多数都开小差跑了。国王还想再打，但不久他就发现这是办不到的，天寒腹饥，军心已经大为动摇。

在议会军的营垒里也在讨论同一问题："汉普登、霍利斯、斯特普尔、克伦威尔及大多数的民团军官与下议员，都力劝埃塞克斯继续进攻："国王抵抗不久了，我们又有新的生力军加入(追击中失散的炮兵和步兵)，因此我们会胜利，只有连战连决才可以挽救困难，并解除议会面

临的危险。”但是职业军官（一般都是在大陆编入伍的），都持异议，他们认为用新练的兵打过这样一场光荣的大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伦敦已经得救，这样的安全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士兵仍然是新兵，应予训练，然后再作战，议会只有这一支军队，不可孤注一掷。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埃塞克斯也不想立刻再发兵进攻，于是退居沃里克，以观察王军动静。

埃塞克斯一撤，查理有说不出的高兴，便顺势退守牛津。伦敦暂时得救了，但从这时起一直到内战结束，牛津始终是国王及其党羽的大本营。与此同时，埃塞克斯带领部队缓慢地返回伦敦，受到了国会的颂扬。

牛津与伦敦都公开举行感恩礼仪式。国王的军队大多数逃兵已经回营，他们有了掳掠的希望，这就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而议会的朋友们都奔走相告，说议会虽然只是打了一个小胜仗，但却得到了一场大解放。然而不久他们就看出，这次解放实在是太不完全了，甚至根本谈不上有所解放。

国王的军队一天天地逼近，到了科恩布鲁克，离伦敦只15英里。在此期间，议会始命埃

塞克斯停止进攻，派彼得基利格鲁爵士前去谈停战条件。但当他到了布伦特福（离伦敦七英里），却看见双方又打了起来。

后来国王一面假装议和，一边加速前进，出其不意地攻击驻扎在布伦特福的霍利斯的队伍，希望一举歼灭，然后突然进入伦敦。但是遭到霍利斯这一小队士兵的顽强抵抗，而且不久离此不远的汉普登及布鲁克勋爵的军队及时赶到。这些人马集结在一起，加上霍利斯的军队，抵挡国王的全部军队达几个小时之久。

伦敦城里已听到炮声，但却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时埃塞克斯正在上议院，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上马，带领他所能召集的人马赴援。但未等他到达，仗已经打完了，议会军受了很大的损失，在一片混乱中退却，国王已经占领了布伦特福，停顿在那里。

伦敦城内一片恐慌，传说国王可能企图在深夜偷袭伦敦，保王党人一向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人们坐卧不安，愤慨万状，大骂国王不仁。议会适时地利用了人们此时的情绪，广招士兵扩充军队，一时达24000人，并召开军事会议，汉普顿和克伦威尔等人积极主要立即进攻，因

为目前人民获胜的心情空前迫切，这样的时机实不可失。但是一些老军官们表示反对，而埃塞克斯本人也坚决不肯凭群众的热心去冒险打仗。他命令已经前进的军队立刻回来，在四面八方采取守势。

国王本来很怕被攻，因为已无军火，见伦敦方面按兵不动，便也后退回牛津，没遇到任何阻拦。

时值严冬，双方的主力几乎都毫无活动，就这样，时间进入了 1643 年。

在埃吉山战役中，对克伦威尔来说，是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军事课教育，同其它的议会军中的朋友相比，他在战场中所领悟的东西最多。在这次战役中，身为骑兵中尉的克伦威尔看清了如果没有强大的骑兵，就永远不能战胜国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议会必须要有一支由这样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不是为了薪饷，而是深信其事业的正义性而为之献身的人，他们的热情和坚定性应极度地发挥，超过敌人。但是目前的议会军，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没有正式的薪饷，有时不服从指挥员，比只管掳掠抢劫的盗匪所强不多。

对此，克伦威尔对他的表兄汉普登说："我们的军队大多是一些老朽的兵痞和酒鬼，而敌人的部队却大部分由绅士和知名人士的子弟组成。你认为他们能同那些年轻力壮、士气高涨的敌人角力吗？我们应该招募具有绅士克己精神的人，否则，我们会被击溃的。""想同如此顽固的敌人战斗，我们必须具有一批信念坚定、笃信宗教的人，我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勇士……"汉普登也承认克伦威尔所说的事实，虽然他怀疑建立克伦威尔关于组建新军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伦威尔是何等的正确。

就在1645年初，他为了上述目的，离开了伦敦，前往英格兰东部各郡去征募他的队伍。而此时的国会，仍在为如何规劝国王议和而争吵不休。

2月中旬，王后的归来推动了事态的进展。在荷兰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四处乞讨般求援及各种各样的谈判条件中，王后费尽了心机，她是充满自信和冒险精神的，她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显示出非常灵巧与活动能力，她终于使保守谨慎、酷爱共和的荷兰人感动，虽然荷兰公民们对她公然表示不十分"友好"，但她终能带着四条

装满了军械火药、军官与士兵的大船，驶向英格兰。

议会得到消息后，命海上将领巴顿前往拦截，可是直到2月22日，王后的船在伯林顿下锚的时候，巴顿的船队才赶到。于是巴顿命炮击滩岸，王后正住在码头，炮弹落在她的屋顶，甚至落在她的卧室内，她惊慌跳起，穿着衬裙，逃到乡下。后来，纽卡尔斯勋爵带了一队士兵来护送她到约克。一时全国上下都传出她如何勇敢，如何机智的消息，乡绅们欣喜欲狂地环绕着她，满腔愤怒，指责那个大逆不道的巴顿，于是就有成群的天主教徒赶来投到她的麾下。纽卡尔斯的部队也在一天天地增加，而王后则继续住在约克，她并不急于和她的丈夫呆在一起，而宁愿自己单独一人发号施令，不受拘束地自己裁决一切。

“假如国王现在在我面前，我就会开枪打死他。”

埃塞克斯的军队仍旧驻扎在牛津与伦敦之间，仅仅满足于围攻处于国王前沿的里丁，但他

认为为议会安全起见，不得不占领这个地点。

10天围困，里丁于4月27日投降。汉普登提议进一步进攻牛津，但埃塞克斯坚决不肯，他绝非畏缩不前，而是一直怀着不忍之心作战，这就给国王查理很多喘息的机会。

在议会内部，已经有人开始对他不满，汉普登自己及一些党魁们虽然力劝这位伯爵好好振作起来，但却无意同他分离。对于其他人，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暗中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议会被其内部的不和所掣时，忙于应付内部分歧，无暇顾及进军。

一个月过去了，几乎平静无事，攻克里丁，是伦敦所未曾料到的，却使牛津恐慌万状。查理国王现在正想着是否应该逃走，有人甚至建议放弃牛津北上与王后会合。但他终于没有逃跑，相反，暗中开始了他新的阴谋。

再说克伦威尔到达东部各郡之后，即着手招募青年，其中大部分是他认识的，而他们也认识克伦威尔，人们当然都记得亨廷顿的出色骑手。所招的士兵大多是自耕农和中小乡绅的子弟，他们家庭小康，并不在乎饷金，而且奉教如狂，耐力惊人，他们平素喜欢游手好闲，忠于国

会和宗教，正如克伦威尔所说，他们是出于良心驱使才去打仗的，他们投到克伦威尔麾下是由于信任他。克伦威尔对他的士兵曾这样说："实不相瞒，我并不要你们相信我是奉命统帅你们去为国王为议会而打仗的，假如国王现在在我面前，我就会开枪打死他，如同他打死别人一样，如果你们觉得于心不忍，那你们就另投别处去吧！"大多数人听了这句话后，仍是毫不迟疑地报名入伍。他们立时就被禁止享受家庭的安逸禁止染上军人的放纵习气，奉命接受最严肃的纪律，把他们的马匹与军器收捡得干干净净，他们往往还得露宿，刚刚训练过后又急忙赶去做礼拜，几乎没有多少休息时间。克伦威尔坚持要求他们尽心竭力地当兵，巧妙地将信教的狂热和精力，同军人的恪守纪律的坚决性结合起来。

在同王军的一些小摩擦中，这支队伍经受住了锻炼，不断壮大。在给他的另一个表亲下议员圣约翰写信时，克伦威尔说："我的队伍在壮大着，我有批可爱的人，如果你认识他们，你会尊敬他们的，他们是忠诚严肃的基督徒。"就在克伦威尔在东部厉兵秣马的时候，伦敦却出了

几件大乱子。

间谍战是任何战争的一部分。就在议会军的大本营伦敦，有人给国王送信曰："大船将进口。"

5 月 31 日，禁食之日，上下两院都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雷特教堂内做礼拜。这时有人交给皮姆一封信。他立刻站了起来，同他前后左右的人们很兴奋地悄悄耳语之后，不待礼拜结束，就匆匆地同他几个主要的同事走出去了。一时人们十分惊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礼拜过后，议会开会，群众这才晓得破获了一件牵涉甚广的大阴谋。据说有几个贵族，几个下议员，还有一大批的市民都牵连在内。他们策划要武装保王党，夺取伦敦塔，抢夺军火库，及重要的军事据点，还要拘捕两院的领袖们，然后将国王的军队领进伦敦。执行这一行动的日期就是 5 月 31 日，据说其中九个头脑已经被捕。

事实上，的确拘捕了几个人，一个下议员埃德蒙·沃勒，一个有名的诗人汤姆金斯及他的大舅哥，还有几个富有的市民查洛纳及其它几

个人。他们都承认存在这一阴谋，但阴谋的动机及范围各人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的说是想拒纳税款，有的却要招集人民并请求两院同国王议和等。虽然动机不同，但阴谋是肯定有的了，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人同国王暗通消息。一个贵妇名叫奥比涅，奉了议会的特许，前往牛津办理私事，回来时带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国王的命令，授权几个阴谋家用国王的名义征兵纳税。就在前几天有人送信给国王："大船将进口。"即诸事齐备，准备动手。福兰克尔代国王答到："叫他们快点干吧！因为战争越来越止不住了。"

被传讯的共有七个人，定了五个人的罪，却只有查洛纳和汤姆金斯二人死刑。他们象勇士那样，视死如归，却并不认为是殉道者，亦不装作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诚实使他们对自己的主张是否正确而表示怀疑。查洛纳一面走上刑台一面说："我曾经祷告上帝，如果上帝认为我们的策划是不光明的，那么就让世人知道吧。上帝已经听见了我的话！"

汤姆金斯则更为坦荡："这件阴谋被人发现，我倒觉得高兴，因为这件阴谋很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但还有一名重案犯沃勒，由于他的

亲戚（克伦威尔就是之一）施用影响，顾念是坦白交待，免于一死。

几天之中，下院议员们洋洋自得，以为揭破阴谋及惩办预谋的人就会使牛津方面张惶失措，就可以吓倒伦敦的保王党，同时可以暂时停止议会的内讧，简而言之，他们可以排除一些不利因素，不必再为之白费力气。但是好景不长，一件意外之事——汉普登的阵亡，使人们心头刚刚驱散的阴云重新聚拢了上来。

国王已听说伦敦的阴谋败露，但是还不大在意，因为他几乎同时得到消息，说他的将军们在南方、西方、北方都取得了大捷。他宁愿保王党的骑兵打仗得胜，而不愿意通过市民们采用暗中掩蔽手段成功，况且这些人不久前还曾反对过他的计划。6 月 19 日有一件意外的事，似乎使他感到了异常的兴奋，在离牛津十多英里的查格尔格雷夫打一场骑兵小仗，鲁伯特亲王奇袭并打败了议会军，汉普登在混战中受了伤。有一个俘虏说：“我看见他仗还未打完就离开了战场，这是和他的习惯很相反的，他垂着头，两手靠在马头上，他肯定是受了伤。”这个新闻在牛津引起一番轰动。他们几乎不能相信，这样一

个人受了这样出其不意的袭击，就会倒下来，因此，他们迟疑地不敢高兴。

国王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深知这个仇敌害苦了他，因此他不能不说更“关心”汉普登的情况。于是传来汉普登乡下的邻居盖尔斯博士，他一直同汉普登保持着联系，吩咐他以博士自己的名义去探望汉普登。博士是个老实人，他说道：“我迟疑是因为我有几次为我自己的事写信给他，被他觉得我是个不吉利的人。有一次我的货物被人劫了，我求他相救，可是当我的信差才进他的门时，刚好有人来报，他的长子死了。过了很久以后，我的货物又被人抢，我又打发人去求他，不料我的信使刚进他的门，又遇着一个人来报告他的出嫁的爱女奈特利夫人的死讯，所以，在他看来，我是个不吉利的枭鸟。”

虽然这样说，博士还是接受了国王的委托，但是当信使于 6 月 24 日到达时，看见的是已经奄奄一息的汉普登，他的肩膀中了两枪，受了六天极端的痛苦。信差告诉他是谁打发他来问候，并说明来意，汉普登听了，全身震动，抖得厉害，好象要说话，但却说不出来，喘息了几下，便停止了呼吸。

汉普登的死被证实后，国王感到很满意。在牛津的宫廷中不复再提汉普登的名字，即使提起来也不过是重提他的罪恶，以胜利者的语气说："汉普登战死的地方，恰巧就是他从前反抗过国王的地方，他是执行议会关于民团命令而募兵反抗国王的第一人。但伦敦及全国的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却表示出最沉痛的哀悼。从来没有人能象他那样地博得全国人的信任。凡是民党的人，无论地位高低，无不希望汉普登能有助于自己观点的成功。比较温和的人信赖他的明智，比较激进的人信赖他的爱国赤诚，比较老实的人相信他的正直，好弄阴谋的人佩服他的才略。他为人谨慎，沉默寡言，遇事敢于冒险上前，他从未失败过，人人都爱戴他，而他现在死去了，这是大家所始料不及的，甚至人们心中的希望也受到了震动。

幸福而极端罕见的机运使他的名字永驻高峰，人们的爱戴和信任把他推向了那个令人敬仰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英名得以免于象革命的其他高贵的宠儿一样被推向岩礁，击得粉碎。

消息传到克伦威尔那里，人们第一次看到

这位以坚毅果敢见长的军人转过身去擦眼泪，汉普登不仅是他的表亲，更是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他可以推心置腹朋友。克伦威尔把悲痛深深压在心底，等待着报仇的那一天。汉普登的死给议会带来很大震动，埃塞克斯无心恋战，彻底放弃了向牛津进攻的尝试。加上粮饷缺乏，接给不上，士兵情绪低落，人心慌慌。

查理面对自己过去的廷臣埃塞克斯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而此时的埃塞克斯只是说："议会命我解围，否则我愿留骸骨于城下。"

而牛津方面却不然，随着自信心的加强，军力也与日俱增。有证据表明王后于7月中旬与国王会师，带来了3000人马与几尊大炮和约200万镑的巨款。他们夫妇在凯因顿沙丘见了面，也正因此，王后才可能在1644年4月逃离牛津时带着7个月的身孕。

查理夫妇大败议会军，处处得胜。在西部包围王党的倒霉的沃勒将军的议会军被埃塞克斯舍弃，得不到支援，遭到毁灭性打击，沃勒逃回

伦敦时，手下一个兵也没有了。

7月26日，鲁伯特用突袭夺取了仅次于伦敦的王国的第二港口布里斯托尔，另一个大港埃克西特也很快陷落。八月议会的西部据点格洛斯特被围。而在北方，事态的发展也同样对议会不利。纽卡斯尔率领的王军使费尔法克斯父子指挥的议会军遭到巨大损失，接连败北，他们的残部不得不躲到赫尔城内。整个约克郡都落入国王手中。

现在国王的军队用全部兵力从三方面同时进攻伦敦的大胆计划酝酿成熟了。纽卡斯尔的军队从北方进攻，康华里部队从西面进攻，鲁伯特则在中路同埃塞克斯对阵，灭顶之灾就要压向伦敦城。

但由于议会军还有一些要塞留在敌人阵地，象钉子一样钳制着王军。北部有赫尔，西部有普利茅茨和格洛斯特，这些都在纽卡斯尔和康华里的后方，使之不敢贸然向伦敦进攻。

著名的格洛斯特之围可谓惊心动魄，神鬼皆惊。8月10日，王军占领了俯瞰格洛斯特的高地，该镇只有1500人防守。

国王一到，立刻要格洛斯特投降，限两小时

内回话。此时的格洛斯特已是群狼口中的一只幼仔而已，但城内的兵民们却表现出了令人起敬的勇气和斗争精神。还未到两个小时，就有两个代表从市内来，一个是普特西军士长，一个是市民，他们来到军营，二人都是脸无血色，瘦瘦的，穿着一身黑衣服，剃着光头。他们说道："我们从格洛斯特市来献回话与陛下。"于是便捧一封信读给国王查理："我们是格洛斯特的居民、地方官及驻在警卫营的军人，谨复陛下，我们将按照我们的誓词和忠诚，效忠陛下并为陛下的子孙守卫此城。因此我们感到全体都有义务服从议会两院所昭示的陛下的命令。天神庇护，我们决心防守此城！"

如此简单，如此坚决，又如此清晰明白，使者屹然不动地站在国王面前，等待着回答。廷臣们正准备发出惊异、讥笑和愤怒，查理却同他的仇敌一样严肃，对来使说："你们若希望有救兵，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沃勒完蛋了，埃塞克斯自身难保，你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二位使者一言不发，转身回去了。他们一进到城里，居民们就放火烧了四郊，如此，他们所需要保卫的就只剩下城墙以内的地方了。

国王惊讶市民们的决心。8月10日，仍下令攻城。一连25天，王军无数次冲向城墙，但城里的人以不知疲劳的勇猛使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守军只留150人作为后备军，其余的全城士兵日夜不息地站在城防前列。市民与军人同甘共苦，同冒风险，妇女帮助丈夫，子女帮助母亲战斗，出生入死。守将马西甚至开城击敌数次，只有3个怕死鬼乘这个机会逃走。

国王的军队疲于长期围城攻城，既无荣光可言，又不能休息，于是肆无忌惮地蹂躏四郊以示报复。营内士兵日益不服从命令。国王原指望围困该城饿死守城之人，但埃塞克斯忽发奇兵，冲过他的守军在大路上长驱直入，势不可当，鲁伯特拨出一队骑兵，但阻拦无效。原来伦敦的民兵增援了埃塞克斯的部队，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惊人的顽强精神，面对鲁伯特骑兵的各次疯狂进攻毫不畏惧，英勇杀敌，很快就冲到国王的阵前。国王此时慌了手脚，他万万没有料到埃塞克斯来的如此之快，想使缓兵之计，哪怕耽搁一天也好，便打发一名信使去议和。埃塞克斯答复到："议会只命令我解格洛斯克之围，否则的话，我愿留骸骨于城下。"

第二天，9月5日，他正在离城5英里的普雷斯伯特高地上部署他的军队，望见国王的大营中忽然升起一片大火，便晓得城围已解。

他立即进城，送各种食物给城中的守军和居民，极力赞扬守将及士民，表彰居民的勇敢和对议会的忠诚，赞扬居民救了议会，并给议会以时间来救他们。

但事实上，无论在教堂里，或在他的住处，或走在街上，埃塞克斯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感谢，人们真诚地感谢他的勇敢和爱心。

在埃塞克斯回去的途中，一切都很顺利，他的马队几次打退了敌人的偷袭。9月19日，来到纽伯利，但敌军已经抢先一步，占据了该镇和附近的高地，拦住了通往伦敦的大路。国王亲自站在行伍前列。看来是非打一仗不可了。

至此，埃塞克斯表现得异常果敢。丝毫没有迟疑，于第二天清晨便发动了进攻。他亲自率领前锋部队，攻击主要的高地，抢占了高地后，并依次攻打各重要据点，直到日落西山，两方都如此奋勇地相持不下，以至彼此在记述战况时都以勇敢顽强表扬对方。保王军队由于有希望扭转前面的少有的败局而得到鼓舞，议会军则因

为能维持多次不利后的一次胜利果实而兴奋。直到天黑，两军仍各自保守着阵地。事实上埃塞克斯是占有优势的，他处处身先士卒，连随营的铁匠、仆人都冲出来杀敌。他本来计划第二天再打，但不料天一亮，令人吃惊的是，敌军已经连夜撤退，前路已无阻碍了。

于是他立即飞速前进，顺利到达里丁。这场恶战，使王军锐气大挫，同议会军相比，他们的勇猛并不逊色，但坚韧却远不如对方，而且在此一役中，王军损失巨大，有20多个著名军官阵亡，其中不少可谓旷世之英才。森德兰勋爵，一个杰出的年轻军官，阵亡时只不过23岁，是从燕尔新婚的洞房中赴战场的。凯尔纳丰勋爵，可称是国王手下的一个无价之宝，对部下纪律严明，而且最重信义，说话算数，从不失言。当年康西斯统帅西部军队曾同对方订约使他们归降，后来，他竟背约，从此凯尔纳丰勋爵无论怎样都不肯在西部军中服务。

还有一位就是福兰克尔勋爵，他是克伦威尔的敌人，也是朋友，他是保王党的光荣，虽然被伦敦斥为公敌，却没人能否认他的爱国赤诚。他是牛津的一个文臣，却被人民所敬重，他并无

亲上战场的义务，他的朋友屡次怪他太过胆大，说是没有必要冒险。他微笑着答道："我的职位完全不能剥夺年岁所给予我的权利。一个陆军大臣应该多少懂得打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热忱地面对着危险和人民所深受的痛苦，他内心十分焦虑，他的希望天天破灭，内心深处长期不安。他本来是很乐观、很活泼、很愉快的，但现在他的脾气变坏了，整天呆滞、阴沉。

他本是个讲究修饰的人，可新近却不讲穿着，不重仪容了，无论谈什么，消遣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当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两手托着头，许久一言不发之后，很惨然地喃喃自语道："和平！和平……"只有看到眼前有议和的可能时，才能稍微振作一下。

打仗的那天早上，他的左右看见他比往常任何时候都高兴，就觉得诧异。他有好长时间不修边幅了，今天却忽然讲究起来，只是听他开玩笑说："我若今天阵亡，不愿敌人看见我穿着不清洁的内衣！"他的朋友力劝他到别处去，他却面现戚色："不行，我对这种时局已经感到厌倦了，我想本国将来要受许多痛苦，但是我希望在天晚之前摆脱痛苦。"

他自告奋勇加入拜伦勋爵的队伍。不知拿没拿武器，但刚一开战，就有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他掉下马来，乱军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没人看到他死时的情景，直到第二天才寻着他的尸体，衣服很干净，面带令人难解的微笑，不知是嘲笑自己还是嘲笑世人。他死得很安详，看不出受了多少痛苦的样子。

他成了一个太不适于一个品德清纯的社会的、异常敏感的人，生活的崎岖动荡的时候的牺牲品。他的美好梦想与严酷的事实格格不入，他无力抗争，最终精疲力竭地败下阵来，难道真是他生错了时代。

他的朋友们为失去这样一个善良的好朋友而感到悲痛，而廷臣们却因为了一向在思想与行为与"普通人"格格不入而对他的死无动于衷。国王查理表示了相当的惋惜，但在同大臣们议政的时候，他反觉得轻松多了！

克伦威尔："废话少说……"

埃塞克斯荣归伦敦后，议会给他以极高的评价。但他却出人意料地走入贵族院，向他们辞

职，求他们许可他到大陆去退隐。他说国家已无危险，因此已解除他逗留在这里的责任了，当他统兵的时候已经饱受痛苦和烦恼，而且他预料这些苦恼很快又将重来，因为如果威廉沃勒爵士仍拥有一个不受他节制的独立的官职，而他却担任大元帅的职务，必须对一切负全责，而沃勒却拥有不服从他的权利，他说他饱尝这种地位的痛苦，认为再也不能忍受了。

议会听了此言，便决定商讨一下有关问题，就在这时有人来说沃勒已辞职，以后便听大元帅的指挥。至此两方好像言归于好了。

让我们放下议会的暂时平静，来看看东部的克伦威尔在这期间做了些什么。

就在议会军西、南、北三个方面节节败退的时候，只有东部军队屡次战胜王军。1642年底，东部五个郡，即诺福克、谢福克、埃塞克斯、剑桥及赫特福德就组成了“东部联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统一各郡的人力、物力，以共同与国王抗衡。稍后，亨廷顿和林肯两郡也加入了其中。

1643年夏，这些郡不仅成了议会的基本地区，而且成了王党由北方向伦敦进攻的主要打击目标。也正因此，“东部联盟”的活动引起了

议会的关注。这个联盟直到战争结束都一直站在议会一边毫不动摇，也正是这个联盟使王军在东部无所作为、连连失利，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的克伦威尔。

他无愧是这支军队的灵魂，他的行动坚决果断，行军迅如闪电，给敌人的打击总是出其不意而且非常沉重。正是克伦威尔急如星火地奔波于联盟各地，几乎在相同时间内，镇压了洛继斯托福特的王党叛乱，解除了林恩骑士党的武装，制止了酝酿中的亨廷顿王党的阴谋，俘虏了克罗威林德的敌方驻军。他率领部下巩固了本郡剑桥的防务，肃清了相邻领地和城堡的敌人。他的不可调和的性格震骇了敌人，他的果断和热情吸引和鼓舞了朋友。一系列胜利之后，他没有让各郡委员会松懈下来，不断唤起它们的积极性，向它们预告危险性，四处动员拥护议会的力量。他极端蔑视那些整日滔滔不绝地争吵，而置民众生死、国家安危于不顾的官员，他手中的利剑正是他权威的象征。在给剑桥郡委员会寻求资助的信中，他言简意赅："废话少说，赶快把你们所能送的东西送来吧！……除了我为数不多的骑兵外，什么也无法阻挡敌人的推进，你

们应该迅速行动，而不要玩弄什么花招了！”

当东部联盟面临王军进攻的直接威胁时，议会决定建立一支一万人的军队来保卫“东部联盟”。根据克伦威尔提出建议，任命曼彻斯特伯爵任这支军队的总司令；克伦威尔本人则统帅全部骑兵。但当必须派兵去救援被围在赫尔的费尔克斯父子时，其他军队纷纷退缩，只有克伦威尔的军队表示愿意前往，因为此去实在是凶多吉少。克伦威尔孤军深入了林肯郡，一路上马不停蹄，在10月11日，在温斯比进攻了王军主力。双方各有人马三千左右。

这是克伦威尔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作战：他身先士卒，冲在进攻的前列，他的战马在战斗中被打死了，并把他压在身下，他爬起来，又摔倒，但终于艰难地爬了起来，腾起跨上一匹没人骑的奔马，继续指挥作战。

克伦威尔的“农民骑兵”在这次战斗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缴获王军的35面军旗，及1000名俘虏。林肯郡的国王势力被消除了，纽卡斯尔不得不撤除赫尔之围。费尔德父子终于得以和议会军会合。

经此一役，克伦威尔的军队得到了十分有

益的锻炼，士兵们所表示出的勇气和克伦威尔的勇猛，使人们都把目光投向这个不甚有名气的骑兵上尉。伦敦《每日确报》上开始经常出现克伦威尔的名字。

安息吧：皮姆——国会之王

让我们再把视线移回伦敦，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对英国现行宗教体制进行过分析。正如整个英国革命都始终是披着宗教外衣一样，在议会内部的政治分歧也是被宗教分歧所掩盖着的。在议会中，较为保守的势力一直推行苏格兰的教会制度，即：每一个宗教团体的首脑都应是传教师或年长者，称之为长老，由他们组成管理机构，负责中央和地方的教会及国家的管理工作。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为“长老派。”

对于伦敦市内及各郡新兴起的资产阶级和中小绅士及部分新贵族来说，则主张各教会团体应完全独立，不依赖于任何强制权力，反对上下划一的强加于人的教规，认为重要的不是教会外部的统一，而是内部，主要是人们精神上的共同性。提倡对本教内部不同派别持宽容态度，

这部分人被称作"独立派"。二者斗争的焦点就是改革后的国家和宗教体制的确立形式及原则。

虽然长老派在议会及教务管理中根深蒂固，而独立派则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但是，为捍卫信仰自由，从而进一步达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他们却能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与长老派斗争。

也正是在近二三年内，独立派悄悄地兴起了。他们比长老派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浅，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他们任何时候都不隐瞒自己的主张，毫不退缩地承担一切后果。而长老派却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是建立在传统和法律的权威之上的，而现在正是一切基础动摇的时刻。而独立派却开始发出强有力的号召，无论听者懂与不懂，它都以最崇高的希望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口号是具有相当的历史穿透力的。它提出的是一种原则，一种人们认为理想的社会原则，这些口号是：权利平等，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这是人们认识上的质的飞跃，这折射出人们所能预见的美好未来的

光辉。也许革命后人们得到的是另一个现实，但指向美好明天的路标已经被人们高擎于手中。

就在议会中长老派与独立派明争暗斗、难分难解的时候，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皮姆死了。下议员们丧失了一个最老的、却最有用的领袖，1643 年 12 月 8 日，皮姆病了几天，就逝世了。

他的才华虽不及汉普登，但在每一次重要的辩论中却可谓议会重新获得生命的功臣，在这一点上，他比汉普登更为出色。人们不会忘记他那宽宽的额头，紧锁的双眉和睿智、冷峻的双眼，薄薄的嘴唇曾使无数王党哑口无言，败下论坛。他为人坚决，能干，他善于攻击对方，善于布置辩论和对策。他更善于鼓动人民的义愤，善于稳定动摇朋友的决心。本党的决议几乎全都出自于他的手笔，别人所视为畏途而躲避的任务，他却慨然担当。他不求名、不为钱，只是专心致至地致力于本党的事业的成功。

在议会中他享有很高威望，试图调和各派系的矛盾，但终因耗费心血过度而一病不起，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他战斗过的地方。

克伦威尔带头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虽然

他晚年在改革上略有迟疑。皮姆的遗体停放了几天，成群结队的人前来瞻仰。一个委员会奉命调查他的身后遗产情况，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建碑纪念。全体议会送殡，并承担代他偿还了一万镑的债务，这些都是他因操劳国事而积欠下来的。

安息吧！我们的“国会之王”，在人类走向民主和文明的进程史上永远有你耀目的一笔。

马斯顿荒原，原来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却因为一场决战而载入英国史册。一颗流弹飞来，擦过克伦威尔的脖子。

汉普顿和皮姆死后，克伦威尔成了独立派公认的领袖，他把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强制，争取信仰自由的斗争同反对国王的战争的计划融为一体，并不断在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商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这些群众来和国王斗争。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里，是各种教派的大家庭，他十分尊重各教派自己的信仰。在一位议会派的将军借口一名军官是异派分子而解除其职务时，克伦威尔写信给他说：“就算他真是个异派

分子吧，难道这就使他不宜为共同事业服务吗？阁下，国家选拔公职人员时，并不在乎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要他愿意竭诚为国效劳就行了！”

与此相反，长老派清楚地知道自由解释神意对他们所造成的危险。因此他们改革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想着拖延战争、寄希望于迫使国王作一些让步和接受议会的条件。

也正因此，在同国王的较量中，议会军不能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而连连战败。1643 年底，几乎整个北部和西部，即国土的四分之一，都落入了国王手中。议会的统治实际上只局限在“东部联盟”境内，确切地说是在克伦威尔的军事范围之内。沃勒的军队不复存在，埃塞克斯手中只剩下不超过四五千人。情势十分不利。直到 1644 年 1 月才有所好转。

首先是，2 万名苏格兰人加入议会中，但这是以推行普及长老派教会，限制独立派活动加上巨款吸引过来的。在 1644 年，上半年的战事中，议会军开始转移，1 月，议会军将领费尔法克斯击溃了从英国北部登陆前来援助查理的爱尔兰军队。3 月，沃勒截断了企图入侵南方各郡

的两路王党的道路。在埃塞克斯和沃勒联军逼迫下，国王只得亲率 6000 人，带着怀着 7 个月身孕的王后逃出牛津。而在东部，曼彻斯特勋爵拿下了林肯城，并开始围攻约克。国王派鲁伯特救援该城。鲁伯特飞速赶到，会合了纽卡斯尔部，出现在驻扎在马斯顿荒原的议会军面前，在此展开了一场王军同国会军的第一次大会战。

马斯顿荒原位于约克城西 7 英里处，满地杂草丛生，东西长约 1 英里半，南部边缘是一条宽阔的深沟，沟南有一座长满灌木和黑麦的小山丘。

7 月 2 日上午 9 时，鲁伯特率领先头部队来到草原东端的一个村庄，并迅速地占领了整个草原。正在西去的议会军获悉后，立刻回转。下午 2 时左右，他们集结到沟南的小山岗上，俯视着整个草原上王军的动向。

“我看今天他们是不会进攻了。”鲁伯特亲王对纽卡斯尔说。纽卡斯尔望了望克伦威尔议会军的方向，没有动静，于是点了点头，回身到他的马车中去，唤随从装满了烟斗。

罗伯特也感到饥肠辘辘，嘱咐侍者预备晚饭并准备下令士兵们用膳。

夏天的黄昏，夜幕迟来，雨终于停了，暮色茫茫，整个草原静悄悄的，静谧的气氛中，有谁知道片刻后这里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呢？

7点钟，国会军左翼骑兵忽然跃马挥刀，高喊着"天兵来也！天兵来也！"首先冲下山去。紧接着中路的步兵和右翼的骑兵也跟着呼啸出战。倾刻间，人吼马嘶、杀声震天，议会军人马似黑潮涌动，扑向王军。

克伦威尔的勇士们正是最先冲出去的，策马下山，越过深沟，冲进王军的右翼骑兵阵地。一时战马奔驰，刀光闪闪，在夕阳的余辉中绚烂无比，很快就把王军的第一道防线摧垮了。但却遇到了王军骑兵第二道防线上的拼死阻击。克伦威尔仍旧是率队冲锋在前，突然，一颗流弹飞来，擦过克伦威尔的颈部，他受了重伤，部队也受阻不能前进。这时，雷士里带着苏格兰骑兵直扑鲁伯特的侧翼，猛冲猛杀，把王军打得落花流水，鲁伯特亲王在雷士里骑兵的追杀下，向约克城方向落荒而逃，总算保住了性命，但他的一只心爱的小狗"仆欧"却死在乱军之中。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国会军左冀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因为同一战线上的中路和

右路都遭到了沉重打击。右翼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统帅的国会骑兵，也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穿插到戈林所率的王军骑兵的背后，短兵相接，但他的队伍被击溃，他本人身受重伤，逃回阵地。而议会军的步兵则畏缩不前，正中费尔法克斯的父亲统帅的步兵，则被纽卡斯尔的“白衫队”逼得步步后退，退到山岗。

就在这胜败系于一发的时刻，克伦威尔临危不乱，他先稳住了不知所措的士兵。一面派兵追赶鲁伯特亲王，一面就地整顿队伍，插入戈林的背后，由北向南发起进攻。戈林看到克伦威尔的这一调遣，立即停止了对老费尔法克斯的追击，匆忙下令士兵反身应战。但是已经迟了，在克伦威尔骑兵的猛烈冲击下，王军失魂落迫，四散逃窜。克伦威尔并没有穷追败兵，而是又集中全力，冲向纽卡斯尔的步兵，在议会军步兵的配合下，拔去了纽卡斯尔这颗钉子。

10点钟，战斗停止了，战场上没有留下一个保王党，只有3000多尸体和1600多俘虏及满地的王军战旗。议会军缴获了20门大炮和大批武器。

午夜，议会军安歇了下来，克伦威尔走出军

帐，原野上万籁俱寂，月光依旧融融，银辉满地，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鲁伯特和纽卡斯尔半夜都逃到了约克城里，但他们未见面，也未交谈，只互相派人送信，亲王说："我已经决定今早带着我的马队和剩下的步兵回去了。"纽卡斯尔便命人回答："我到海边去，那里有前往大陆的船。"第二天，纽卡斯尔真的在斯卡巴勒登船而去，而鲁伯特亲王则带着残部前往切斯特。两星期后，7 月 16 日约克投降。

马斯顿荒原之战，是克伦威尔的才略决定了胜利，摧毁了查理国王在北方的据点，扭转了国会军连遭失利的局面，成为英国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它也是克伦威尔一生事业的转折点。雷士里在评价克伦威尔的作战时说：

"欧洲从来没有看到过军队指挥艺术中任何类似的事情。"

就连被击败的鲁伯特亲王也心服口服，称克伦威尔为"铁骑"，而他的骑兵也以"铁骑兵"而闻名全国。

沃勒向议会大叫："只要给我人，给我钱……"

但是，议会军在北方的胜利却被它在南方的失败抵消得干干净净。

后来，埃塞克斯在同查理的军队作战中，被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胜利所鼓舞，一路向西挺进，越进越深，在三个星期之内解了莱姆之围，攻下韦茅斯、巴恩斯塔普尔、蒂弗汤、汤顿。当他挺进到埃克塞特的时候，得到消息说国王打败了沃勒，正挥军向他攻来。

埃塞克斯一面打发人去伦敦求援，一面继续向埃克塞特挺进。但是，那里是国王的地盘，人民并不十分响应他的到来，军粮已行将告竭，而国王的军队却一天天地逼近他了。他再度写信给伦敦，说他所处的地位极其危险，必须要沃勒和其他人攻打国王的后路，然后两面夹击，才可能脱险。

伦敦的委员们立刻召集开会，煞有介事地喧闹一番，仿佛是满腔热血地要救他，号召人民为他祈祷，又命沃勒、米德尔顿和曼彻斯特前往

救埃塞克斯。

现在轮到他们这些人来表示极端的热烈了，沃勒写信说："只要给我钱，给我人，上帝可以作见证，如果我未能更快地前进那决不是我的过错；但愿恶名与鲜血，溅在在前进的路上设置障碍的人的头上。若是找不到钱，那么没钱我也前进。"多么感人肺腑的宣言，但他并没有前进。米德尔顿也说一样的话，他倒是挥师前进了，但遇到第一个障碍就停在那里再也不到了。至于曼彻斯特则根本不曾分兵救援，虽然急坏了克伦威尔："假如我有翅膀，我会飞到那里去"，但曼彻斯特仍不愿在战场上与国王正面交锋，而拒绝出兵。

这下可苦了埃塞克斯，军人的敏感使他很快就发现了他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他必须每天打仗，越打越深入危境，他的士兵已经厌战，队伍中酝酿许多阴谋，国王引兵围他，越围越近，在四面八方筑起了台垒，伯爵的马队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粮草了，他同海上也几乎断绝了自由交通。而他惟有依靠海道才得到给养。

到了8月底，他被团团围困，保王党已能在

附近的高地上俯瞰他军中的全部行动。他只好命威廉·鲍尔升爵士所统领的骑兵，尽一切可能突围而出，自己则统领步兵向福韦海口走去。骑兵利用黑夜多雾，居然在两营王军的空隙间穿过。但步兵却在狭窄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国王的军队发现动静，追赶而来，为了加快速度，只好一边走一边扔下大炮和行李，最后终于失去了安全的希望。此时，许多人都表示要投降，埃塞克斯也灰心了，他迷惘了，绝望了，这是一个优秀军人的绝望，但他又急于避免那样做的奇耻大辱，又不忍心看着部下被敌人的骑兵活活冲杀而死，于是，便没同任何人商量，只带着两个军官，突然离营而去，到海边登舟驶向普利茅斯港。

9月1日，埃塞克斯的军队投降，议会军的士兵们受国王骑兵的监护，没有将军，没有武器，走过不久以前他们曾以征服者姿态所走过的地方。

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后，写信把败绩报告给议会：

“本党所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一次了！我一心想回来接受审判，这样的大败是绝不可

加以隐瞒的。”但出乎他的意料，议会在给他的信中道：“两院完全了解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认识到天意既然如此，只好忍受，所以他们还是一样的敬爱你……”

其实，埃塞克斯已经被他自己的不幸和过失弄得很狼狈了，因此，他在议会中的对手已不再当他是个危险人物，他们深知他不久就会解甲归田。因此，他们依然体面地对他，他们自己也就得到了体面。于是，便都一言不发，看来是议会全体都庄重地忍受了这次大败。

但事情却并没有无声无息地结束。10 月 27 日，议会军同王军在纽伯里开战，埃塞克斯不在军中，因此，这一仗由曼彻斯特勋爵指挥，仗打得很久，当沃勒斯基庞和克伦威尔从两翼痛击敌人，使王军陷入困境时，负责中路出击、擒拿国王的曼彻斯特却仍观望徘徊，按兵不动。直到太阳下山后，他才在暮色中摸索前进，去“追赶”国王。由于曼彻斯特的失职怯懦，国王毫不费力地撤离战场，逃到牛津。

两周后，国王重整旗鼓，再度出现在纽伯里，这次曼彻斯特竟公然拒绝协同打击王军，使国王又一次从容返回牛津。

为什么曼彻斯特伯爵行动迟缓、畏缩不前呢？1644年11月10日，在道宁顿城堡附近召开的议会军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与曼彻斯特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克伦威尔严正指出：让国王不受打击而逃跑，将使他在国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因此，应加紧进攻，将其击溃。

而曼彻斯特却说：

"即使我们击溃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我们仍然是臣民。但是，如果他打败我们，哪怕只是一次，我们就都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也将完蛋！"

闻听此言，克伦威尔拍案而起：

"阁下，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何必要起兵呢？你这无异是在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仗……如果这样，让我们同国王讲和吧，无论这是从未有过的，多么卑鄙的和平！"

事实上，曼彻斯特的思想正是绝大多数长老派的思想的代表，他们希望和国王妥协，试图在国王根本不能同意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无限期地拖延战争，导致整个议会和革命事业的毁灭。克伦威尔清醒

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离开了军队，回到了伦敦。

11月23日，克伦威尔就这一问题向国会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曼彻斯特所犯的错误，并称他为“导致国会军失败的罪人”。与此同时，曼彻斯特也倒打一耙，向国会报告，攻击克伦威尔不服从命令，想搞叛乱。他指控克伦威尔反对贵族，因为克伦威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活到英国不再有贵族的那一天。”

对于两个人的争辩，国会中的长老派同情曼彻斯特，而独立派则支持克伦威尔。问题十分清楚，这决非是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对国王的政治态度的一个原则性分歧，它涉及如何解决国会军的军事体制，将领的职称，军事上集中的指挥权等决定革命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克伦威尔相当清楚曼彻斯特的无理抵赖，于是便运用了巧妙的政治手腕，解决了一个涉及议会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644年12月9日，克伦威尔在演说中放弃了对曼彻斯特的控诉，转而大声疾呼：“现在是说话或者永远保持缄默的时候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拯救国家，把国家从这场连绵不断的战

争所导致的流血，或者说是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因此，不进行一场迅速的、有力的和卓有成效的行动，我们将遭到全国的厌弃，人们将痛恨国会这个名字……我确认：如果不把军队置于另一种格局之中，不更加坚决地进行战争，那么人民将不会再忍耐了，他们将迫使你们接受可耻的和约。”

克伦威尔决定组建自己的“王牌军”

由于克伦威尔等独立派议员的强烈要求，国会决定改组军队。

12月19日，下院提出并通过“自抑法案”，规定国会议员不得担任军职。于是，埃塞克斯、曼彻斯特等一批长老派的高级将领，离开了军队。

次年1月，下院又制订了《新模范军法案》，规定建立一支为数23000人的新军，其中有10个骑兵团，共7000人，12个步兵团，约14000人，及一个龙骑兵团。由国家确立固定的预算，以维持新军的薪饷；建立统一的指挥，军服划一，统一纪律条令，一切都十分规范，因此称新

模范军。

“新模范军”是以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为模式，以原“东部联盟”为中坚建立起来的。新军的装备和供应都要比以前的议会军好得多。新军官的选拔，废弃了只有骑士、贵族和出身高贵的人才能充任军官的门第等级观念，任人唯才，提拔了一批出身低级、但“有能耐、忠实可靠、诚心诚意”的人。如普莱德上校过去是个马车夫，福克斯上校是个锅炉工，休逊上校过去是个鞋匠，而雷因斯波罗上校则曾经“在海船上混过”等等。他们都成了克伦威尔最亲近的助手。

新军士兵入伍时，要宣誓接受《庄严的同盟和圣约》，他们一律穿红色上装，每人都有一本《圣经》作为军人手册，士兵的薪饷不高，步兵每天 8 便士，骑兵每天 2 先令，包括自备马匹和饲料的费用，还有 1/4 的士兵是欠饷的。但是宗教的虔诚和对自由的渴求使他们团结一致，斗志昂扬。

士兵们宣誓：

1. 我战斗是为了我国的自由和法制，它们正处于被人颠覆的危境；

2. 我战斗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会；

3. 我战斗是为了捍卫真正的新教教旨，它正在遭到暴虐的冲击而将在整个王国之中无处容身。

新模范军的军事条例中规定：

凡弃军旗或临阵逃脱者，斩。

凡哨兵或侦察兵睡眠和酒醉者，斩。

凡偷盗或抢劫者，斩！

凡此种种，人们可想而知新模范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了。它从参战起，就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奥立弗·克伦威尔则是这支军队的灵魂，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人们的共同认可。因此，当新军向国王发起进攻的时候，33岁的费尔法克斯总司令就以自己和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请求因是议员而已经辞去军中职务的克伦威尔在军中兼职。

费尔法克斯相当清楚：他在全军将士中受到普遍的敬重和爱戴，他的品德和才干……他的辛劳和勤奋，勇敢和热忱，再加上他福星高照——这一切都使我们请求任命他，这是我们对人民的责任。

几次较量之后，查理不得不重视起这个 40 年前抓破过他的脸的家伙了："谁能把这个克伦威尔送给我，死的活的，我都要！"

费尔法克斯主动出击，率领部队进逼王军大本营牛津，1645 年 4 月，费尔法克斯主动出击，率部队进逼王军大本营牛津。

6 月 12 日，新军来到北安普顿郡境内距王军仅 8 英里的地方，国王大惊，但自知势单力孤，无力应战，撤至莱斯特，集中他的队伍，在那里等待从威尔士和西方各郡开来的队伍。而此时，克伦威尔则率领新招募的人马，来到新军营中，"铁骑将军来了！"营地上鼓角齐鸣，一片欢腾，克伦威尔的到来，增强了费尔法克斯同国王决一死战的决心。

两军相遇于北安普顿西北的纳斯比。

纳斯比在北安普顿西北部，是个古老的山庄，有居民七八百人。新军的辎重和给养都在村里。村北的一英里半的地方，有一座小山丘，是新军的前沿阵地。14000 名新军士兵在山丘山西

北列阵，居中仍是费尔法克斯的步兵，纵深两道防线，前面是斯基庞的5个团，后面是雷因波洛、哈蒙德和普莱德的3个团；国会军的骑兵则分列两翼，克伦威尔居右，爱尔顿居左，同时还有1000龙骑兵在左侧。

王军的前沿阵地西南排列，兵力7500人，居中是雅各、阿斯特莱兵团，朗格得尔率领的约克郡骑兵，与克伦威尔相向；鲁伯特和莫里斯亲王的骑兵，则面对爱尔顿。王军的精锐后备，既有步兵，又有骑兵，还包括国王查理的御林军和鲁伯特亲王的卫队“蓝衣队”。

两军对垒，中间隔着一片不大的草地。时值初夏，久雨初晴，和风吹拂着绿草如茵的大地，一切显得平静、安谧，但是，有谁能想象得出，一场决定生死的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4日清晨，国会军为缩小目标，迷惑敌人，根据克伦威尔的建议，重新调整部署，将前沿部队从山丘顶部稍稍后撤。8时左右，王军派出的侦察兵回报说不曾看见国会军。鲁伯特亲王有些不耐烦，便亲自去前哨察看，只带了几个营骑兵。9点刚过，他来到前沿高地，他发现新军正在改变队形，他以为新军还是向过去的国会军

那样徘徊不前，便命令王军迅速前进，向新军冲去，并打发人去告诉国王，以免敌军跑掉。快到10点钟，国王的步兵骑兵赶到了。10点刚过，王军便向议会军发起了全面冲击。

鲁伯特亲率骑兵冒着新军龙骑兵步枪的密集弹雨，闯入由爱尔顿指挥的左翼骑兵。爱尔顿奋起还击，肩上受伤，大腿被刺，并落入敌军手中，幸亏部下及时杀到才得以逃脱。鲁伯特击溃新军右翼后，又犯起老毛病，他心里总惦着在纳斯比村庄的新军的辎重，于是紧追溃军不舍，前去掳掠。

几乎与此同时，国会军右翼克伦威尔指挥的骑兵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山顶向下冲向正在列队爬坡而上的兰代尔的军队，新军勇士手持马刀，跃马冲杀，王军中那些被迫应征、无心作战的约克郡农村猎手们，纷纷掉头逃离战场。

紧接着在后面居中的两方步兵也立刻交锋起来。自内战开始来，还未有过如此迅速地变成全面苦战的场面。两军几乎是势均力敌，保王党的军队陶醉在毫无根据的自信之中，在阵前发出高声呼喊，他们喊的是“玛丽王后”；议会军

则带着坚定的信念，高唱着："上帝与我们同在！"冲入敌阵。

这是一场苦战，双方步兵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谁占什么优势。斯基庞受了重伤，费尔法克斯劝他退出战场，但他说道："我不退，只要还有一个人站在战场上，我就不走。"于是继续命令他的后备队向前挺进。混战之中，有人一刀把费尔法克斯的头盔打掉了，他的卫队长查尔斯·多伊利看见他骑马在战场上来回奔驰，光着头，披散着头发，没有头盔，便将自己的头盔摘下，让他带上。费尔法克斯却说："没有头盔也没什么！"随即指着一队屡攻不退的王军步兵问道："你们向他们进攻过么？"——"我攻过两次，但未能攻退他们。"——"好吧！你攻他们前面，我攻他们后面，我们在中间会师。"说着便领一队人冲了过去。

就在步兵们久攻不下，苦战不得的时候，克伦威尔打散了敌人左翼骑兵后，领着骑兵前来支援，向已失去保护的王军步兵侧翼攻去。一队新军骑兵冲入敌阵，步兵立刻士气大振，重新发起冲锋，在骑兵的配合下，一路冲杀下来。费尔法克斯冲在前面，亲手斩落一个旗官，士兵也是

越战越勇，一时王军遭到几处夹击，整个步兵四分五裂，四散奔逃。鲁伯特的“蓝衣队”负隅顽抗，最后也被消灭殆尽。

查理眼见这种情况，气得哇哇大叫：“谁能把这个克伦威尔交给我，死的活的我都要！”，情急之下，就要拼命，自己率领唯一的一支留作后备的卫队，亲自去攻打这个新敌人。命令已经发出，士兵已经动了，这时卡内沃斯骑马奔到国王身边，忽然死死抓住国王的马缰吼道：“难道你要去送死吗?”这时，新军步兵已经冲到前面，又是一场混战，国王的士兵无心恋战，纷纷转身逃命，查理在一群军官中叫喊着：“站住，站住！”但无济于事。直到鲁伯特带着骑兵回到这里，才止住了溃散。原来这位贪心的亲王在纳斯比遭到炮火阻截，久攻不下，忽然回味过来，急忙返回战场，但为时已晚，国王周围有很多人，却全无秩序，疲惫不堪，主意毫无，希望茫然。查理军刀在手，两眼冒火，但满脸绝望恐惧之色：“诸位，我们再冲一阵，就可以反败为胜啦！”但只有鬼才相信他的话，他带头冲出去，这些人跟着他，但一接触新军，却掉头便跑。国王自己跑得最快，一口气跑离战场28英里之遥……

历时3个小时的激战结束了。太阳已经垂近了地平线，沸腾喧嚣的纳斯比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只此一役打死打伤和俘虏王军5000多人，他的枪炮、军火、辎重，及100多面军旗，和内阁全数文件，都成了新军的战利品。哦！对了，还有国王自己的那面大旗，就是在诺丁汉升起、坠落，又升起，差点砸着他的那面绣着“该恺撒的东西当归还恺撒”的王军军旗。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厅。费尔法克斯用安静而平淡的语气，把胜利汇报给议会，既不牵涉政治，又不作过多的建议。克伦威尔已被提升为将军，他也写了信，是写给下院的，因为他是由下院委派的，在报捷书的最末写道：“这次胜仗，不由其他，而全是上帝之功，光荣只属于上帝，无人能与他分功……一个人既为国家的自由而拼命，我希望你们为他所奋斗的自由而感谢上帝！”●

纳斯比一役后，国王查理已经没有多少力量可以再行抵抗了，剩下的战争主要是肃清西北个别地区和要塞的王党守军，第一次内战实际告终，伟大的历史剧的前半部落幕。

第六章　不见硝烟的战场

仗在打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进行谈判，虽然明知谈不拢也要谈，为的是攒足了劲再给对方一拳，这是看不见硝烟的第二战场。

查理的谈判对手竟都是往日伏于他脚下的廷臣。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1646年4月26日深夜，牛津大学的校园内，万籁俱寂。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地穿过寂静的校园，来到一幢大楼内事先约定好的房间里。在慌乱之中剃短了头发，刮掉了胡子，穿上了一套家仆的衣服。一切折腾完之后，已经是清晨3点钟了。夜色中，两名随从跟着这个“家仆”，穿过学校的回廊和花园，经过学校教堂的塔楼和灰墙的书库，鬼鬼祟祟地走出了学校大门，跨上

坐骑，悄然离去。

5月2日，伦敦获知，国王查理已经从大本营牛津出逃。原来，王军在纳斯比惨败之后，到1646年初，国王越来越感到局面难以支撑，王军接连败退，新军步步紧逼。牛津城内一片恐慌，查理不得不作出决策：要么在牛津以死相抗，结局很可能是束手被擒，要么弃城而去借助外力，以期东山再起。同时，他狡猾地看到，国会阵营现在之所以团结对外，只不过是因为有国王他这个最大的敌对目标存在，而一旦他暂时消失，那么，对方阵营内原有的各种矛盾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他深知即使在议会内部尚有独立派与长老派的无法挽回的纷争，更何况，在议会和军队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如果议会阵营发生纠纷甚至动武，那么查理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借助外援，予以个个击破。

正因为如此，他远走苏格兰，他自信作为斯图亚特王朝的故乡，他即使得不到支持，至少能获得人身自由。

5月6日，议会获知，国王已随苏格兰军撤向北部的纽卡斯尔。国王在苏格兰军营的命运

究竟怎样?

伦敦。在过去的一年里，独立派可谓诸事皆顺，他们是军队的真正主人，处处打胜仗，在人民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所有的当时奋发有为之士，立有雄心壮志的人，抱有长远希望的人，急于追求富贵的人，心存侥幸进取念头的人，或正在酝酿经国大计的人，都投到他们的麾下。许多天赋奇才也唯有在独立派中才可求得位置与权利。

比如汉米尔顿，他年轻有为，以才高识广而闻名于世，正在忙于以前所未有的高贵之风，要求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及离婚的权利；长老会的教士们都因他敢说敢做被激怒，在议会控告他，不料告他也无效。还有约翰·利尔伯恩，他已经以他的激烈反抗专制暴政的行为而闻名。他开始进行不懈的斗争反对贵族、法官和律师，他的名字已经得到大声喝彩的群众的拥护。

至于克伦威尔本人，其地位则更是蒸蒸日上，铁骑将军的美誉为每一个国人所称誉，独立派也因他而日益壮大，因此抑制了长老派的发展和行动。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一旦国王与长老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独立派所奋斗得来的

一切革命成果将化为乌有。

而国王本人又作何打算呢？他曾写信给迪格比勋爵说："我要诱致长老派和独立派与我联合，这样就可借此叫两派互相消亡，我是决不放弃这样干的机会，那样一来，不久我又是国王了。"

国王查理在苏格兰军中，始终是处于一种文明的半囚徒式的生活，军队对他毕躬毕敬，但是对他的看管却日益严格。1646年夏天，他通信自由受到限制。苏格兰的领袖为了特别表示忠于以前双方订立的盟约，前来见国王，请他受教于基督的真理，苏格兰长老派最有名的传教师亨德森特地前往纽卡斯尔，正式担任劝告被监管下国王的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

7月23日，议会派人议和来了。原来虽然独立派多方阻拦，但毕竟还是少数，议会决定向国王提出议和条件，由彭布洛克和萨福克两个伯爵与四个议员前来。一个名叫戈德温的开始宣读条件。国王刚听到了一半就打断了他，说："请原谅，你有权谈判么？""没有，先生。""既是没有，那么除了给你工作的荣誉以外，一个能干的靠得住的吹鼓手，也可以胜任这种事，如你

一样。”戈德温读完条件，国王又说：“我想你不会指望我对如此重大的事情立刻就给予答复吧！”彭布洛克答道：“先生，我们奉命至多只在此逗留十天。”查理漫不经心地说：“那好吧！我会在适当的日期给你们答复。”是什么条件使国王如此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呢？议员们出去后，查理很难受地读着这些条件，读了又读，越读越觉得受屈辱，越读越觉得条件严酷：议会的条件要他加入盟约，完全取消主教制的教会，向议会交出陆海及民团的兵权，最后一条要他同意将71个人（全是他的最忠诚的朋友）排除在特赦之外，凡他左右的人，凡是曾经执戈为他出力的人，一律不许担任官职，开禁与否，全凭议会高兴。

国王当时咽不下这口恶气，加上他在宗教上斤斤计较，于是，日复一日地拖延，不答复。最后当8月1日委员们前来时，他写好了一篇东西交给他们，并不绝对地接受条件，而是狡滑地要求到伦敦去亲自与议会磋商。

委员们回到伦敦带回了这个消息，长老派成员大失所望，因他们的心血白费而十分焦急，他拒绝了我们的条件，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相反，坚决主张同国王斗争到底的独立派却回答说："假使他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我们才真正不知该怎么办呢！"

长老派一心议和妥协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国王既然顽抗到底，那么国王个人应该由谁来处置呢？围绕这一问题，两派又开始冲突起来。

长老们贼心不死，他们愿意将国王留在苏格兰人手中，但是这个意思，他们连提也不能提，因为事关民族体面，那样说是会遭到绝对的反对的。大众们都认为此事与英格兰人的颜面有关，说处置他们自己国王的权利是英格兰人自己的事。

至于苏格兰人，不过是花钱雇来的外国兵，给他们钱，让他们回去算了！

苏格兰听了这话，却十分恼怒："查理不光是英格兰的国王，也是苏格兰的国王，他们与英格兰人有同样的权利监督国王本人，当然还有他的财富。"

原来问题的核心是钱！

于是议会通过激烈讨论，因为人们明显感到这是一向小气而且善于盘算的苏格兰人的敲

诈，但议会仍同他们签订了条约。12 月 16 日，苏格兰人在退兵前将领到 20 万英镑，分装 200 箱，贴了两国印信的封皮，用 36 辆车拉走，并有一队步兵护送出伦敦。司令官斯基庞当日发令：任何军官或士兵，无论言行或举动，得罪了任何苏格兰军官或军人，以致他们出来控告的，将严惩不贷。

1647 年 1 月 1 日，这个车队到达约克，该地燃放大炮欢迎，三个星期后，苏格兰人在北阿列顿镇领到第一批款项，当然订立此约的时候，并未提到国王的名字，但是条约签订之后，一个星期，两院都投票决议：应把国王送往北安普敦的霍姆比堡。

就在两国讨价还价的时候，国王作为交易的重要部分，下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派人去纽卡斯尔从苏格兰人手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呢？还是不用任何仪式仅仅要求苏格兰人把国王连同该地的钥匙及收到钱的收据交给斯基庞。

独立派坚持要按照第二个方案办事，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人们知道，对于国王，不过是战利品中的一部分罢了，同时对长老派也是一个打

击。但长老派却不肯如此，因为他们还指望通过劝说国王同意条件来完成他们的“革命”呢？

1月12日，由九个委员，即三个贵族代表，六个下议员，带了为数不多的随从，由伦敦出发，前去恭恭敬敬地将他们的国王领到手。

1月15日，当查理获知议会的决议及要将他迁到霍姆比时，他正在那里下棋。他要安安静静地下完这盘棋，然后说：

“我会将我的想法告诉他们的。”

他自己虽强作镇定，但他的左右却表现出了有失体面的惊慌。他的那些朋友和仆人朝四面八方打听，都想寻找援助，寻找避难之处，一会盘算怎样不失体面地逃去，一会儿又想试图在国内的某个穷乡僻壤发动保王党们的新起事，以拥护国王。

据说有一个苏格兰牧师在国王面前讲经，讲的是“诗篇”第五十二篇。开头一句：“勇士啊，你为何以做恶自夸？”

国王站起来，但没有读这一篇，而开始读起第五十六篇来了：

“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此刻，他周围的人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一齐起身，与国王同诵该诗，倒真有些英雄扼腕的味道。

1月22日，委员们到达纽卡斯尔，苏格兰议会已经于1月16日正式同意交出国王。查理听到这一消息，不无感慨："我真想知道，我究竟值多少钱！"他还是很客气地接待委员们，同他们愉快地谈论，并向彭布洛克祝贺，说他如此高龄，气候这样冷，还能够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国王又询问了道途的情况。总之，他似乎急于叫大家相信，他是很高兴回到议会去的。虽然他心里相当清楚，苏格兰人把他给卖了。回到伦敦根本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

2月9日，国王在一队骑兵保护下，离开纽卡斯尔。此时，疲惫不堪的苏格兰人在拿到钱后，已经撤走了。一路上他走得很慢，每处都有成群的热心人来围观。

到了诺丁汉，这里是费尔法克斯的大本营，他出来迎接国王。出于对国王的尊敬，他一看到国王就下了马，吻了国王的手，又上马，很恭敬地同他谈话，陪他穿过市镇。

克伦威尔最看不惯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恨恨地对勒德洛说："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会结结实实给这些人一顿该得的教训。"

长老派们在威斯敏斯特对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放心，但不久就高兴起来，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成了国王的主人，终于能够自由自在，放心大胆地攻击他们的仇敌了。

查理于16日到达霍姆比，19日，众议员们便已经投票，以159票对147票获得通过，议决应该遣散军队，只留下可能需要用于对爱尔兰作战，用于镇守要地，及警卫国内各地的部分军队不予解散。

又以12票之差险些解除费尔法克斯的军权，他虽然得到了兵权，但议会却颁布法令，规定议员不得在他的军中任职。以136票对108票，又规定：他手下的军官官阶不得高过上校，必须要遵守长老会的教规，等。贵族代表们还说：为了解放伦敦四周的各郡（事实上他们都是忠于国家的事业的），要求军队在未遣散之前，

应驻扎在离伦敦较远点的地方。

同时，在伦敦市借了20万镑，以付给被遣散的队伍中的一部分欠饷。最后派一个特别委员会，长老会的全部领袖如霍利斯、斯特墨尔顿、格林、梅纳德、沃勒等几乎都在委员之列。这个委员会奉命监督这许多法案的执行，特别是催促军队去爱尔兰救援那里的基督徒。

事实上人们都清楚，长老们其实是不关心爱尔兰基督徒的死活的，他们要的是军队在同爱尔兰人的战斗中消耗干净，这样，他们就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对付那些独立派的家伙们了。

长老派的进攻并非出乎意料之外，独立派在最近两个月内，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议会内的势力的下降，因为他们眼见许多新议员尽管开头曾同他们合作，但由于害怕长老会的专制，已经开始反对他们了。

克伦威尔有一天对勒德洛说："为议会出力真是太可怜了，无论一个人怎么真诚，只要有一个律师毁谤他，他就永远难以恢复名誉，投军却不然，一个人为将军出了力，他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既不怕责怪，又不怕人妒忌。假使你的父亲今日还活在世上的话，他会结结实实给他们中

间几个人一顿：该得的教训。

克伦威尔在军队中受到绝对的信任和拥护，并深得军官们的辅佐爱戴，其中有不久前才成为他的女婿的爱尔顿。他原是个学法律的，现在却是骑兵总军需官，因为坚定、机灵，无论什么最大胆的策划，他都能不动声色地执行，而表面上平静自如。还有一个叫兰伯特，可称得上陆军中最有才华的军官，雄心勃勃，同爱尔顿一样也是学法律的出身，长于演说，具有良好的修养，对士兵和谒可亲。此外还有哈里森，哈蒙德，普赖德，里奇，雷思斯巴勒等都是上校，他们都表现出经得起考验的勇敢，一向为士卒所爱戴，而且都亲近克伦威尔。克伦威尔正是靠这些人的坚决支持，才可能控制军队，并施加自己的影响。

议会一谈到遣散军队，立刻遭到许多人的大声反对。克伦威尔及时将议会的不利行动通知军中的军官，军官们便偷偷将其传播到军中去，号召士兵力争补还全部欠饷，并拒绝赴爱尔兰打仗。

这时，军队开始向议会提交请愿书。3 月 25 日，最初一份请愿书，只有 14 名军官的签名，语

气很谦下、很和缓。提出清还欠饷及士兵有权利期待的几项保证。

议会不以为然地向他们致谢，腔调高傲，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对议会指手划脚，教它做这做那。

这个答复一到军中，立刻引起不满，于是军官们又准备了另一个请愿书，这次比第一次要坚决得多，而且要求也进一步具体。要求欠饷如数付还，不得丝毫拖欠，并要求规定凡（要）有不愿意前往爱尔兰的，不得加以强迫。还要求对残废军人及军人的寡妇及子女，应与抚恤金，等……。这次请愿书就不只是几个人签名了，而是由全体军官及全体士兵具名，而且这次不是对议会说话而是对费尔法克斯说话。

议会一听到关于军队举动的情报，就命令费尔法克斯禁止他们，并宣称，凡有不听命令的，坚持这种举动的，即以国家敌人及扰乱治安论罪。

费尔法克斯调节无效，议会便将请愿书抛在一旁，不予承认，继续办理遣散军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市开始募捐，但进行迟缓，募到的又不够用，于是，每月抽统税6万镑，以补足其数。

同时加紧催促出征爱尔兰，凡是愿来入伍的，都允许给予许多好处，并派斯基庞和梅西率领他们。有五个委员全是长老会中人，前往总司令部去通知这样的决定。

4月15日，委员们到达军队，有200名军官聚集在费尔法克斯家中，同委员们会商。兰伯特问道："我们在爱尔兰归谁统帅？""已经派定两位少将斯基庞及梅西。"哈蒙德答道："大部份军队很愿意追随斯基庞，若是别人，他们是不肯追随的。"军官们这时却喊道："是的，是的，但把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给我们，我们就愿意去了。"

委员们不知所措，走出屋子，请所有善意的人们到哈蒙德的寓所去谈。但只有十几个军官接受了这一邀请。

但是过了几天，4月27日就有141个军官送请愿书给议会，郑重其事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说："我们虽然当了军人，但我们希望并不因此而失去国民的资格，亦不会因此而剥夺我们在国家大事中的利益。在我们为我们的同胞购买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我们没有失去自己的自由。我们希望议会不会拒绝我们上

递请愿书的权利，因为议会的仇敌还有这样的权利……我们请求你们按照我们的需要，负责过问我们得来不易的薪金，尤其是士兵们的军饷。”

宣读过后，议会里一片喧哗。长老派说了许多威胁的话，很明显，整个军队已经联合起来。他们已经成为独立于议会之外的另一支力量。

议会看到这样的新权力显现出来，不单怕军队胜利，更怕的是军队此刻的力量。

较为小心的议员们变得胆怯了。有几个人离开了伦敦，而大多数人则向克伦威尔靠近。于是决定依从军队的要求，同军队自己的领袖们商议，看看有什么效果。从前只议决发给遣散的军队六个星期的军饷，现在愿给两个月的。又规定一条法令，特赦军人们在战争期间所犯的所有违犯规则及不合法律的行为，还以款项帮助军人们的寡妇孤儿。最后一条就是派克伦威尔、爱尔顿、斯基庞、弗利特洛德等几个既是将军，又是议员的人物，重新建立军队与议会之间的和谐，以期言归于好。

两星期过去了，议员们虽然不在大本营，却好象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他们常常写信，信里

没什么内容。

长老派的头目们早已预料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形，他们就利用议会的意思，只用了几小时就通过了一个更为坚决的议案。霍利士提出，议员投票决议，凡是不肯报名前往爱尔兰的军队应该立即解散，这项措施的细节如日期、地点、办法等都安排好了。议会决定将突然地、分别地解散这些军队，要在几乎同时间，或间隔不久的时间，就在其所驻的地点内，分别予以解散，这样就可使他们既无法会商，又无法一致行动。这个计划的最初行动所需的款项，已送到各个地点，并且派几个全由长老派组成的委员会，监督计划的执行。

军队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就陷入混乱之中，许多军队自由作主，互相联合。有的则占据教堂，武装坚守起来，宣言誓不解散，有的将运来准备分配给解散军队的钱夺到手，大家吵吵闹闹要求开大会。军人们立刻用士兵的名义写一封信给费尔法克斯说，倘若将军再不出面，那么他们就要自行开会，并捍卫自卫的权利，而不依靠别人。

费尔法克斯心里很难过，于是苦苦劝告官

兵稍作忍耐，并写信给议会，对于各方面都讲真话，可是无论对于哪一方面都没发生作用。一方面他仍是受人爱戴，但另一方面却发挥不出力量。后来，他招集了一个军事会议，军官们投票表决，认为议会的议决案不能使人满意，说既然没有更好的保证，军队是不会解散的；又说军队分驻的地方应该更集中些，并召开一个大会来解除恐惧，安定军心。最后，该军事会议递送一个措词谦恭的呈文给议会，报告所决定发生的情况。

议会现在不可能再存在幻想了。议会的权力正在面临军队的挑战，要对付这样的敌人，它需要依靠在名义上的实力，也需要依靠除法律以外的一切其他支持。

目前一方面只有国王可以赋予权力，另一方面，只有伦敦市能赋予权力，可是伦敦市完全是长老派的，而且快要变作保王党了。在这个观点之下，已经实行了一些措施，经过市议会的同意，已将民团指挥权从独立派手中交给一个长老派委员会，并拨给12000镑以供卫兵的军饷。双方在战胜国王之后紧锣密鼓，竞争个你死我活。国王查理似乎应该高兴了吧！但好运并没有

伴着他。

国王有些不相信有人敢带他走："你的授权指令呢？"乔伊斯则指着身后一群武装在身的士兵说："这就是我的授权指令。"

国王到达霍姆比后，对于他在纷卡斯尔收到的提议对议会作了一个详细的答复，交与议会。但过了两个多星期，议会竟毫无考虑国王的答复的表示。经过如此之长、如此恼人的折磨、等待之后，和解好象是十分困难了。

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贵族院已经投票议决，要使国王陛下住在靠近伦敦的地方，即住在奥特兰兹，并盼望国王不久就与议会联合。当然这是长老派们的想法。但是，一向以深谋远虑、果断坚决而著称的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却抢先一步，把国王从霍姆比带走，一举粉碎了长老派的幻想。

6月2日，国王用过午餐后，在霍姆比2英里的奥尔托普草地上，玩滚木球的游戏，陪伴他的委员们很诧异地看见一个面生的人穿着费尔法克斯的卫队军服，站在旁边的人群中。

格里夫斯上校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军队里谈些什么，这个人回答很生硬而傲慢，但却还算不上无理。

不久就有人在查理左右传说：有大队骑兵正在向霍姆比驶来，格里夫斯对那个陌生人说："你听说过他们要来么？""我不止听说过，我昨天还看到他们离此地不过三十英里。"这句话引起很大的惊慌，大家马上回到霍姆比。多少作了些防备袭击的布置，驻防军表示效忠于议会。

快到半夜时分，一队骑兵来到堡墙外，要求进堡。委员们问道："你们的司令是谁？"他们答道："我们全是司令。"有一个人走上前，就是那在草地上看国王打球的陌生人，说道："我名叫乔伊斯，我是将军卫队的掌旗官，我要同国王谈话。""谁派你来的？""我自己派我来的。"委员们大笑。"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乔伊斯冷冷地说："我并不是来这里领你们的教训的，我与你们委员们无关，我是来见国王的，我必须和国王说话，而且马上就要同他说话。"

格利夫斯与布朗少校命令驻防军开火，但是士兵们已经同新来的人谈话，放下铁栅，大开堡门，乔伊斯的人们已经在院子里下马，与城内

的士兵们握手，口称他们奉军队的命令安置国王于安全的地方。因为有人要劫持国王送往伦敦，号召其他部队重开内战。他们还说，驻防军司令格利夫斯上校参与了这个阴谋。士兵们听到后大喊："我们不愿抛弃军队！"

格利夫斯不见了，匆匆逃走了。

时近中午，乔伊斯占领了堡垒，在四面安置了哨兵，就休息了。

晚上10点钟，乔伊斯来到国王住处，要求会见国王，有人答道："国王已经睡了。"乔伊斯看了看手中枪口翘起的手枪说："我不管，我等得够久啦，我一定要见国王。"有人问他是否委员们授权给他做这件事，"不是的，我已经派卫兵在委员们的门口看守他们了。命令我来的人是不怕他们的。"

国王的仆人试图使乔伊斯放下武器，但他毅然拒绝了。仆人们仍迟疑不肯开门，他就发起怒来，国王被吵闹声惊醒，拉了铃，吩咐侍从们让他进来。乔伊斯走进卧室，脱下帽子，仍拿着枪，神色坚决但并非无礼。

于是国王当着几位委员们的面，同乔伊斯会谈了许久，随后打发他出去，说道："乔伊斯

先生，祝你晚安，如果你手下的人们履行你所答应我的全部条件，那么我就愿意同你一起去。”

第二天一早6点钟，乔伊斯的士兵在堡垒的院子里骑马列队。国王在楼梯口出现，委员们及他的仆人们跟随在后。

乔伊斯走上前，国王说道：“乔伊斯先生，我必须问你，谁授权你居然敢于拿我，逼我离开这个地方？”“先生，我是奉军队之命来的，以防止军队的仇敌们的阴谋实现，他们想叫国内再次流血。”

“你所奉的不是合法的权威，我不承认在英格兰除我之外的任何人的权威，其次，我也只承认议会的权威，你有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的书面命令么？”

“我所奉的是军队的命令，而将军是包括在军队之内的。”

“这不能算回答，将军是军队的头脑，你到底有没有书面的命令？”

“我希望陛下不要再盘问下去，我已经说得够了。”

“你必须对我说坦白话，你必须告诉我，你所奉的命令究竟在哪儿？”

"就在这里。"

"在哪里?"

"在这里。"

"但是,到底在哪里?"

"就在这里,"乔伊斯指着他背后的兵士们说,"这就是我的授权指令。"

国王微笑了:"你的指令的确写得很清楚,你的任务确实也公道合理。……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像你这样漂漂亮亮、规规矩矩的士兵了。但你必须明白,什么也不能强迫我做对不起我的良心或有损于我的体面的事。"

全体士兵们喊道:"绝无这样的事,绝无这样的事。"

乔伊斯说道:"我们绝对不肯逼人做违反他们良心的事,更不用说对于陛下了。"

"好吧,诸位,现在你们必须告诉我,要我到哪里去。"

"到牛津,陛下。"

"不好,那里的空气不好。"

"那么到剑桥。"

"也不好,我宁愿往纽马克特去,那里的空气于我是相宜的。"

"陛下喜欢哪里就是哪里。"

于是乔伊斯下令出发。

与此同时，一匹快马奔向伦敦，一名骑兵带着乔伊斯的一封信向克伦威尔报告，诸事成功。

两天之后，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全部部下，以及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哈蒙德、兰伯特与里奇等人在剑桥附近的奇尔德斯利觐见查理。这些人中多数都诚惶诚恐地吻国王的手，只有克伦威尔和爱尔顿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肯上前。

两院也得到了这一些消息，他们一定会发怒、会害怕，一会儿十分坚决，一会儿又很软弱。最初得到国王被带到某处的消息时，人们普遍感到沮丧。斯基庞带着伤叹的腔调提出一个议案，要求人们举行禁食，以便从上帝得到力量恢复议会与军队间的和谐一致。

同时投票表决，立刻为发还欠款而拨出一大笔款子。

但是后来得到的消息却引起了愤怒，恢复了议会的"勇气"。

他们从委员信件中发现，这次大胆的突击就是由克伦威尔授意策划和决定的。等到克伦

威尔再次在议会中露面时，他们便说出他们的疑问，并且不知从哪儿弄来两个军官，向议会控诉克伦威尔，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很相信军队的，但是，另有一个团体的人，特别需要说清楚，那就是下议院的一些人要插手——而只有军队才能办这件事。"

为此，克伦威尔作了很长的辩解，议会虽然暂时答应不追究此事，但克伦威尔却认清了这样一个议会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使查理更高兴而已。

6 月 10 日，他离开伦敦回到军队，因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有军队才能够办这件事。

他到达军队不几天，就率领士兵们向伦敦进军。全体部队已经庄严地签字宣布，要将他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到底。

在一篇名为《谦逊的通告》的文件中，向议会陈词，不再只是描述他们的痛苦了，而是很自信庄重地表示他们各方面的意见，谈到了国事，议会的结构、选举、请愿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普遍改革。最后在这许多史无前例的要求之外，还加上一个计划，要求弹劾 11 个下议员，即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纳德等人，说他们是军队的

仇敌，说议会之所以陷入种种的致命的错误之中，都是由于这11个人。

长老会已经料到这样的打击，因此事先作了准备，以保护自己免遭伤害。他们用最短的时间，运用最大的努力，以引起伦敦市民对他们的好感。对于盐税及肉税，民间一向啧有烦言，现在被取消了。被禁止的宗教庆祝节，现在随便欢庆等等，但是大众仍然吵吵嚷嚷，反对一群贪婪的议员们。说他们一个人独兼许多优差，独赚许多赔款，以及充公的财物。

下议员们于是投票决议，任何议员都不得担任任何肥缺，或接受馈赠，及私占反叛分子的充公财产。已经收到的非法赃款，应该上交国库，他们的田地应按照习惯法的规定，用来偿债。最后指出，过去曾派有一个委员会专管受理市民们的疾苦申诉书，久已形同虚设，现在在更为有力的基础上，应重新设立这个委员会。

事实上，政府的各项让步除了证明时势艰难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了。在这个时候，议会中的各种势力纷纷承认自己多多少少的错误，目的只是为了无罪。

对于长老派的头头们，伦敦市民看不起他

们，更不信任他们。但是，有个时期这些办法还是有一定效果，市政会宣布支持议会，市民们组成了几个营；民团又重新召募起来；退伍军官也纷纷到军营里报名投效。

同时，伦敦的四面开始筹备防御。6月15日，议会投票决议，要求克伦威尔的军队撤退，把国王交与议会的委员会，并请国王住在里奇蒙，单独受议会保护。

军队不予理会，继续前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的名义向市政会写信，责怪他们招兵买马，反对军队。

市政会送了一封毫无意义的复信，以伦敦的恐怖作为招兵的借口，而且郑重声明，如果军队肯退出，且愿驻扎在离伦敦40英里远的地方，所有的分歧就会很快停息。

费尔法克斯答称：这封信来得太晚了，他的大本营已经驻在圣·奥尔斯本，必须立刻送去一个月的军饷。

议会投票决议照给，但一定要军队后退。军队则要求首先将他们的仇敌，即那11个议员，从议会开除。

下议员们此时没了主张，他们下不了决心

亲自动手对同僚进行如此沉重的打击，讨论来讨论去仍没有结果，最后提出没有证据证明事实，无法定罪。

军队立刻反驳："当初控告斯特拉福德时，不也是空无一凭吗？你们可以日后收集证据。"

于是军队仍然前进。6月26日，该军的大本营扎在阿克斯布利奇。

伦敦市派调停委员会赴军队，但毫无结果。于是伦敦市内更加慌乱，商店闭门不开，街上行人稀少，人们都痛恨地批评那11个议员，怪他们执拗，以致深陷议会及本市于危险之中。

11个议员当然明白这种情势的严重性，于是不得不自动从议会告退。6月26日，下院投票决议，采纳军队的各项建议，愿意供给饷项，并愿派委员们协同军队共商国家大计，并再三声称，不再请国王来里奇蒙，无论如何至少请国王在较远的地方，不要比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离伦敦更近。6月30日，费尔法克斯接受了这个条件，退兵数英里，派10个委员与议会的委员们会商。

国王正准备依照议会原来的要求启程前往里奇蒙，但无论他在哪里停留，都有不少卫兵包

围着他，他对此很生气：既是我的议会请我前往里奇蒙，那么倘若有人阻止我，那就必须要用武力或抓住我的马缰绳。如果有人胆敢尝试做这件事，那就莫怪我使这个行动成为此人一生最后的行动。

可是不久他就得知，正是议会向军队让步，反对他启程的时候，议会与军队正在谈判讲条件，他便好象得了胜似的，自负地笑了笑，急匆匆将新的计谋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于是国王利用一些忠实他的人，向伦敦城里散布关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谣言。长老派更是加紧活动。四处扇风点火。

于是立刻有消息传到军队，说伦敦爆发骚乱，成群的市民和学徒不停地包围威斯敏斯特，要求议会投票决议请国王回来，并使那11个议员重进议会。

不到几小时，整个伦敦便陷入混乱之中，于是便有人开始四处宣传，要国王体面、自由地回到伦敦来。

议会中的独立派立刻感到有人暗中搞鬼，便送信给军队，7月29日，军队立刻向伦敦进发，费尔法克斯以军队的名义写信告诫议会不

要出尔反尔。

独立派有了这样的支持，便在议会宣言，凡是赞成伦敦市承担保王任务的，一律以大逆不道论处。

但是，已经迟了，许多被蒙骗的大众成群地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前。有几个在那里又叫又骂，显然是带着什么大胆的策划来这里的。

惊魂未定的下议员们就座以后，命人关闭大门，并命令议员不经准许不许出门。随即从市政会送来一份请愿书，语气还算温和有礼，要求把民团指挥权交还给刚才交权的人们。

议会还在讨论请愿书的时候，议长得讯说，门外的群众要另递一封请愿书，于是立刻拿来宣读，意思同市政会的相差不多，让人一看便知是同一人策划的行动。

议会继续进行辩论，并不立即予以答复。一天快结束了，门外的群众被这样拖沓的作风所激怒，他们占据了通向议会的所有街道。杂乱的脚步声与吵闹声弥漫整个议事厅。

有人在门外大声喊叫："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于是就有人凶猛的撞击大门。致使几个议员拔出佩剑，才止住冲进来的人群。但是他

们很快又破门而入，约有四五十个凶暴的家伙冲了进来，并不脱帽，身后围观的群众用充满威胁的姿态喊道："投票议决！"

议会被逼无奈，只得让步，撤销了昨天的宣言，民团又归长委会委员指挥。人们本以为可以了，议员们站起来，议长也离了席。但这时有几个狂徒抓住了他，把他按在座上。

议长问："你们还要干什么？""我们要国王即日就回到伦敦来。"

这个议案立即提出，"投票议决"通过了；只有勒德洛一人大声坚决地说："我不赞成！"

克伦威尔刚把国王的威风打下，就有人向他开火了，所以，他的麻烦来了。

军队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气愤，没有一个不责备国王，官兵们非常清楚，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国王查理搞的鬼。

这时，有几部马车从伦敦来到，人们大为惊奇地看见有 60 多名两院议员从马车上走下来，为首的是两个议长曼彻斯特勋爵和伦索尔先生。他们解释道，他们刚从盛怒如狂的乌合之众

中逃出来，来到军中以求安全和自由。

军队获得意外的高兴，本来生怕与议会发生猛烈的冲突而决裂，而现在，议长和忠诚的议员们却都来登门求救，要求庇护，军官和士兵们围住避难人，听他们讲说受的危险和侮辱，无不表示极大的愤怒。他们感谢上帝激发议员们下定如此的爱国决心，并且对议员们表示崇敬。

消息传到国王那里，（这次闹事本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于是有人劝他应立即写信给军队领袖，表明愿意接受军队的条件，以解除他们的怀疑。但查理却也得到伦敦的消息说就在避难的议员离开伦敦的那一天，留在伦敦的另一部分大多数议员，就选举了两个新议长。下院佩尔罕先生，上院威洛比勋爵。被逐出的11个议员恢复了席位，这样改组后的议会立刻下了命令，要军队停留于原地，并命伦敦尽力准备防卫工作，命梅西、布朗、沃勒、波因茨等人赶快招兵。城中也开始募集捐款，在城上架了炮，最后就是正式请国王回伦敦。每条街上都有人鸣号宣布这个决议。并且很快这个决议就送到国王那里。

正因如此，国王说："我姑且等一等，写这封信是来得及的。"

但是，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可不是等闲之辈：“两天之后，伦敦市就将在我们手中。”

8月6日，辉煌的令人敬畏的大军整队从肯辛顿前往威斯敏斯特，3个团作前军，1个团殿后，在两军之间的是费尔法克斯和他的部下军官骑在马上，逃亡的议员分乘自己的马车，从容地向伦敦出发。原来，伦敦市在大军到来之前已经投降。

在路两旁站着两行士兵，帽上插着桂枝，大声欢呼着：“议会万岁，自由的议会万岁。”他们在海德公园看见市长及市政厅参议员们前来欢迎将军，称颂他使军队与伦敦市重归于好。费尔法克斯在市长等人身边走过，几乎没有作任何回答。

到了威斯敏斯特，才晓得大多数的长老派领袖已经逃的逃，藏的藏，不敢露面。费尔法克斯恢复了军队的朋友们的议员席位，带着谦逊的神色，听他们投票议决发一个月的饷给军队，随即前去接收伦敦塔。

两天后，斯基庞在中军，克伦威尔在后军，全军游行通过伦敦，军容威严，寂然无声，纪律森然，并无任何市民受过哪怕是最轻微的侮辱，

军官们要的就是使伦敦市民放心，同时也是向全市示威。

他们达到了目的。长老派看见这许多军人，虽然高傲非凡，却是严守纪律，虽然威势赫赫，却服从命令，便只好回家关住了大门。到处都是独立派掌权。可怜的伦敦公会求费尔法克斯及他的军官们赏脸赴宴，他拒绝去，可是公会便迅速命人打制一个花纹凸出的黄金大口水罐献给他。费尔法克斯随即把这件东西献给了军事委员会作军费处置。许多市民前来向他祝贺，他正式接待他们，并留他们吃饭。

两院现在已经投票议决，凡是未逃的议员所办的事，不用作专案取消，一切自动无效。

军队的完全胜利已经成熟，受到了内外一致的称赞。从此长老派的政治地位开始跌落，独立派政治优势宣告确立。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647年春，就在长老派与军队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独立派兴起并发展壮大的时候，在英国的革命舞台上，第三支力量“平等派”也开始崛起，它的领袖是约翰·李尔本。

约翰·李尔本（1628～1657）是英格兰北部

达勒姆郡的一个小自耕农的幼子。12岁时，就来到一家服装店当学徒。年轻时，他是个非常虔诚的清教徒，全力投身反国教斗争。1637年，不满20岁的李尔本，因散发清教的书刊和印刷品而被捕。在法院受审时，他声色俱厉的反驳对他的指控，被判了重刑。

1638年2月从弗利特监狱到威斯敏斯特途中，李尔本一路走，一路被当众鞭打。但他坚强不屈，继续向沿途群众散发随身藏匿的宣传清教的小册子。到威斯敏斯特后，李尔本被戴上刑具示众，可他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刑吏把他的嘴塞上后，他便不断顿足表示抗议。由于他的倔强，他被戴上铁镣，单身关押，不发给应有的食物。但即使在监狱中，他仍以赤诚、坚定和胆识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在两年零九个月的关押期间，他是靠难友口中省下的粮食度日的。

1642年12月长期国会后在清算查理一世的弊政的热潮中，国会通过决议，对错判而被囚的无辜者平反昭雪，李尔本因此获释。内战一爆发，李尔本就支持国会，积极参战，奋勇杀敌，总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出现，因此很快晋升为中校。

1642年一次战役中，他不幸被王军俘虏，判处死刑，但后来国会用几个保王党俘虏把他交换了回来。李尔本一获得自由，立即又回到了军队，继续同王军作战。

李尔本如此坚决地反对封建制度，是出自于他一贯的信仰。他认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权利源出于上帝的神恩。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于人民手中，人民把它赋与下院，统治者应对人民负责，人民更有权抵制和反对背离职守的统治者。"国会本身应该清楚地知道，它不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应当做对人民有利和不损害人民的事。"

他对于长老派国会在内战中的反动政策一贯反对。针对他们专卖和出版检查制度在一本名叫《英国人的天赋权利》的书中写道："英国人啊！你们的自由在哪儿呢？你们用这么长时间为自由和权利而战斗、流血，指望得到自己的自由，但你们的自由和权利到底在哪里呢？"1646年6月11日，上院下令逮捕了他。

平等派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606年，它起初所指的是一小批由于生活无着而铤而走险的人，到40年代后期，那些有着较为激进的民主

思想的人，也被独立派称为“平等派”。因为，他们所要求的远远超过了长老派和独立派所愿意承诺的限度。平等派的支持者，绝大多数是新军中的成员。

1647年3月到7月，独立派高级军官在国会与军队之间徘徊，广大士兵在李尔本反对国会专横、要求继续革命的影响下，政治热情骤增。一份又一份体现李尔本主张的请愿书，雪片似地从东部各郡飞到国会和新军将领面前。这些请愿书的内容都是要求解除农民的负担，取消什一税和日用品的专卖制度，救济贫民，确立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扩大选举权，并请求释放李尔本。

不难看出，革命本身使人民不断成熟，而这种成熟的直接体现，正是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实现，在当时也许根本不可能，但它却有力地震撼着任何渴望自由的人的心灵。而一旦时机成熟，人民身上的这种政治上的热情就将成为新制度诞生的最直接的根源。

面对这些请愿书，国会大为震怒，为了发泄对平等派的蔑视，国会把5月20日送来的一份要求改革政治的请愿书交给刽子手当众焚烧。6

月1日，李尔本愤怒地写道："我获悉下院不愿听取、考虑和采纳为正义和民权而提出的正当呈请，却以鄙视相待，将它烧毁。对此，决定奋力以求，诉诸正直的刀锋——士兵。"李尔本始终认为军队是一种"推进装置"，能依靠它来争得他所追求的全新的英国宪政。

克伦威尔本人与李尔本相交甚厚，而且共同在对王军的战斗中出生入死。1637年正是在克伦威尔的动议下，李尔本才得以获释，因此，在因政治分歧而成为冤家之前，两人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

1647年9月6日，克伦威尔来到塔狱，会见了在押的李尔本。他劝李尔本要忍耐，不要那样严厉地非难国会，不要同他争吵。

李尔本说，我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同朋友争吵。但他异常心痛的是过去自己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已经背叛了他，背叛了他们最初的原则，他自己则因忠心于这些原则而被投入了监狱。

克伦威尔要李尔本谅解国会，他说，国会所做的一些事情也许有些越轨，但这是偶然而必要的，这种必要的条件一旦消失，情况就会迅速

改变的。

李尔本说：国会和军队里的显贵们，对所有的人都应公正无私，法律上应一律平等……但现在他们却成了企图建立新的专制政府来奴役人民的策划者……我现在和过去一样地赠恶暴政，不管这种暴政来自哪一方面，我将始终竭尽全力反对，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同他斗到底……

克伦威尔问他，如果获释，是否会平静下来？如果他有耐心，还将被授予一个光荣的军职。

李尔本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如果按照现在国会和显贵们的原则去行动，他绝不去参加无论是国会还是军队的工作，即使用全世界的黄金收买我！"

"如果我自由了，我将深入到军队中去，并在那里制造新的动乱！"

好一位不屈的理想主义者！

任何一场革命，首先是观念思想上的革命。而革命的领导者在革命过程中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就会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和坚决。

克伦威尔不是神，因此，他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束缚，作为革命者他能深刻领悟到

许多东西已经不易，我们没必要非让他超越时空地提出一套十分民主的政治体制。事实上，革命本身也是在反复地进行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谁占上风，就稍偏向谁，而最终将在这种反复中获得平衡与稳定，那时，我们便称之为社会的进步。

《人民公约》与《军人声明》

爱尔顿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他最害怕的是无政府状态，在克伦威尔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份纲要，主旨是：现存的国会必须解散，而代之以一个以财产资格为基础的，两年一届的新国会；在国会召开期间，国王无权终止或解散国会。《纲要》要求成立一个隶属于国会的国务会议，协助国会掌管外交和军事，其成员由国会会同各方面协商任命，任期最长不超过七年。《纲要》还规定国家机构的官员，目前由国会委任，十年后再由国王从国会推荐的人员中遴选。军队指挥权在十年内归两院掌握，十年后经国会同意，归属于国王；恢复高级教士——主教一职，但必须废除其干涉世俗事务和因宗教问题

而给人以处罚的权力。《纲要》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条款，其中包括要求确认人民的请愿权利、取消国内商品的消费税和专卖制度，整顿什一税等。

这个《纲要》对国王查理一世和国会的权力是有所制约的，但对他们的未来仍赋予了较大的权力。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国王和上院。

就这样，整整一个秋天，克伦威尔以《纲要》为基础，与国王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谈判。查理实在太狡滑了，他十分清楚长老派与独立派之间的矛盾，也明了军队与议会之间的分歧，因此，他不紧不慢地磨着，一心等着有什么乱子出现。这一步真让他走对了。

就在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进行谈判的时候，10月初1士兵鼓动员们起草并向费尔法克斯呈递了一份《军队的声明》，它体现了平等派的政治思想，它的内容不仅涉及诸如清洗和解散现有国会等具体要求，还从理论上勾画出一幅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蓝图。《声明》还提出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要求，例如：废除什一税，全面的宗教宽容，取消一切特权，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救济伤残，优抚孤寡，用王室和主教的地产来偿付士兵的欠饷和支付当前的薪金。

不久，鼓动员们又制定了一个《人民公约》，它的全称是："基于普通权利基础之上的，为了坚定和现实的和平而制定的人民公约。"它的基本精神与《军队致辞》一样。它提出：在1648年9月底前解散现存国会，未来的国会每两年选举一次，实行按居民人数比例的代表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未来的国会议员必须听命于他们的选民，议员有如下的自主权利：制订、修改和废除法律，建立和改组法庭，宣战和媾和，决定对外政策，任免政府各级官员，但他们无权干涉宗教事务，不能强制人民服兵役，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特权。《公约》最后宣布："这些是我们的天赋权利，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决心坚持，竭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来抵制任何反对者。"

当《公约》递交给军事委员会时，士兵代表提出：所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只要他们不是仆役和依靠救济度日者，在选举他们的代表进入国会的事情上应同样有发言权。

平等派的这两个宣言在新军内外激起了强

烈的反响，也震动了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独立派上层。很简单，这样的自由与平等是独立派绝对不能接受的。克伦威尔看到了“平等派”脱离实际的一面，在当时的英国，他们的要求是得不到满足的，但他也感到平等派已成为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必须谨慎从事。

10月22日，独立派高级军官讨论了《军队声明》，但毫无结果，克伦威尔就决定把平等派的这些政治纲领提交“全军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审议。于是一场辩论开始了。

1647年10月28日，“全军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伦敦郊区的巴特尼教堂内召开，费尔法克斯因病缺席，由克伦威尔担任会议主席。双方阵线分明：以克伦威尔和爱尔顿为首的是一方，他们绝大部分是高级军官和独立派绅士的代表；另一方是士兵鼓动员和团体的下级军官代表，大多数是平等派，还有从伦敦来的非军队成员，平等派分子约翰·怀尔德曼等人，雷因波洛上校是他们的主要发言人。

会议开始，克伦威尔宣布：召开这次扩大会议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公务，大家有权自由发言。

士兵鼓动员代表雪克斯拜紧接着发言，指

出：查理一世的王权统治和现存的国会是造成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如果要使国王满意，那我们就只能刎颈自杀，我们现存的国会，只是由一群堕落的议员所组成的腐朽了的大厦，应予解散。

爱尔顿针对这一观点，明确地反对解散现存的国会和摧毁查理一世的王权统治，认为这是“过大的跳跃”，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瓦解。表示决不愿意跟那些企图摧毁国王或国会人站在一起。

克伦威尔本人虽然反对专制的王政，却不同意平等派的主权在民的学说，他认为应在不动摇现存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他虽然同意爱尔顿的观点，但态度较为谨慎。对于《公约》他说：“《人民公约》这个文件所主张和表述的，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他婉转地肯定这种要求的正当性的同时，他从“结果”这一角度来说明这种要求的危害性：“……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为数众多的话，你们可曾想到其后果会怎样？这岂不是混乱，岂不是极端的杂乱无章？……请问，这难道不令每个正直的人为此而忧心忡忡吗？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末除了民族国家的一片废墟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因此，他最后说：

“光是提出一些好的目标是不够的，假定这种模式是卓越的，适合于英格兰这个王国的情况，但作为基础的德众，我们的职责是考虑其后果，考虑达到目标的途径。”

爱尔顿的明确反对，克伦威尔的婉转否定，都遭到了平等派成员的针锋相对的驳斥。

“你们说实现平等派文件中的建议有困难吗？”雷因波洛尖锐地反问，“如果我们的眼睛老是看到困难，那么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面对面地反对敌人？我认为在抗击国王时，如果不首先考虑到必将经历的困难，那是异常轻率的；我们投身于这场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不从事于每一项困难的任务并承受着困难的考验。”

“你们坚持现存体制和法令，认为不可动摇吗？”雷因波洛回顾历史，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他说根据确凿无误的历史记载，英格兰的正直人民和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暴君之间，发生过多次的斗争；那些公正平等的法令，没有一项是英格兰人民生而有之的，没有一项不是他们对统治者一度享有的特权进行斗争而获得的。即使是现行的，人民受其制约的法令和体制，一旦发

现它们对自由的人民已不合时宜，也可以将其变革或废弃。

会议进入第二天后，争辩转入选举权的问题。论战首先由爱尔顿挑起，他抨击《人民公约》第一条国会选举须实行按居民人数比例的代表制，说：

“如果这一条所指的是，凡是居民在选举时都有同等的发言权，我声明反对。”

平等派代表威廉·配第坚定地说：“我们断言，所有在英格兰的居民，生而为英格兰人而没有失去其国籍者，在选举中都应有同等的发言权。”

雷因波洛接着补充说：

“在英格兰，任何一个赤贫者，都象任何主尊者一样地要安身度日。”

他指出，投票的资格是基于人类的理性，“这是每个卑微者象每个高贵者一样地据有的。这种上帝赋于人类的理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在上帝的律令中，我全然没有找到一个说什么一个贵族可以选二十个议员，一个绅士只能选两个，而穷人则一个也不能选的话……所有英国人都必须受制于英国的法制，一切法制的

基础在于人民……”

爱尔顿否认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人们由于出身在英格兰，便正当地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那就是我们不能驱逐他们出境……但是，由于出生于英格兰而要求享受支配土地和其他一切的权利，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他拥有四十先令的年收入，那他就会象拥有一万先令年收入的人一样有重大的发言权，可以为他所在的郡推选一个骑士。”

随后，爱尔顿明确地提出，选举权是一种基于财产的权利，“我主要着眼于财产，”他说，“因为这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所在，如果你把这个也去除了，你就由此而去除了一切。正是这样，具备这种财产资格的人才有选举权，才能被选评为国会的成员。他们是国家中有永久性利害关系的人，正是他们，会集合在一起，懂得国家的全部利害关系。”

事情很明显，富裕的拥有财产的人们要用他们的投票权来奴役全体贫苦的人们。雪克斯拜科，为此而悲愤地说：

“我们被号召来为王国服役，并且冒着生命危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我们的天赋权

利……我们成千上万的士兵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现在看来，没有恒产的人在这个王国里也没有任何权利。”

雷因波洛激动地质问：

“我愿意知道，士兵们给哪些有地位的人战斗？战斗仅仅是为了使自己沦为永久的奴隶吗？”

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争辩在进行着，平等派并非要消灭私有财产，它所坚持的是每个成年男子不论财产多少，都应该有选举权。

11月8日，会议休会，同一天，与会的鼓动员离去，9日一部分鼓动员要求国会接受《军队声明》。但遭到拒绝。11日，扩大会议被解散。当晚，国王查理便从汉普顿逃跑。

“让他们抽签，抽着死签的立刻枪毙！”

14日，“全军委员会”发布宣言，声称抵制任何改变政治体制的意图，并要求士兵，在“我们有义务遵守秩序；忠于总司令和全军委员会，服从团队中每位军官命令”的誓词上签字。士兵群情激奋，最后高级军官不得不采纳雷因波洛

的提议，决定于11月15日举行集合检阅，首批将在哈特福德那的韦尔附近集合。

时值初冬季节，寒气微微，检阅场上，军容整齐的广大士兵们神情严肃，他们都清楚，这决非是一般的检阅，而是军中独立派与平等派之间的较量。当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来到检阅场时，雷因波洛把一份《人民公约》交给费尔法克斯。费尔法克斯有礼貌地接受后讲了话，他表示支持士兵们的正义行动，允许按克伦威尔在巴特尼教堂内确定的新方案来改革国会，并要求士兵在服从命令的誓词上签名。他发言一结束，立即有两名平等派军官司各脱和艾尔走出队伍，号召士兵们坚持《人民公约》而决不在誓词上签名，但军事纪律制约着士兵，他们一时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这时，哈利逊和罗伯特·李尔本率领的两个团队士兵意外地出现了。每个士兵帽子上都粘着一份《人民公约》，身上佩戴着平等派的海绿色绶带，一路高呼："英国自由，士兵权利。"昂然走入检阅场。

场内立时引起了一片骚动，费尔法克斯立即上前劝说，申明利害，哈利逊的团队很快顺从

了，大声说上了人家的当，士兵纷纷把人民公约从帽子上撕下来，但罗伯特·李尔本（他是约翰·李尔本的弟弟）团队的人拒不服从，而以叛乱的语言回答费尔法克斯。

克伦威尔见状，马上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立即挥剑策马，闯入士兵队伍，声色俱厉："把你帽子上那张纸扯下来。"他们不扯，他便亲手扯去士兵身上的海绿色绶带。克伦威尔的阴沉脸色、勃然大怒威慑着每一个人，要知道铁骑军一向以纪律严明而闻名国内，在军中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克伦威尔在队伍中拉出了十四个叛逆明显的士兵，命人拘捕他们，在现场组织军事法庭，判处三人死罪。军人委员会吩咐道："让他们抽签，抽着死签的立刻枪毙。"于是一个叫理查·阿纳尔的被当着全军的面就地正法。其余十一人在全团面前悔过，获释归队，另两名死犯，被带回营去听候处置。

4天后，克伦威尔向下院作出了关于平叛的报告，费尔法克斯也不无余悸地说："蒙上帝重恩，一切均归无效。"

作为用暴力镇压平等派的一次政治事件，克伦威尔表现出了绝上的勇气和胆略，为军队

稳定及日后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但是，人们仍不免该问：平等派真的错了吗？克伦威尔是正确的吗？

历史往往是这样，在无数偶然性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某些必然，如果韦尔阅兵不是以克伦威尔的胜利告终，而是平等派获得兵变胜利，他们又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

我们似乎很难回答：究竟是人在选择历史，还是历史在选择人本身！

第七章 国王走上断头台

查理的末日就要到了，他最终用生命成全了克伦威尔，但是克伦威尔胜了吗？

在蓝野猪旅店

1647年11月12日傍晚，在怀特岛通往霍尔本的路上，三个军人在迅速地赶路。前面两人是普通士兵的装束，后面跟着一个骑兵。他们来到了“蓝野猪旅店”后，骑兵留在门口，士兵打扮的两个人跨进旅店餐室，拣了个桌子坐下，要了些啤酒，不时地注视着门外。

晚上10点钟时，门口闪过一个人影，头上顶着马鞍。骑兵立刻向室内示意。那两个士兵便走出餐室，手执宝剑，来到那人面前，自称奉命检查过往行人，夺下马鞍，返回旅店。

马鞍被拆开，一封密信赫然在目。他们取出信件，又仔细地将马鞍重新缝好，回到外面，交给那个莫名其妙的过路人，若无其事地告诉他：你是一个诚实的人，现在可以赶路了。

一封密信被截获了，这是查理国王给王后的信，那两个拆开马鞍的士兵不是别人，正是克伦威尔和爱尔顿。

原来，查理国王从汉普顿宫潜逃至怀特岛后，便与苏格兰人加速密商，并对军队和议会同时采取暧昧态度。由于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急于击败长老派，不得不借助国王的某些影响，而国王还是利用独立派的这一弱点，一心要利用矛盾，扩大分裂，从中渔利。

克伦威尔及爱尔顿始终在同国王进行着谈判，但国王表面上口口称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诚意。同国王的接近，招来了军队中很多官兵的不满，克伦威尔由于受了查理的蒙蔽，对此大为惶惑，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克伦威尔从一个安插在国王卧室的密探那里得到报告说，国王将有一封给王后的信，从他的住处凯里斯勃鲁克发出，这封信被缝在马鞍内，由一个信差携带。信差将于晚上

10点来到霍尔本的“蓝野猪旅店”，那里有一匹马等候着把他带出多佛，再从多佛把马鞍当作包裹，由船运到法国。克伦威尔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和爱尔顿乔装成两个普通士兵，前往指定地点，截获了这封藏在马鞍中的密信。

查理一世在信中告诉王后：他受到多方面的争夺，他将参加到对他最有利的那一方去，他愿与苏格兰长老派而不是军队方面协商谈判。“至于其他，”国王在信中补充说，“我了解我自己的处境，能够很容易地在我许可的范围之内作出忍让。只要时机一到，我很清楚该如何对待那些恶棍们，那就是，给他们以大麻制作的马缰的鞭笞，而不是给他们戴上丝质的嘉德勋章的绶带。”

两位将军看着这封“马鞍信件”，面面相觑，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同国王进行一些妥协的最后一线的幻想破灭了。他俩立刻返回蕴沙，召开军队主要军官会议，商讨对策。3月底克伦威尔托人转告国王的亲信：“虽然我一向乐意为国王服务，但我绝不愿为了国王而自取灭亡。”

约翰·伯克利赶快带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给国王，恳求他立即逃走，片刻也不可耽延。查

理本可以逃得了的，因为王后曾打发一条船来，就在怀特岛四面巡航，已经有好几天了。但有一个新的阴谋复活了国王的希望。

12月14日，下议院在很热烈地进行了一场争辩之后，投票决议，提出4个条件，以议案的形式送与国王，他若肯接受的话，就许可他按照他的几项要求，亲自同议会商议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海陆军统率大权交与议会执掌，20年以后如因王国的安全需要，得由议会继续执掌此项大权。

第二，国王必须撤消自己过去所发表的反对议会的诬称议会为违法及反叛的一切宣告。

第三，国王应宣布凡在他离开伦敦以后所封的勋爵全部作废。

第四，议会有权在它认为适当时作出长达任何时间的休会决定，可以移至任何地点开会。

查理当然无意批准这四个议案，如果批准无异于等认使他落到这个地步的战争的合法性，苏格兰长老会寄信来劝他拒绝这样几个令人难堪的条件，并答应他们将亲自来怀特岛，以苏格兰的名义同他商量更好的条件。

也正因此，查理对伯克利说："我必须等待，在我离开王国之前，将与苏格兰人定下条件。他们一旦看见了我脱离了军队的手掌，他们将会提出加倍的要求的。"

于是，劳德戴尔、劳登和兰纳克3个勋爵到了卡列斯布鲁克堡，登比勋爵与他们的五个同事，都是威斯敏斯特的委员，几乎也是同时到达的。

秘密谈判大约进行了两天，12月26日就议妥签字，藏在岛上的一所花园内，等待日后能够安全地取出来。

密约中答应派一支苏格兰军队来干预，以恢复国王的正当权利，条件是国王必须肯定长老派在英格兰存在3年，可是并不要求国王及他的朋友崇奉长老派的教义。此外还有几个条件，都是有利于苏格兰的，但大大伤害了英格兰的体面。还有就是为了协助苏格兰军队，保王党也应组建军队，拿起武器。至于国王本人，一经拒绝那四个条件后，就该从怀特岛逃出，前往苏格兰边界，但贝里克或者其他地方以自由的身份等待行动时刻的到来。

诸事商议已妥，12月27日，查理回信给议

会委员会，说他预备给他们答复。

3年前在牛津谈判的时候，国王便曾把答复装在密封加印的信封内，因为他就害怕一旦议会知道他拒绝，或知道他的计划，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推翻全局。但这次，当他把封好的信封交给登比勋爵让他带回议会时，登比拒绝以这种形式接受国王的回信，他说："议会授命我们带回去的不是陛下高兴给我们的无论什么东西，而只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那四个议决案。"

国王无奈，只好大声宣读了回信，回信是拒绝那四个条件，又表示事前不接受任何条件，而要求亲自与议会面商。委员们退出，讨论了一会，就回威斯敏斯特去了。

他们走后几小时，国王正在和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讨论准备明晚逃走的方法时，堡寨的大门关了，并禁止陌生的人进来。各处派了加倍的守兵，国王的几乎全部臣仆奉命离开本岛，而最先离开的就是阿什伯纳和伯克利。

查理满腔怒气、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打发人去把守将哈蒙德请来，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所奉的命令在哪里？是什么鬼神叫你这样做的？"

哈蒙德其实并不曾奉过什么正式命令，但他得知国王拒绝议会的四个条件后，就决定这样做了。他一声不响，只是在那里听国王大发牢骚：

“你能为我找一个牧师来么？你口里说信教自由，却不许我信教自由！”

“你不是向我作过担保，在任何情况下不利用机会来反对我么？”

“你既不把我当作军人看待，也不把我看作基督徒？”

哈蒙德说：

“在你的脾气变好些以后，我再向你说话。”

国王说：“我睡得很好！”

哈蒙德说：“我曾十分礼貌地对待你。”

国王问：“现在你为什么不以礼待我？”

哈蒙德答道：“你太趾高气扬了。”

国王说：“这是我的鞋匠的过错，但是我的鞋跟和从前的是一样高的！”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问：“我可以自由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么？”

“不能，我不能允许你。”哈蒙德转身走出国王的房间。

“疯人院是为精神病设的，而地狱却是为国王而设的。”

议会的委员们回到了威斯敏斯特，他们刚刚报告他们的使命及其结果，就有一个一向默然无闻的托马斯·罗思爵士站起来说道：“议长先生，疯人院是为精神病设的，而地狱却是为国王而设的，可是近来我们的国王的所作所为却好象他们只配送到疯人院。我提议将国王扔在一旁，不用他治理国事。我不管你们建立什么政府形式，只要没有国王或魔鬼就行。”

爱尔顿立刻支持这个提议，他说道：“国王拒绝那四个议决案，就是不给人民和平。不肯保护人民，人民甘愿臣服于他，原是以保护人民为交换条件，国王既然拒绝保护人民，我们就拒绝对他臣服，我们只管自己办理国事，用不着他了。”长老派听见他这样粗暴地攻击国王，大吃一惊，但因查理拒绝条件，又感到烦躁，他们有一会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又很胆怯，但却也有几个议员发言反对这个提议。梅纳德说道：“如果通过这个议案，至少就我们的权力而论，就等于

解散议会，当国王们拒绝接受我们的请求，或拒绝倾听我们的陈述时，我们一向把它看作是对我们的特别权利的最大破坏，因为这样做法的趋向，就是不解散的解散。而且，就我们方面而言，我们现在若决定不再接受国王的信息，亦不对他再有所陈述，我们就等于宣布说我们不复是一个议会了。”这件事讨论得很久很激烈，长老派重新恢复了自信力，议会初时对长老派很冷淡，但好象有些摇摆不定。克伦威尔就站起来说道：“议长先生，国王是一个极有见识和天才的人，可惜太习惯于欺诈，太习惯于虚伪，我们是无法相信他的。他一面指天誓日说他怎样酷爱和平，却另一方面暗中同苏格兰人谈判条件，不惜陷国家于另一场战祸之中，现在大家一致寄望于议会，盼它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决断来治理国家，保护国家，且要议会切勿再教育人民将安全和治理的希望寄放在一个执拗残性的人身上，上帝已经使这个人的心变得象铁板一般硬了。过去有一些人付过鲜血的代价保护你们免陷于如此之多的危难，现在他们仍会再以同样的勇敢和同样的忠诚，不顾一切反对，来保护你们。要教育人民不要由于你们忽视自身的以及

国家的安全的缘故致使自己感到被人背弃了，感到被置于受仇人恶待和欺凌的境地，而人民曾经为了你们的利益已经镇压了那些仇人。请你们切勿使人民失望之余，由于不愿依附你们而另寻生路，自求安全。我一想到人民这样的决定会对你们产生什么破坏性后果，我浑身战栗，我只好请你们自己去判断吧！”他说完后，坐下，一把抓住佩剑的剑把！他说过之后便再无人发言。

这个决议案就立即通过（141 票对 92 票），翌日送与上议院。

与此同时，军队送来了两份宣言，一份是给下议院的，满纸都是庆贺之辞。一份是给上议院的，温和婉转，答应尽力帮助贵族。上议院讨论之后，投票表决时，只有沃里克与曼彻斯特反对。

克伦威尔面对自己的胜利，却有所不安。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趋向成功的东西还有什么瞻前顾后，而是因为他虽然已经下定决心反对国王，但是共和派人以及狂热分子们的企望与他们的野心，在他看来，却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

他清楚地看到，全国的主要地主和富裕的

国民，几乎稍有名望的人，都汲汲于归隐，退出董事会，不问地方上的公事。事权遂落入景况较差的下层民众手中，他们固是急于掌权，也能够雷励风行地使用权力，不过要让他们保持权力就不中用了。

因此，他不能相信英格兰长老会长期甘愿受这样的统治，也不肯相信在为数可观的这许多市民在承受法律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局面能够持久，他当然更加清楚：议会里以及议会影响范围内的与日俱增的分歧与混乱，终究会使征服者以自身的毁灭告终。

他以不知疲倦的想象力决心找出一些方法来结束这样的情况，至少也要在这样的黑暗的混乱中找出一条最快、最安全的路，以成就他的伟大的事业。

一天，克伦威尔请来重要的独立派人士与长老派人士、牧师及无圣职的教徒，在他家里吃饭，热烈地讨论和解的必要，至少也需要暂时停止他们之间的争执，以便共同对待显然即将来临的危险。可惜长老派的脾气太不能迁就，又太过于排他，会议没有结果。

克伦威尔于是又开了一个会，另请许多政

治领袖来，其中大多数是军官，还请了平等派的人士，他说有必要共同研究英格兰究竟是适于什么形式的政府，因为他们现在要负责管理了；实际上，他是想摸清究竟这些人将来谁会协助他，而谁应该警惕。

勒德洛、哈里·文、赫钦森、西德尼、哈斯勒里格等都大声地宣布自己的看法，反对王朝专制。但将军们却较为保留，他们认为，共和制虽然好，却不敢确定会成功，最好不作仓促的决定，而观察事态的进展，时势的需要，逐日服从上帝的指挥。平等派的人士坚持要人们作出一个不闪烁其词的宣告。辩论进行得很激烈，勒德洛及其他的人力逼克伦威尔明白表示他自己的态度，他们说他们决心要晓得谁是他们的朋友。

作为克伦威尔本人此时也觉得双方都有道理，很难下定论，先是支吾搪塞，后被逼不过，他突然站起来说了一句笑话，匆匆地走出屋子，一面走出，一面甩一个椅垫子打向勒德洛的头，勒德洛也用了另一个椅垫子向他背后打去，笑着说："我这一垫子，叫你下楼下得更快！"

但就在克伦威尔将要作出抉择的时候，危险却已经逼近了，心怀不满的人日益增多，胆子

也越来越大。而国王同苏格兰人的密约起了作用。3月2日，苏格兰议会开会，汉密尔顿为首的长老派1648年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虽然阿盖尔和一些激烈的教士们企图打倒他们，但没有成功。于是5月3日，苏格兰成立了一个应变委员会，授以行政大权，叫它募集一支4万人的军队，赋以保卫国王的任务。

同时，英格兰北方的保王党们听见了这个信号，也纷纷起事。在爱尔兰也有人投到国王的大旗下。最后当所有这些消息传到伦敦时，议会内及伦敦市内的长老派又都抬起头来了，为了显示他们的希望，他们却越是故意叫喊着说他们害怕。

在这三个星期中，克伦威尔对于这次叛逆是早有预料的，因此他果断采取行动，以军队将领和本派领袖的名义，叫人向市政会提出建议，要求将指挥民团和守卫伦敦塔的权力交回伦敦市，并要求将被控的市政参议员全体释放，他们刚刚被以莫名其妙的罪名受到指控。

但伦敦市却拒绝他的建议。现在必须放弃一切和解的希望了，他看见长老派在伦敦市内重新获得勇气，在议会内又再度获得信任，他就

以满腔的激情来冒险作决定性的一击。

他回到大本营，召集军官们开了一个会议，提议军队应该向伦敦进军，从议会里驱逐一切与他们为敌的人。一句话，以善良人民和公共安全的名义，把大权揽过来。但是他的提议受到了抵制，即便是最大胆的人也感到突然，费尔法克斯开始对于克伦威尔所作的事感觉有些不放心，就利用这个机会，抵制克伦威尔的要求，这使克伦威尔不得不放弃了他立刻发出进军号的计划。他很烦闷，有些人由于他对妥协所作的努力而怀疑他，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计划太激烈而对他不满。他忍受不了这样的无所作为，以及这样的横加阻挠，便决定立即离开伦敦，进军攻打西方的闹事分子。他想以战争来恢复他受挫的威望。几天之后，克伦威尔统领了五个团的人马，向威尔士出发。

他刚刚离开伦敦，保王党们便在四面八方爆发了叛乱。在苏格兰军队进攻的同时，保王党的军队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了反抗，其声势如无法扑灭的大火，迅速蔓延，很快就逼近了威斯敏斯特。很快议会就能听到此起彼落的喊声：“上帝与国王查理！”

议会惊恐万状，立刻命费尔法克斯率兵出征。费尔法克斯奉命立刻攻打包围伦敦附近地方的各队伍。

兰伯特被派往北方，他的任务是镇压朗格戴尔和马斯格雷夫的叛乱军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比邻的威尔士地区，潘布洛克要塞司令，顽固的长老派成员波伊尔公开宣布支持国王，威尔士的许多要塞如丹比齐普托斯等先后作乱，转入王党阵营。5月10日，克伦威尔率领部下到达南威尔士。24日，迫近潘布洛克。他的部将迅速占领了丹化，和齐普托斯。到5月底，叛乱城镇一一被克服，只有龟宿在潘布洛克的敌人，还在负隅顽抗。克伦威尔集中优势兵力，对其进行多次强攻，仍未得手。正在为难之际，新型的大炮增援到了。又经过6个星期的苦战，7月11日潘布洛克终于投降。

克伦威尔西进的同时，费尔法克斯率部向肯特郡进军，冲过密特威河上敌人的防线，给分散的王党军团以有力的、决定性的打击。到了6月中旬，这个郡里的王党据点一一被铲平，只剩下戈林手下的王党军队，但由于人单势孤，掉头

北去，逃入埃塞克斯郡的柯尔彻斯特，继续顽抗。

“这不可能，他就是飞也飞不到这里！”可是，克伦威尔的铁甲兵已经到了。

就在克伦威尔与费尔法克斯在英格兰腹地东挡西杀，纵横驰骋的时候，有消息说，“苏格兰军已经南下。”

境内叛乱刚平，外军的入侵又到。11月8日，正当克伦威尔围攻潘布洛克时，苏格兰军在汉米尔顿的带领下，一万多人越过边界，进入英格兰。同时，另一名苏格兰将领门罗也正带领三千多苏格兰兵从爱尔兰越海前来与汉米尔顿会合。

守卫约克的兰伯将军，人数不到五千，无力抵抗，正在后退。

苏格兰入侵的消息震动了整个英格兰，好像没有什么方法来抵御这次入侵了。费尔法克斯还在科尔彻斯特城外，克伦威尔还在潘布洛克城外，骚乱尚未完全平定，起事者的战火随时都有可能复燃。

人们一提起苏格兰人都骂不绝口，要知道，今日他们假装着要拯救国王，就是他们新近出卖过的国王。因此，他们要求，首先该把这些贪婪撒谎成性的外国人逐驱出境，然后再谈其他。于是议会立刻开会。

而克伦威尔既不等待命令，也不等待许可。一个月前他就已得知苏格兰军队的详情和行动，这些也许是阿盖尔亲自告诉他的。因此他曾送信给兰伯将军，叫他一看到苏格兰军队就立即后退，以免同他们开仗，而他则立即前去支援。

事情果然如此。就在攻下潘布洛克两天后，克伦威尔就出发了，带着五六千人，衣履不整，但斗志昂扬。

这些士兵信任他们的领袖，藐视他们的仇敌，热切地投入战斗，满怀胜利的信心。

克伦威尔写信给德比佳所的委员会说："为了我走乏的士兵，请你们立送军鞋来，他们还要走很远的路程呢！"他几乎走遍了整个英格兰，最先是从西往东，随即从南往北，行军快速，是前所未有过的。他的军队一路上受到了英格兰各地的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就在他出发后13

天，7 月 27 日，他所派遣的先行骑兵已经和兰伯将军的骑兵会合了，而 8 月 7 日，克伦威尔的大队人马也在约克郡的内尔兹巴勒与兰伯会合。真是兵贵神速。

而在此期间，苏格兰军沿西方大道前进，走过坎伯兰、威斯特摩与兰开夏。他们都是游移不定地一停就是许多天，队伍分布在长达 15 或 20 英里的战线上。军中也因宗教、政治和军事上意见分歧而闹得乱哄哄的，而且对对方军队行动一无所知。

这天，忽然有消息报告给汉米尔顿说克伦威尔快到了，并从种种迹象看来，克伦威尔有在此一决死战的意图。公爵答道："这不可能，就是飞也飞不到这里，如果克伦威尔离此不远，人数一定很少。他会小心翼翼，不敢攻打我们。"

不久，8 月 17 日，另有消息传来说保王党军官兰代尔的骑兵已经同克伦威尔交锋，兰代尔答应坚持下去，他的地势很好，士气也很振奋，只需 1000 援兵，他就会有时间集中起来击溃敌军。

汉米尔顿应允了援兵，兰代尔支持了 4 个小时，克伦威尔遇到了顽强拼命的抵抗，但苏格

兰人的援军未到，这个英勇的保王党只好退败。

克伦威尔任由他逃走，而率兵直扑苏格兰军队。此时，苏格兰军正匆匆抢渡里布尔河，以便使克伦威尔的进攻受阻。大多数的队伍已经过了河，只余下两团步兵，汉米尔顿自己及几营马队，仍在右岸掩护退却。

克伦威尔飞速赶到，击溃了他们，并几乎与苏格兰军同时渡河，然后，命他的军队作短暂的休息，翌日晨（8月18日）继续追逐敌军。敌军仍然向南行，一面逃去，一面作入侵的举动。同日，克伦威尔在离普雷斯顿十五英里的威根赶上了他们，把苏格兰后军切成几段。

8月19日，又开始穷追敌军，而且比以前走得更快。

苏格兰军被穷追生恨，在沃林顿附近，突然驳马回头，与英格兰军面面相对，于是两军开战。一番苦战后，英格兰夺得了山隘，占领了默西河上一座桥，苏格兰军中一片喧哗与惊恐，由于缺少军火，不能抵抗，有一部分投降，而汉米尔顿则带着一部分残兵向彻斯郡逃去。

就这样，克伦威尔击溃了苏格兰人的入侵，两星期后，英格兰境内已无苏格兰人的踪迹。

但是在伦敦，各派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中，不但不互相让步，却往往变得更有劲头向对方进行更沉重的打击。长老派一见到克伦威尔攻打苏格兰人，他们就清楚地感觉到克伦威尔一旦胜利，他们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只有克伦威尔倒台，或者立即讲和，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

于是长老派的先生们立刻使出浑身解数，来达到这一双重目的：打倒克伦威尔，争取立刻讲和。

这时，便有人开始“揭发”克伦威尔，说他狂妄而有野心，藐视议会法律等等。但是，谁也不敢接受这样的条件。独立派听到此事，立即激烈地谴责反对他们的将军的所有企图。他们痛斥这样地攻击一个不在场的人是卑劣，是怯懦，而这个人此时正在为拯救本国而出生入死地战斗着。

长老派十分惊恐，他们也害怕这样攻击克伦威尔会招来人民的怨恨。因此便不采用直接手段攻击克伦威尔，而想尽一切办法要同国王议和，这样，只要国王同意条件，那么就再也没有克伦威尔的立足之地了。

7月29日，议会投票同意与国王重开谈判。

8月2日，派出3个委员带着正式的提议往见国王。

独立派清楚地知道，如果谈判议和会意味着什么，勒德洛直接前往仍然驻在科尔切斯特城外的大本营的费尔法克斯那里说："他们阴谋出卖人们流了许多鲜血才换来的事业。他们在不惜任何代价求得议和。国王已经成了俘虏，主张和谈的人并不在于国王履不履行条约，而是要利用国王的名义和权威来破坏军队，这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军队既得了权力，就必须运用权力以阻止自身和本国的灭亡。"费尔法克斯同意他的话，并准备在必要时伸张正义。

勒德洛又去见爱尔顿，爱尔顿则说："时机还未到，我们必须让他们议下去，一直到危机明朗化为止。"

而长老派所支持的谈判到底怎样了呢？

9月13日，有15个委员前往怀特岛，5个贵族，10位下议员，他们是来同国王讲和的。这项谈判持续了40天之久，国王很热心地接受谈判，他答应这40天内及其后20天中，他决不作逃走的尝试。议会的人力劝国王不要多事讨论，应当立刻接受议会的条件，若不赶在军队和克

伦威尔到达伦敦之前签订和约，国王立即回到伦敦，那就非全盘失败不可。查理好象相信他们的建议是真诚可靠的，并倾向于听从他们的话，但他心底处却怀抱着与此绝然相反的另一个希望：在过去六个月中躲在巴黎的奥蒙德快要在爱尔兰重新出现了，他带着法兰西宫廷供给他的军饷和军火。他一到爱尔兰便将会同英奇昆勋爵和天主教徒订立和约，设法力战国会，以便国王逃走时可以立刻拥有一个王国和军队。

威廉·霍普金斯爵士奉命安排国王逃走事宜，所以国王写了信给他："这次新的和平谈判，同前几次的议和一样，不过又是一次嘲弄他们罢了，我的计划不变。"

9月18日正式开议。国王坐在华盖之下，在大厅的上端，他的头发已经变灰白了，他的骄傲的眼光和他习于哀怨的神色交织在一起，他的姿态，他的声音，他的眉目，无处不露出一种骄傲而受万分委屈的神态，他既无力抗拒命运，又不肯向命运低头，虽威严而无权力，虽专断而无希望，二者构成一种动人心弦而独特的混合物撞击着在场的每一个。

国王1个人同15个委员讨论，不时走入隔

壁一间屋子，问计于他的谋臣策士。于是宣读了议会的提议，大体同以前一样，查理听后，很和蔼地同他们讨论，态度安祥，有问必答。议员们反对，他也不恼，总之，他的主意坚定，态度温和，以及他对国情和法律的谙熟都令对手为之惊谔。

有一天两位议员私下对话：

"国王有了不起的进步！"

"不对，现在的国王还是同以前的国王一样，不过是阁下看到这一点太晚了！"

国王同意了议会关于海陆军统率权、关于大臣任命、关于爱尔兰的要求。甚至连这次因抗拒国王而酿成的内乱也承认合法的。但查理还是不肯痛痛快快地毫不迟疑地放弃他的其他权力。用查理自己的话说就是："喜剧里演人们打架，打了三拳头，打的全是我！"这算是打架吗？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狡计和沉默，每天都给对手以新的理由。

然而就在他庄严地允许停止在爱尔兰的一切敌对行动后，却偷偷地写信给奥蒙德："此后不必听我的命令，只要听王后的命令，……你不必去理会我为爱尔兰而应允的种种让步，这许

多让步是不起作用的。”

他答应把陆军兵权移交给议会20年的那天，他却写信给威廉·霍普金斯：“我老实告诉你，我今早所作的巨大让步只是意在帮助我能容易地逃走，若不是存了那个希望，我是万万不肯作这个让步的。如果我拒绝让步，那么我只能回到我的牢房，心情却是不太难过；但是我现在作了让步，我承认作这件事是很伤我心的。因为我做了只有逃走才能使自己原谅的事。”

议会虽然没有得到准确消息，但是也十分疑心国王所作的一切并无诚意。终于有一天，11月24日，国王郑重地宣称，他再也不能让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守到我把这里的某一块石头作我的墓碑为止。”谈判既无进展，又无效果，实际上毫无用处，仅仅显示两方的执拗和对对方的无能为力而已。

就在长老派同国王拉锯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11月20日，议长告诉下院说，有几个军官在议会门前，递上了一份公文。

这是一篇很长的抗议书，它逐条列出了各种弊端及英格兰的诸多恐怖，认为这都是议会萎靡不振所致。又责备议会中没有公共利益、责

备它同国王议和。

抗议书请议会郑重地将国王交付审判，宣告人民的统治权，颁布命令，宣告从此以后，国王应由人民代表选举。它要求现在的议会结束，筹备平均分配选举权，以备将来的议会按时开会，顺从人民的愿望，从事各项政举。

抗议书最后申明：同胞们所派的代表及公仆若因溺职或怯懦不前，以致陷国家于危险，那么我们军队只好起来自己救国了！

下院听完这篇抗议后，掀起轩然大波。独立派人士大声要求由下院恭谢军队上这样坦白与勇敢的建议。而长老派则十分愤恨，把抗议搁在一起，并不予回答，以示议会的不悦。

但很快，兴奋与混乱同时到达顶点。因为人们听说克伦威尔已经快要回来了，军队已经宣布向伦敦进军了。

11 月 29 日黄昏时分，一个化了装的人对国王的手下说道："军队刚才在本岛登岸，你赶快去告诉国王，今晚有人要把他带走。"说完，这个人就转身骑马消失在黄昏的暮霭中。

查理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将身边的亲信和谋臣找来，问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爱德华·库

克上校自愿出去环岛——为国王察看一下动静。

当天晚上，天色黑暗，下着大雨，库克骑马发现卡里斯布鲁克堡已经加强了防守，新来了10个或12个军官，几乎公开地监视着守堡官包尔曼。那里有一种近乎神秘的慌乱景象。他赶快回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国王。快到半夜，当他回到国王住处的时候，发现国王所住的房子已经被卫兵包围，房子里、窗子下，国王的卧室门口，都有士兵把守。

现在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近臣们力劝国王冒险逃走，但对于胆小而不好动的查理来说这样的计策是听不进去的。他还沉醉在他自己的幻想之中："他们不是真的抓我去，那么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得保全我的性命，因为无论哪一派，若不和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是不能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库克说他有口令，而且已准备好了一条船，但查理却说："库克，你先去睡吧，我也要尽可能多休息一下。"库克说："我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查理懒洋洋地说："按上帝的意旨吧！"这时已是一点钟，臣仆们都退了出去，查理上床睡了。

天破晓的时候，有人敲门，还未等国王下床，以科贝特中校为首的几个军官冲进屋来。科贝特说道，“先生，我们奉命将你迁到别处。”国王问：“谁的命令？”“军队的命令。”“将我迁到哪儿？”“送往堡垒。”“哪个堡垒？”“送往堡垒。”“到底哪个堡垒？”“赫斯特堡。”科贝尔与其他来人商量后告诉国王。“这是最不好的堡垒。”国王悻悻地说。

3个小时后，查理被禁在赫斯特堡里面，与外界不通信息。他被关在一间很黑的屋子里，中午还需要点火把！

“你们凭什么这样做？”“凭军刀所赐与的权力”

长老派人士一听见这个消息，气得哇哇大叫：“当国王住在纽波特的时候，本院曾担保对他以礼相待，保证安全和自由，他们若是不赶快停止这种无理的叛乱，他们就是丢尽了脸面，必将完蛋！”于是立即召开大会，讨论国王被带走一事。下院的辩论从早晨9点开始进行到午夜，仍互吵不休，直到第二天早上，一连持续了24

个钟头，仍有244个议员坐着。最后进行投票，140票对104票，议决以国王的答复件为议和的充分基础。

权力正在从独立派中滑掉，在这最危急的时刻，独立派和军队该怎么办？

12月5日傍晚，一间密室中，桌上放了一张下议员的名单，逐个考查每个代表的行为及原则主张，彼此互相交换情报，决定着明天行动的步骤。

12月6日早上6点，军队奉爱尔顿将军之命开始行动。守卫议会的民团被撤去了。二团士兵占据了宫院，威斯敏斯特大厅、楼梯、走廊及与议会相通的甬道。

普赖德军官站在下议院门口，手托一张已被制裁的议员的名单，当议员走到门口时，便有人指给他看，于是普赖德便对那个议员说："不许你进去"。其中最受怀疑的人，就命人加以拘捕带走。

议院周围一片混乱。被排斥的议员试图从各个入口入院，均被士兵挡回。就这样拘捕了41人，关在两间相连的房间里。其他的只逐出，未拘捕。

被挡驾的议员纷纷责问："你们凭什么这样做。"

一个叫休·彼得的军官答道"凭军刀所赐予的权力。"

第二天，又有40多人被阻于议会之外。几天之内共有143名议员被剥夺议员资格，这样独立派便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些被捕的议员在几个小时后就被释放了，但他们以后再也难有机会走入威斯敏斯特大厅。12月11日，一份公文送到费尔法克斯手中，称为新人民公约，这是一篇共和制的计划，是由爱尔顿制定的，请将军开一个军官大会，讨论这件事，以便由军官们交给议会。而其中第一条就是：废除王政。

1648年12月17日夜半时分，放吊桥的声音惊醒了查理，接着，他听见一队骑兵跑进堡垒，过了几分钟，一切又都恢复了寂静。

第二天早上，他问臣仆赫伯特："你听到半夜的声响了么?"赫伯特说："我听见放下吊桥的声音，但我没走出去看!""你去打听是什么事。"国王说。

一会赫伯特回来了，"哈里森上校来了。"

"你知道的确是哈里森么?"国王面现惊慌

之色，因为他曾听人说哈里森曾要暗杀他。

“我竭力设法了解他是为了什么事而来的，得到的唯一答复却是不久就可以知道他是为什么事而来的了。”赫伯特无精打采地说。

第二天，赫伯特又去打听，这次打听到哈里森少校此来是为护送国王前往温泽宫，三天之内就要起程。他赶快回来告诉国王。查理两眼露出快乐的神色，答道：“很好！很好！他们终于变得不象从前那样执拗了，我一向喜欢温泽。这就可以补偿我在这里受的苦了。”

果然，两天之后，科贝特中校走来告诉查理说，他奉命立刻送他往温泽。哈里森已经先到那里去了，查理毫不反对，于是很快起程。

行进途中，查理要求在巴格肖特停留，在纽伯格勋爵府里，并在森林中进餐。这个勋爵是一个最忠于他的保王党，本来距温泽只有半天的路程，但军队并没有拒绝。相反，国王那急不可待的态度，多少引起了人们的疑心。

原来，纽伯格勋爵善于养马，他有一匹特别的驰名全国的最快的马，他原来已通信给国王，劝他把所骑的马弄坏了腿，而换上自己的快马，在国王个人所熟悉的森林小路逃走，护卫的士

兵是根本追不上他的。

所以在前往巴格肖特的路上，他总抱怨马不好，说要换马。但是，不幸的是到了纽伯格那里却看见他所依仗的那匹快马在马房里被踢，受了重伤。根本不能完成“任务”。纽伯格很着急，就请国王换别的好马。但纵有快马，尝试逃脱仍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卫兵们不离国王左右，每人手上都拿了一支已打开枪机的手枪，因此，查理很快就放弃了冒这样大险的主意，傍晚到了温泽。

他很高兴地重新进入他自己的宫殿，住在他的一所寝殿里，发现诸臣都已准备好欢迎他，差不多同他先前来这里游玩时一样。他高兴地住了下来。他虽然已料到事情可能不妙，但绝没想到离死已经不远。

克伦威尔:“我们要把戴着王冠的头颅割下来!”

同日，12 月 23 日，下议院票议决要提查理前来受审，并指派一个委员会撰写一篇起诉文字弹劾他。因使国王受审而缺乏可以定他罪行

的法律，就先投票议决一条原则，确定国王兴兵打议会即是犯了叛逆大罪。随即由斯科特提出议案，定了一条法令，特设一个高等审判庭，审判国王。有150名委员组织成这个特别法庭，其中包括6个勋爵，3个高等法官，11个准男爵，6个伦敦市参议员、全数重要军人和下院议员们。

但是，当呈文提到贵族院，却遭到一致反对，一个贵族顽固地说："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因此绝不可能对议会犯叛逆罪。"

下院翌日接到上院的信息，但立刻投票表决，说上院反对构成障碍，因为上帝之下，人民就是全部立法来源，所以人民所选举代表人民的英格兰的众议员拥有主权。1月6日又重新订定了一条法令，高等法院立刻着手准备工作。

1月8日至19日连续举行会议，主席是布雷德肖，是个有名的律师，为人严肃而温和。但当时的舆论很不一致，在法庭内部就有严重的分歧，致使只有58个委员参加了预备会。

许多人，其中以费尔法克斯为首，认为这时候问题已经解决，对国王是否以贫穷处理。

但克伦威尔异常坚决，他清楚地看到，对国

王的审判势在必行，不能给其以丝毫的喘息，否则所做的一切努力将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因此他大声疾呼“没有人会动一动，我告诉你们，我们将要把戴着王冠的头颅割下来。”

于是决定1月20日指令国王出席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法庭，而下议员们也已经派一个委员会去清理各宫殿、堡垒及国王的行宫，把所有的家具等开列准确的清单，并从此以后变作议会的财产。

温泽行宫。镇守官怀特告诉查理，再过几天将迁他去伦敦。“上帝的智慧、权力和至善，都是无所不在的。”他尽管口上这样说，心里还是很不安：在最近这三个星期中，他已经很少听到议会的消息了，他也曾听到传言，说爱尔兰已经答应迅速前来救他，他便以此自慰，也因此还常常这样说：“英格兰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恢复太平，不然的话，我将从爱尔兰、丹麦以及别的王国得到恢复我的权利的手段。”“我还有三张牌可以打，即使是其中最不好的那一张，也可以使我所损失的东西全部物归原主。”

1月19日，星期五，哈里森奉命率骑兵队来到温泽宫迁走国王。一部六匹马拉的大马车

在院子里等候，查理上了车，几个小时后便回到了他一别八年的伦敦，回到圣詹姆士宫，四周有卫兵防守，他的寝宫门外有两个守兵，负责国王的“安全”。

1月20日，中午时分，在绘画客厅内，高等法庭的委员们正在安排他们任务的最后细节。有人来报：国王已经来到了。克伦威尔立在窗前，神色庄重地说：诸位，他来了。我们现在要做全国人都将心满意足的一件伟大的工作，所以我请诸位先考虑一下，他一见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一定问我们根据什么审判他，我们该如何回答?”亨利·马丁立刻说：“以下院和议会的联合名义，以英国的全体善良人民的名义。”

于是法庭全体法官庄严地排好次序向威斯敏斯特的大厅走去，为首的是主席布雷德肖。士兵拿着剑及权杖前导，其后是16名执戟官，主席坐在大红天鹅绒的交椅上，下一层是议会的书记。法庭的法官们分坐左右两排大红呢绒铺垫的座上，一切就绪。

于是大开院门，群众蜂涌而入，恢复肃静之后，宣读了特别法庭的授权法令，接着点名，有69个法官出庭，这时布雷德肖说道：“警卫官，

带囚犯上堂！"

国王上堂，有1个上校及33个军官护卫着他。堂下预备好一把大红天鹅绒交椅。他走向前，步伐坚定，严肃地长时间地看着法官席，没有脱帽就坐在椅子上，全场悄然无声。

布雷德肖站起来说："查理·斯图亚特，英格兰的国王，英格兰的下议员们在此议会聚集，鉴于国内血漫大地，你实在是罪魁祸首，因此议决审判你，成立这个特别法庭，检察长将宣读议会控告你的罪状。"

检察长库克站起来说话，这时，查理用他的手杖碰碰库克的肩膀说："你不应说话。"库克转身看看国王，只是笑了笑。

不知怎的，国王的手杖的头忽然落了下来，他的仆人离他较远，他只好弯腰自己捡起来，重新坐好。库克宣读控诉书，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国王，苛政、战争，都要求他逐款答复，并最后要求将他当作暴君、叛逆以及杀人凶手定罪。

查理坐着听，很安静地四面看看，有时看法官们，有时看群众，带着好奇而满不在乎的神气。当他听见检察长说："查理·斯图亚特是个暴君、叛逆、杀人凶手"时，只是微笑，并未说

话。

库克讲完后，布雷德肖对国王说：“你已经听见控诉词了，本庭等待你的答话。”

国王昂起头，靠在椅背上：“我要知道你们凭什么理由传我到这里来，我说的是合法权威，我要先了解这一点，才好答复。”

“法庭是以国人的名义，传你来，要你答复，是国人选你当国王的。”

“先生，我承认这一层。”国王答道。

“你若不承认本法庭的审判权，我必须使你明白，本法庭驳回你的否认。你必须辩诉，否则，你认罪处理。”布雷德肖坚定地说。

国王换了个坐姿：“我告诉你，英格兰从来不是一个选举制的王国。国王是世袭的，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我愿拥护下院的公平权利，但是我没有看到这里有贵族。必须有两院的人员才能构成议会，但是贵族在哪里呢？这就是你们所称的国人的名义么？”

“先生，本法庭等候你一句肯定的答复。我们的权威何在已经告诉你了，你以为这不够，但我们却以为是足够了。我们清楚我们的权威是建立在上帝和王国的基础之上的权威。”布雷德

肖义正辞严。

“权威从哪里来，那既不是你的意见，也不是我的意见所能决定的……”查理试图抵赖。

“法庭已经听见你说的话了，将来就按照法官们的命令处理你。把犯人带走，法庭休庭，下星期一再开庭。”布雷德肖没给查理以狡辩的机会。

法官们退庭。

查理站了起来，看到了放在桌上的那把剑，他用手杖指着那把剑说：“我并不怕这件东西。”

围观的群众喊着：“秉公审判！秉公审判！”纷纷离去。但其中也有人喊：“上帝拯救国王陛下。”

星期一开庭，有62法官出席，双方又同前一次一样。讨论权威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布雷德肖说：“无论是你，也无论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准辩驳本庭的审判权。他们是国家以及在议会聚集的下议员们授权坐在这里审讯的。你的祖先们一向必须，你现在也必须作出说明，对议会服从。”

国王道：“请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布雷德肖怒气上升：“先生，我们不是为了

答复你的问题而坐在这里的。请你对控诉内容作出辩护。”

国王仍不屈服：“你的审判权是不讲道理的……”

“先生，我们已经列举了你的罪状，英格兰的下议员们是会给你公道的。警卫们，把犯人带下去。”

查理转过身，边走边对群众说：“请你们记住，英格兰的国王受苦难了。他们不许国王为人民的自由而说出他的理由！”

于是有人喊：“上帝拯救国王。”旧军官们及士兵却高喊：“执行法律，杀头。”

第三次审判是在1月23日，情景还是同过去一样。但全国及欧洲大陆都在关注着这场审判，若是久悬而不决，那就会越拖越棘手，越不利于议会。

因此，议会开始收集了33个证人的证词，并决定在再提国王受审时，只要他到法庭来，就当庭宣判。25日投票议决：判定国王以暴君、叛逆、杀人凶犯、国家敌人的罪名。斯科特、马丁、哈里森等人负责撰写判决书。26日62个法官闭门聚会，略加讨论之后，议定了判决书的形式，

并决定明日开庭宣布判决。

27 日中午，开庭。在场法官 67 人。

国王坐下之前，对布雷德肖说："先生，我要求说一句话，我希望你不要打断我。"

布雷德肖说："轮到你说话时你再回答，你得先听法庭的。"

"先生，我求你让我说话，我只说一句话，一篇仓促决定的发言……"国王说。

"先生，你必须先听法庭说话，到了适合的时候，就让你说话。"布雷德肖说。

"可先生，我要求……我要说的话与我认为法庭即将公布的话有关；而且，先生，一个鲁莽的判决是不容易追回的。"查理似乎预感到不祥。

"先生，在判决之前会给你说话的，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讲话。"

国王脸上似乎露出一丝安恬，便坐了下来。

布雷德肖开始郑重地对造成弊政和内乱的直接责任者查理的累累罪行进行控诉。布雷德肖所讲的话严厉、辛辣、严肃却又符合基督教旨，不带侮辱意味，显然是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

国王也一样严肃，但显然露出极度的不安，他再也不能从容镇定了。布雷德肖刚一讲完，国王就试图说话，但布雷德肖加以反对，命书记员读判决书。读完之后，他说道："现在所宣读的及公布的判决书就是整个法庭的判决。"于是全体出庭法官一齐起立，表示同意。

国王象是遭到了突然的重大打击似的，当他再度提出要求，却远没有从前那样自负了。

"先生，你肯听我说句话么？"

"宣判之后，不能让你说话了。"布雷德肖说。

"不能么，先生？"国王迟疑地问。

"不能。卫兵们，把犯人带下堂。"布雷德肖下令。

"先生，只要你许可，宣判后我是可以说话的。请你许可。"国王哀求……

"住口！"布雷德肖喝道。

"先生，判决，我说先生，我要……"这时候许多卫兵围住他，把他从犯人席上带出大厅门口。人们还是喊着："执法，杀头！"

但也仍有人喊："上帝拯救陛下！"查理终于没有机会进行他的最后陈述。

白厅。国王的卧室。查理已经恢复了他素常的平静，对贴身臣仆赫伯特说："我的时间不多了，除了我自己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见，请他们不要见怪。"

他要求见他的较幼小的儿女伊丽莎白公主和他的第三个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他们一向是由议会照管的。

他请伦敦主教贾克森来，但只同主教谈敬事上帝的事："不久我就要在上帝面前汇报我在人间的帐了，我希望我能以安宁的心做这件事，要你帮我。"

1月29日，早祷过后，国王拿出一个盒子，内装圣乔治和嘉德十字大勋章，都是破旧的了。他对贾克森说："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权力给这两样东西与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被带进屋，12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一看见父亲就哭了起来，8岁的小公爵看到姐姐也跟着哭了起来。查理把他们抱在膝上，把珍宝分给他们两人，安慰他的女儿，教他怎样读书，以坚定自己反对天主教士的决心。吩咐她告诉她的兄弟们，说他已经赦免了他的仇敌们。并让她告诉她母亲，说他永远和她在一起：从新婚起

直到最后一天，他爱她如同新婚一般。

然后，转面对小公爵说："我亲爱的心肝，他们不久就要杀你父亲的头了。"小公爵定睛焦急地看着他，"孩子，你要牢记我所说的话，他们要杀我的头，也许要立你做国王，但你要记住，只要有你哥哥查尔斯及詹姆斯在，你千万别做国王。但是他们要捉到你的两个哥哥，他们一定杀他们两个人的头的。最后他们也可能会杀你。所以我叫你不要让他们立你为王。"

小公爵动情地说："我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让他们立我做国王。"

查理动情地吻他，把他放下来，又吻了吻他的女儿，为他们两人祝福，祈求上帝赐福与他们姐弟二人。

随即忽然直起身来，对贾克森说："带他们出去吧！"孩子们立刻放声痛哭，查理站在那里，头紧靠着窗子，尽力止住眼泪。

房门一开，孩子们不得不出去了。查理又从窗子那边跑了过来，再度把他们抱了起来，吻着他们的小脸，为他们祝福。两个孩子搂住他的脖子不放，他终于挣脱他们的小手，跪在地上，与主教一同祷告……

查理并不是个怕死的人，他死得象个君主，至少是象个君主那样去死的。

同一天早上，高等法庭开会，定于1月30日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之间行刑。

现在到了必须在这个关系生死的命令上签字的时候了。很多委员由于缺乏勇气而借故躲开。而克伦威尔自己则是和平时一样地高高兴兴，敢作敢为。他签过字之后，用墨水涂坐在他身旁的亨利·马丁的脸，马丁立刻回敬，于是克伦威尔的脸也成了花蝴蝶。最后仍有19人签字，虽然有的签名因信心不足而笔画散乱。

行刑的命令下给哈克上校、亨克斯上校和费尔中尉，命这3人监督行刑。

第二天一早，爱尔顿和哈里森还未起床，克伦威尔、哈克亨克斯、阿克斯特尔及费尔等就已在床边会商，起草最后一个命令：命刽子手行刑的命令。

克伦威尔对亨克斯说："上校，应该是你写这道命令，写完就签字，"亨克斯不知何故固执地拒绝。阿克斯特尔说："亨克斯上校，我替你

难为情，这条船现在正在进港，在未下锚之前，难道你就要收篷吗?”克伦威尔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坐了下来，写了命令交与哈克上校，上校顺手就在上面签了字。

与此同时，在熟睡四个小时之后，查理起了床，他对赫伯特说：今天我有一件大事要做，我必须马上起来。”于是他就在梳妆台那儿坐下，赫伯特替他梳头，不象从前那样自如。“我的头发不会披在我肩上太久了，”查理说：“你得和往常一样，好好给我梳头。要把我修理得越整洁越好。他起来穿衣服，叫人替他比平时多穿一身衬衫，说：“天气很冷，会冷到使我发抖，人们也许会误认为我害怕，我不愿人有这种误会，我不怕死，死对于我现在并不可怕。感谢我的上帝，我已经准备好了。”

快到10点钟，就有人敲门，很轻，赫伯特没有动，便听到第二次敲门，敲得稍响一些，却还是敲得斯文。

查理说：“去看是谁敲门。”原来是哈克上校。查理说：“让他进来。”

“先生，往白厅去的时间到了，你到了那里还有时间休息。”上校说。

白厅里已经排到好几营步兵，成双行立在他所走的路的两旁。一小队执戟的兵在前面走过，旗帜飘扬，敲着罗鼓，鼓声很响，噪音中听不见人声。

在国王的右边是主教，左边是免冠的汤林森上校，他是卫队的统领。查理在路上同他谈自己的丧事及他意欲委托谁为他办理丧事。查理神态安详，两目炯炯放光，步履坚实，十分从容。

到了白厅，他脚步轻轻地登上台阶，经过长廊，走入他的寝宫。只有他同主教在里面，主教准备行圣餐礼。国王跪下，从主教手上领受了圣餐，随即愉快地站了起来。已经给他预备了午餐，可他不肯吃。

贾克森说："陛下久已没有进食了，天气寒冷，也许到了台上，您会晕倒。"查理说道："你说得不错。"于是吃了一片面包，饮了一杯葡萄酒。

现在已经是1点钟了。哈克敲了敲门，贾尔森和赫伯特跪下，查理说："我的朋友，起来。"于是吩咐开门，对哈克说："你先走，我跟着你。"

查理穿过宴会厅向前走，两旁仍是双层的卫兵，有许多群众站在卫队后面，一动不动盯着

查理。国王走过时，他们为他祈祷。在大厅的尽头，墙上开了一个口子，从那里走出去，就是断头台，刑具都用黑布盖着。有两个膀大腰圆身着水手装的人，带着面具，站在刑具旁边。

查理从那个口子走出来，他的头挺得直直的，四边看看，想对人民说说话，但到处都塞满了军人，无人能够走近。于是他便掉过头对贾克森和汤林森说："我的话不能有许多人听见，所以我只对你们说几句。"于是他进行了一篇很短的讲话，讲得很安详，而且很冷静。讲话的唯一主旨就是表明他的行动是正确的，人民不幸的真正原因是藐视国王的权利，人民不该享有参预政治之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恢复和平和自由。

就在这时，有人无意碰了一下斧子，他匆匆转身说："不要弄坏了这把斧子，若是弄坏了，会使我多受痛苦。"当他快讲完的时候，又有人走近那把斧子，他声音颤抖地嘟嚷着："小心那把斧子！小心那把斧子！"接着便寂然无声了。

他戴着一顶丝绸小帽，便请主教把他的头发塞进帽子里，脱下王袍，把它交给贾克森，脱去上装，又穿上王袍，看看那架杀头的砧板，

"把砧板放牢了。"他对刽子手说。"放牢了，先生。"刽子手答道。"我要做简短的祈祷，当我伸出两手的时候，你就……"。

他站在那里默想了一会，嘴里喃喃自语，举眼望天，然后跪下，把头放在砧板上。刽子手摸摸他的头发，再往他的小帽里塞进一些。国王以为他就要砍下来，便说："等我的信号再下手。"刽子手说："随您尊便，我愿等着。"

不到一分钟，查理伸出两手，刽子手手起斧落，一斧就把国王的头颅砍了下来，刽子手高举起查理的头，给群众看："这是一个叛国者的头。"围观的人们长叹了一声，声音深而且长……

两队骑兵分路向前，驱散了群众，断头台已经挪走了，尸身也挪走了。克伦威尔便要看看尸身，已经放在棺里，还未上盖。他集中注意力看着，还举举那颗首级，好象在证实是否已经身首分离。"这是一个很结实的身躯，原有长命的希望的。"

灵柩摆在白厅七天，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去看。2月6日下院命将灵柩交与赫伯特及迈尔德梅，允许将它安葬于温泽堡，葬在亨利八世所葬

的圣乔治教堂里。出殡的仪式上没有什么排场，六匹披了黑衣的马拖着灵车，四部马车跟着，戴着国王最后的几个仆人。2月8日，里奇蒙公爵、哈特福德侯爵、南安普顿伯爵等以及贾克森主教，得了下议院的许可，到温泽协助丧事。国会批准五百镑丧葬费。在棺上刻着这几个字：

君主查理

1648年

（此按旧历，1648年1月30日相当于公历1649年2月9日）

就在处死国王之前，2月6日下议院在讨论许久之后，投票表决，反对的29票，赞成的44票，郑重宣布废除了上议院。

翌日，2月11日，通过一道命令，说："本院根据经验，认为本国不需要有一个国王的职位，而且觉得有这样的国王，就完全成为负担，而且有害于本国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公益，因此特宣布废除国王制度，另铸一个国玺，正面刻着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图，附两国国徽；反面刻着正在开议的下议院的印文，文曰：

上帝赐福恢复的第一个自由年：1648年。

第八章　共和国是什么

封建君主国及其君主从英格兰消失了，人们欢欣地重新加入了一个叫“共和国”的东西，但这是个怎样的共和国呢？鬼才知道！

面对刚刚成立的共和国，人们有许多好梦要做，可是克伦威尔却说：“你不制服他们，他们就要制服你。”

王政废除，上院取消，英格兰的一院制共和国的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但是斗争却远没有结束。

1649年2月17日，新创建的国务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前一时期审判国王，废除王政和取消上院的重大的政治行动时，41名成员中竟只有19人表示赞同；其余的都有不同程度

的分歧。事实上，新组建的政府中各阶层的利益纷争也是错综复杂的。处死国王之前联合是极其必要，但一旦风波过去，便各自打起小算盘。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舆论哗然。隐藏着的王党分子，失势的贵族及顽固的长老派分子，无不幸灾乐祸，暗自窃喜。

国务会议中的分歧愈演愈烈，激烈的争论过后，有人提出清洗这些持异端的人。但他们仍不肯退让，新生政体的权力机构眼看有分裂夭折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克伦威尔亲自出面，多方呼吁斡旋，协调各方利益，最后达成协议，持异议者作出保证：在未来，他们将忠于共和政体，为下院服务。

就在国务会议发生纷争的时候，英国出现了一本冒充查理日记的小册子叫《王政偶像书》。它节录了查理生前的一些思想及言谈，以期美化国王，唤起人心。小册子流传很广，给新生的共和国造成很大威胁。

针对这本小册子，英国杰出的诗人、共和思想的笃信者约汉·弥尔顿回敬了一本《偶像破坏者》的书。“英格兰的人民请听着，”他在书中写到，“在一个民族获得了这样顺利的解放之

后，在反对暴君时表现了如此刚毅和勇敢的精神之后，还要去寻找这样一个狂妄的国王，那无疑说明这伙人是如何地奴隶成性，下贱得象牲畜，他们不配享受大声疾呼的自由，只适宜于被领回到原来受奴役的地位中去。”要知道，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内战痛苦后，冲破了保王势力的种种阻挠，在英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废墟上，建起的共和国是何等不易。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的专政，但同封建君主制相比，到底是前进了一步，这一步虽然已经踏了出去，但却随时都有被逼收回的危险。同时，英格兰的人民又怎么想呢？他们送走了一个绝对权威——国王，却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毫不客气的家伙——军队。

“以前，下院没有上院的赞同，什么也不能通过；现在，他们没有军官集团的赞同，也不敢通过什么……”“以前，我们受一个国王、上院和下院的统治；现在，我们受一位将军、军事法庭和下院的统治……”平等派愤愤地提出：“请问，区别在哪里，在哪里？”共和政治是平等派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推翻了君主，建立共和国之后，将军、军官们成了新的显贵，《人民公约》没

有实现，选举权也未曾扩大，沉重的捐税有增无减，“残缺国会”专横武断，冷酷的现实激起了平等派新的斗争热情。

而此时，英格兰的新贵们正公然以“英格兰自由的保护者”自居，而丝毫不顾英国工商业的长期停滞，及为维持四万军队而强加给人民的新保税。他们忘记了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们所写的：“在共和国中，司法有度，不得以强凌弱，务使贫者安居乐业，让人人都有真正的信仰、人身和财产自由。”他们敌视人民的要求，原长老派对付人民的办法，现在轮到他们来用了，在他们看来，从今以后，人民只不过是“丧失理智、喧嚣、号泣的乌合之众”罢了。

正因为如此，平等派警觉起来。1649 年 2、3 月间，李尔本发表了《英格兰的新枷锁》，“他们把人民贬得一文不值，同时又深知人民是一切真实权力的唯一来源，因而对他们谄媚逢迎。”平等派看穿了共和国的本质和弊端：“你们是在指望从那些压迫你们的人那里得到轻松和自由吗？如果不是贵族和乡绅，谁又是你们的压迫者呢？现在想一想吧：难道不是你们把奴役者当作自己的解放者选出来的吗？……他们的特

权即你们的奴隶地位，他们的权力即你们的瘟役，他们的权利即你们的贫困，他们的意志即你们的法律。……"

"团结起来反对那些辜负了你们的信任并日夜都在力图奴役你们的人，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吧……要是你们不赶快利用时机，就该明白你们是在给自己的脖子铸造锁链，它将毁灭你们本身和你们子孙后代的生命、权利和财产。"

平等派的抨击和要求，是对独立派共和国的严重挑战，也是对军队高级将领的致命威胁。3月底，国会通过特别决议，宣布李尔本以小册子煽动破坏政府，犯有"叛国罪"。

李尔本被传唤到国务会议，在会议室前方停留时，隔门听到了克伦威尔的大声发言："我告诉你们，对付这些人，除了把他们砸个粉碎外，没有别的办法。让我对你们说实话吧，如果你不制服他们，他们就要制服你……从而使你们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费尽心力、处心积虑所做的工作全部落空。"

在过去，克伦威尔对平等派较为谨慎，也曾同意采纳《人民公约》。但那是一种权宜之计，目

的是为了安抚和争取他们同独立派一起来反对国王、王党和长老派。但这已经是过去。4月初，克伦威尔把李尔本及奥弗顿、沃尔温等人逮捕起来，并押在伦敦塔。

然而关押并不能"制服他们"。有一万人签名要求释放李尔本。要求人民和军队起来行动的传单，也开始在街头广泛流传，骚动和抗议也出现了。

早在1649年2月，克伦威尔就决定把军队调往爱尔兰，不愿去者必须退伍，借以分裂打击平等派，但是在华莱上校的兵团中出了一件差错。

4月24日，伦敦市布尔旅店门前聚集着奉命调离但抗命不从的一个大分队的士兵。他们从住在旅店的骑兵那里取来了平等派的标记——浅绿色缎带，佩带在身上。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闻讯赶来，立即逮捕了为首的十五个人，并交付审判。一名服役七年，颇有才华，深受人们爱戴的23岁的骑兵洛基叶，被判死刑。

第二天，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上，当着同伴们的面，在男女群众的哭泣声中，洛基叶遭到枪杀。临刑时他对在场的士兵说："但愿我的死不

至于吓倒你们，而是恰恰相反，希望它能鼓励你们，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视死如归。”

他的尸体陈列在伦敦东区，受到了人们的瞻仰。4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自由殉难者”洛基叶的出殡仪式，变成了平等派拥护者的政治示威。首都有近万人参加了送葬，人们都带着平等派的标记——浅绿色的缎带。

“大约有1000人，5～6人一排，走在灵柩前面。人们抬着死者的遗体，在六个号手吹奏的士兵出殡曲中行进；后面牵着全身用黑布覆盖的死者的战马。灵柩装饰着一半染成血红色的迷迭香花环。死者的剑平放在灵柩上面。数千人整队跟在后面。所有人的帽子上都系着绿带或黑带。妇女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末尾。”

除了这些步行穿过市区的送葬者外，还有一大批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上与送葬的行列会合，参加了葬仪。这不是一般的送葬，而是对国会的抗议，对军队中独立派显贵的示威，对平等的支持。

事实上，克伦威尔严厉的军法威胁，并没有能够止住广大平等派士兵捍卫他们事业的决心。5月份很快又传来了国会军另外几个团队举

行起义的消息。起义的领导者叫威廉·汤姆逊，起义者要为死难的战友洛基叶报仇，他们要求全面实行《人民公约》，并扬言：谁如果对塔狱里的李尔本损伤一根毫毛，必将受到报应。

得到汤姆逊上尉起义的消息后，克伦威尔立刻亲率两个骑兵团和三个步兵团共约四千人的兵力，与费尔法克斯一起前往镇压。5 月 14 日晚，一阵急行军之后，克伦威尔的大部分追兵来到了叫贝尔福特的地方，对在那里宿营的 1500 名平等派士兵发起了偷袭。起义士兵由于力量分散，缺发统一的指挥，仓促应战，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放下了武器，400 人作了俘虏，其余的逃散了，唯有汤姆逊带着两百来名士兵冲破重围，策马北上，占领了诺桑普顿。

克伦威尔获悉汤姆逊逃脱后，立即派巴特勒少校带领精锐骑兵前往追击。巴特勒包围了诺桑普顿，发起攻击，俘虏了许多人。汤姆逊身受重伤，但仍冲杀出去，逃往附近的树林里。可是还是被巴特勒的士兵追上了。

面对追击者，汤姆逊毫无惧色，继续抵抗，他击毙了一名骑兵队长，杀伤了另一名追兵，但

自己也被两颗子弹打伤。当追兵再次逼近时，他三次奋起高呼："退缩就是可耻！"随后，在敌人的马枪的连射下，壮烈牺牲，时间是5月17日。

所有被俘的汤姆逊的部下，都被关押在贝尔福特教堂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讯。有三个下士坚贞不屈，拒绝改悔，被判处死刑。5月15日凌晨，他们在教堂的大墙下英勇就义。目击者这样写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丝毫不表示懊悔。他们在离墙远近适当的地方停了下来，叫行刑的士兵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士兵举枪齐射时，他们安详地瞧着枪口。"卡莱尔为之悲悼说："就这样，平等派的下士们死去了，他们是坚强的，为了英格兰的自由权利，决心追随他们的同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兰开夏、德比郡、索默塞特等地及稍后在牛津驻军中的平等派起义及风潮，都被同样无情地镇压下去了。所有的英国上层人士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已经摆脱了危险。议会宣布给克伦威尔以"公开嘉奖"，以褒扬其"卫国之功"。牛津大学也赶忙选他为自己的名誉教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6月7日，一直对"弑君者"仇恨无比的伦敦商业区的大亨们，今天则为克伦威

尔的行为所感动，大排筵宴，表示敬意，并将许多金银器皿等珍贵礼物赠给了他。

至此克伦威尔的权势确立起来了，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已经完成，英国革命不再前进了。

克伦威尔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是出兵爱尔兰，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理由的屠杀。

军事上粉碎了平等派，给克伦威尔以行动自由，伦敦商业区对共和国，尤其是军队的恩赐明显地增加，现在可以认真地致力于爱尔兰问题了。要知道，那可是块富庶的宝地。

远征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既快又扎实。面临的是一场不是靠士兵的热忱，而是靠士兵对物质利益的关心的战争，一场在外国和敌国进行的战争。伦敦的大亨们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这次远征。他们怀着殖民掠夺的心计，集资筹款，4 月供给政府贷款 12 万镑，7 月又贷给 15 万镑。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这次远征的目的十分明确：其一，粉碎保王派颠覆共和政权的阴谋；其二，掠夺爱尔兰土地，使之变成自己发财

致富的殖民地。3月，国会任命克伦威尔为这次远征军总司令兼爱尔兰总督。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8月13日，他率领由130艘军舰、运输舰和商船組成的庞大船队，载着1.2万名士兵和大炮、弹药、粮食，扬帆渡海，直驶爱尔兰。15日，克伦威尔率军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附近登陆后，立即引兵北上，向沿海军事重镇德罗赫达前进。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血腥黑暗的时期。

9月3日，德罗赫达被围。9月11日，英军发起总攻。

在爱尔兰本土，已经没有巨大的、组织严密的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部队了。如今，抵抗克伦威尔大军的只有一些组织得很差，彼此孤立的兵团，他们各自固守据点，支撑一定的地区，因此根本不是克伦威尔的对手。

德罗赫达城下，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守城的爱尔兰军民与攻城的英军正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战斗。最后，英军破城而入，残余的守军退据在附近的教堂和山岗上。克伦威尔在要求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便下令：凡手持武器的抵抗者，格杀勿论。惨剧发生了。3000名

守城的爱尔兰官兵几乎战死殆尽。克伦威尔在给议会的报告中说:"我不准士兵宽恕城中任何武装人员。我估计,这天晚上,有不下两千人作了刀下之鬼。"

躲在圣彼得教堂钟楼的100人被活活烧死,而教堂里的大约1000人被就地杀害。许多躲在塔楼里的守军,"军官被砸碎头颅;十分之一士兵被杀死,余者则被押往巴巴多斯岛"。嗜杀成性的士兵得到了司令的纵容,连城市中的平民也不饶恕,特别是对天主教的牧师。"所有的僧侣,除了两人之外,头颅都砸碎了"。

而英国军队总共才损失了64人,不难看出,德罗赫达一役不是什么打仗,而纯粹是一场屠杀。

德罗赫达战役后,克伦威尔挥兵南下,袭取另一个沿海城市韦克斯福德。在那里,他用类似在德罗赫达的办法对付全城军民,仅在大街和广场上,被杀死的就有2000人。随后,罗斯等城市相继投降。到1649年底,爱尔兰东部和东南部都为英军占领。但是,克伦威尔在向爱尔兰的内地推进时,却遭到极大的困难。爱尔兰人利用山地和沼泽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广泛开展游

击战，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1650 年 5 月，克朗梅耳战役中，爱尔兰人诱敌深入，伺机出击，全歼英军 2500 余人。这是克伦威尔军事生涯中遭到的最大的惨败。

为了征服爱尔兰，英军使用了一切手段，大量毁坏庄稼，造成饥荒；不断使用离间手法，制造对方的内部矛盾；以贿赂和许诺，涣散爱尔兰人的斗志。爱尔兰的居民死去三分之一。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自愿”地离开了祖国，被雇到波兰、法国和西班牙当雇佣兵。根据《爱尔兰处理法案》，所有的被俘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大部分被没收。而用这种办法腾出的土地，则可以满足国家的债权人和军队的需求。许多士兵由于无钱筹办私人农场，而把他们手中掌握的有权在爱尔兰获得份地的“债券”卖给了军官们。就这样，军队上层分子与伦敦的大亨们一道攫得被没收的土地，成了英格兰新的大地主阶级，而这正是日后克伦威尔的政权的最有力的支柱。

英国伦敦商业区热烈地欢迎克伦威尔回到伦敦。他们在欢迎自己的走运的将军，议会把他称作：“古今最英明和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但欢迎的狂欢尚未停息，克伦威尔又动身远征了，这

次的目标是——苏格兰。

“除非出现奇迹，我们无路可逃。”被困中的克伦威尔几乎绝望。

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流亡在荷兰的查理一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便宣布为王，称查理二世。1649年3月，苏格兰派特使前往荷兰，同他进行频繁的谈判，苏格兰人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帮助他恢复王位的条件：接受1643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订立的《庄严的同盟和圣约》；承认他父亲是个专制的暴君。对于这些条件，查理二世内心感到不快，同时因为他正与天主教的爱尔兰保王势力密谋复辟，因此对苏格兰人的条件没有作明确的答复，谈判拖延了下来。

到了1650年5月，爱尔兰已被克伦威尔夷为平地，查理二世的幻想即告落空，除了苏格兰人的支持外，已别无他途。为爬上王位，查理二世不得不接受苏格兰人的条件，双方签订了《布列达协定》，6月初，查理二世来到了苏格兰，那里的国会组成了一支以戴维·雷士里为总司令的26000人的军队，准备进击英格兰。

英格兰的国务会议对于苏格兰与查理二世之间的相互勾结，早已十分注意。当初只是因为爱尔兰问题吃紧不能分神应付。《布列达协定》签定后，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爱尔兰的军事行动也可告一段落，于是议会立即召克伦威尔返回伦敦，并于6月26日任命他为“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弗利特伍德和兰伯为副总司令。7月初，克伦威尔带着1.6万名远征军出发，22日，越过特威德河，进入苏格兰国境。

雷士里是位军事将才，在6年前的马斯顿荒原之役中，他同克伦威尔密切配合，战功卓著。他知己知彼，用兵谨慎，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优，但在质量和装备上都远为落后，如果与英军正面交战，必败无疑。同时他分析到时间、气候、供给上的困难，将使英军疲惫不堪，苏格兰严寒多山，应充分利用地形，用小股兵力骚扰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他准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拖垮英军：“如果我们隐蔽在自己的战壕里，如果所有的农民抛弃农村，进了城镇的话，铁骑军就只能吃铁，不得不被赶走，逃之夭夭。”无疑，这是对付克

伦威尔大军的上上之策。

而克伦威尔也相当了解在苏格兰作战的困难，因此，他一心想速战速决，但苏格兰人始终坚持躲在山里，从不进行正面进攻。

爱丁堡防守太过严密，克伦威尔于九月退到了邓巴尔，决定在那里等待援兵。转了一大圈却毫无所获，士兵斗志低落，而这时致命的消息传来：通往柏尔维克的道路——克伦威尔同英国联系的唯一道路被苏格兰人截断了。在海湾附近的几艘英舰，满载着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却可望而不可及。装备和粮饷消耗殆尽，饥饿和疾病每天都把越来越多的英格兰士兵带进坟墓，许多人，包括克伦威尔本人几乎绝望了：

"我们正处于非常困难的交战状态之中……除非出现奇迹，我们无法穿越他们控制的山岗……"

如果苏格兰军按照原定的作战方案坚持下去的话，被困的英军命运将不堪设想。可是雷士里军队中的苏格兰长老派的牧师们眼看克伦威尔已成瓮中之鳖，便催促雷士里下山出兵。雷士里也以为时机已到，便于9月2日下令全体将士于当天晚上，从山上下到平地，堵住英军出海

的道路，并准备于第二天早晨发起进攻，一举消灭克伦威尔的部队。

“苏格兰人下山了！”消息立刻传到克伦威尔那里，本来已陷绝境的克伦威尔忽地眼睛一亮，所谓军事天才就是能抓住敌人最微小的失误而给敌人以最致命的打击。克伦威尔是个天才，他发现苏格兰军队队伍庞大，兵力众多，但背靠大山，夹在山与海之间的狭长地带，首尾难顾，运转不便，尤其是左翼更是受到了致命的限制，不能呼应全军。这不正是英军出击的大好时机吗？

克伦威尔立刻召开作战会议，进攻计划很快酝酿成熟：他佯装要进左翼，却在夜幕掩盖下重新部署了自己进攻苏格兰人右翼的主要力量。并决定在拂晓前出击。

夜色茫茫，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克伦威尔冒着雨，逐个地巡视团队，审度敌人的阵地。“在一支火炬的照耀下，他骑着一匹苏格兰小马，紧咬着嘴唇，鲜血流向下颌。”克伦威尔太清楚不过了：这是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苏格兰人看到克伦威尔调兵，以为很快会交战。但克伦威尔却一拖再拖，不肯出击。在晓

雾迷蒙中，苏格兰人紧张的情绪刚有放松，克伦威尔便命右边骑兵迅速进攻。苏格兰人还是很快摆开队形，并“顺利”地打退了克伦威尔骑兵的进攻。但苏格兰人很快发现，克伦威尔亲自带着久经考验的骑兵后备队，冲入战场，迂回到苏格兰军的右后方，战局顿时改观了。苏格兰军慌了手脚，而此时英军的步兵也投入了战斗，从正面发起进攻，一阵猛冲猛杀，苏格兰的左翼根本来不及支援，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苏格兰军队成了任人割宰的巨虫，只一会便溃不成军。

一小时后，战斗宣告结束，雷士里的军队3000人被击毙，10000人被俘。当太阳从海上升起，克伦威尔以压倒一切的声调高呼：

“上帝升起来了！他的敌人溃散了！”

其后，克伦威尔给国会写信说：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只损失了20人，到写信时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军官死亡。”

登巴战役后，克伦威尔乘胜前进，占领爱丁堡。到年底，整个苏格兰的平原地带均为英军占领。

克伦威尔战功赫赫，任何敌人在他的铁骑下都将被粉碎，“假如我再年轻十岁，我会叫欧洲所有的国王发抖。”

登巴战役之后，苏格兰长老派并未善罢甘休，相反却使他们勾结得更紧。1651年1月1日，苏格兰国会在斯康为查理二世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并推举他担任苏格兰军队的统帅。查理二世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和复辟希望，迅速重建并亲自率领一支两万人的队伍向南进发。

这时的克伦威尔，虽然取得了登巴战役以及随后的一些胜利，但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他的部队粮食匮乏，军火不足，饥饿和疾病严重地袭击着广大士兵。英格兰境内各地保王党人发动叛乱，妄图与苏格兰人里应外合颠覆共和政权。苏格兰的严冬袭击了他，他患了严重的疟疾，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内在人格奇迹般地获得了支持，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正在变老，感到衰老正在偷偷地侵蚀着自己。”

到了春天，他觉得自己好些了，又恢复了军事行动。雷士里这次吸取了教训，采取了防御策

略，以便将克伦威尔诱进多山、荒凉的地区。克伦威尔机警地看清雷士里不会再挑起会战，为避免第二次冬季战役，他决定采取一个冒险步骤。他为了从北面包抄雷士里，给雷士里敞开了通向南方英国边境的道路。苏格兰人早就等着这一刻了，在查理二世统率下，他们向英国纵深猛扑，只碰到了哈里森和兰伯的为数不多的部队的轻微抵抗。苏格兰人自以为勇不可挡，许多人劝查理二世直捣伦敦，似乎一切得来的太过容易了。但他们大大失算了。

很快出现在任斯特附近的克伦威尔的大军挡住了正在向南挺进的查理二世。1651 年 9 月 3 日，邓巴尔之役一周年的纪念日，在那里进行了决定性的会战。

那天，晴空万里，骄阳高悬。一批船只载着弗利特伍德的士兵，清晨越过塞文河和特姆河的汇流处，直趋任斯特，现在已离城不远。克伦威尔自己率领四个精选的团队，从右翼进袭。这两支大军向北横扫，歼灭隐蔽在城郊工事里的敌人。在攻城之前，责令他们缴枪投降，但遭到拒绝。强攻过后，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午过后不久，英军破城而入。战斗结果，苏格兰军

3000 人死亡，9000 人被俘，以副统帅雷士里和拉纳克为首的全部军官都成为阶下囚。查理二世在败局已定之际，溜出战场，潜逃出城。

任斯特战役中，苏格兰军的主力被全歼，此后，形势急转自下，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攻克苏格兰境内尚在顽抗的地区。第二年五月，最后一个堡垒也竖起了白旗。至此，叛乱被全部平定，武装复辟的浪潮被平息，英格兰共和国基本上解除了外来颠覆的威胁。

9 月 17 日，克伦威尔回到伦敦，首都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欢迎仪式，那是使许多人回忆起古罗马征服者凯旋式的仪式，克伦威尔的声威升到了顶点。

议会赠给他许多新的礼物：除早先已经归他使用的怀特浩宫外，现在又把国王的夏宫汉普顿宫连同附近的一所美丽的公园加赠给他。还奖给他 4500 英镑的年金。大量的请愿书现在不是寄往国会，而是直接寄给克伦威尔，甚至连外国使节在去与议会会谈之前，也力求得到这位全能将军的支持。

到处流传着克伦威尔这样的话：

“假如我年轻十岁，我会叫欧洲所有的国王

发抖。”

克伦威尔既有的权力臻于极盛，这对于英格兰共和国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难怪有人预测：克伦威尔不久会给自己戴上王冠。

第九章　登上“护国主”宝座

克伦威尔杀了一个查理，废了一个王朝，可是许多事儿轮到他头上，也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幸好他比查理多了一点东西——他手中的剑。

没有人敢怀疑克伦威尔，他的话哪个敢不听？但这一大乱摊子，实在不容易对付。

克伦威尔所向无敌的宝剑，看来使英格兰共和国最后巩固起来了。1650年，西班牙正式承认了共和国，过了两年，法国也承认了。看来没有什么东西预兆共和国即将复亡，但是使其坍塌的致命原因隐藏在它自己身上，隐藏在它的政策之中。

登巴战役之后，克伦威尔曾呼吁议会进行刻不容缓的改革："在战争时期上帝借助议会完成了大业，在和平时期民众期待议会继续成就大业。请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倾听一个英国不幸囚徒们的呻吟，关心关心消除各阶层的弊端。如果为了少数人发财致富而让多数人破产，那是与共和国不相称的。"

但是"残缺国会"对将军的要求置若罔闻，它颁布的许多法律正是为了尽量促进和加速"多数人破产以使少数人发财"。共和国完全蔑视农民的利益，公簿持有农没有成为自己份地的领有者，却成为勋爵们的牺牲品。"什一税"并未被取消，法制紊乱、奸商四起。而议会的成员们，新旧显贵窃据要位，培植亲信，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特别是在没收和拍卖王室和僧侣贵族的地产时，枉法徇私，为自我及其小集团利益而投票。一个士兵对下院的统治是这样写的："在国王统治下的蒙害受损和在自由英格兰管理员统治下的蒙害受损实际上是一样的，都坚持着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执法中的腐败，什一税的三倍追索；信仰事务中的迫害以及对穷人的暴戾。"

对不孚众望的长期国会，首先起来发难的是军队。1652年8月，以兰伯为首的军官集团呈递了一份请愿书，其中，除了要求改革法制、消除弊政、保障复员军人和失业者的新生活以及有关宗教事宜等项条款之外，还要求加紧拟订国会新代表的选举法案。

国会接受了请愿书，但除了将它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审议之外，无动于衷。克伦威尔也利用群众情绪，为实现个人独裁创造条件，坚持国会必须改革。尔后国会才以两票的多数通过了自行解放的决议，但那是在3年以后，而不是立即解散。至于新国会的选举问题，在克伦威尔倡议下，双方领导人于10月份内举行了12次私下会谈，但都无法达成协议。

军队被激怒了。1653年1月，军队中的国会反对派领导人四处游说，进行鼓动，要求立即解散国会。3月军官委员会决议封锁国会大门，斥逐议员，在克伦威尔的调解下，这个决议没有付诸实施。

4月，国会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小亨利·温主持下草拟出一份新的选举法案。据此，现任议员不进行改革，继续参加到新国会中，而且还由他

们组成复审委员会来确定新当选者的合法性。显然，这是一项无限期延续现存国会权力的方案，它不能不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可是，为了维护国内的稳定，把革命果实保全，克伦威尔仍努力谋求妥协。

4月19日，也就是国会决定通过新方案的前夕，克伦威尔在白厅召开双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军方坚持认为，倾向性如此鲜明的新方案不能予以通过，国会方面则认为军方的规划充满着危险。怎么办？

议员们说：

“没有其他办法，除非让我们象现在那样地呆一段时间。”

军方则说：

“这绝不可能。”

双方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克伦威尔提出了他的折衷方案：由国会指派一个人数有限的委员会充任过渡性的政府机构，以便某种较好的体制得以完善地建立起来。这个方案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完全同意，但双方一致决定将国会新方案暂且搁置，第二天再行商议。

面对乱轰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国会，克伦威尔忍无可忍，大喝一声："以上帝的名义——滚！"

第二天，4月20日早上，克伦威尔穿着黑色便服和灰色粗袜在他的接待室里，同几个军官等待着议会的消息。哪知，议会却想趁克伦威尔不在之机，赶忙讨论一个新的选举法案，以便使它成为法律之后，立即走散，从而让克伦威尔去面对一个既成事实。

得知这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后，克伦威尔勃然大怒，顾不上换衣服，随身带了几十名火枪手赶赴议会。他让士兵留在门外，自己走进议会，靠近哈里逊坐了下来。克伦威尔听了一段时间的辩论之后，转身对哈里逊少将说："是该解散国会的时候了，我们该行动了。"

"阁下，"少将回答，"事情是重要的，也是担风险的，因此，我希望你在着手之前，予以严肃的考虑。"

"你说得对。"克伦威尔回答说，然后又默坐了约一刻钟。当方案付诸表决时，他告诉哈里

逊："是时候了，我必须行动！"

于是克伦威尔站起发言，在赞扬一阵之后，他话锋一转，开始指责国会的罪行，历数议会议员们的败德行为，声调越来越高，几乎是对着议会叫喊了。他戴着帽子，穿着粗布衣袜，面对所有议员毫不留情地数落着。

议员彼得·温特沃斯爵士起身争辩："这真是国会大厦内所罕见的，而且又来自一个被信赖的公仆，一个我们一向认为值得爱戴的……"

"够了！够了！我已经受够这些了！"克伦威尔打断温特沃斯的发言，大声说："让我来制止你的废话吧！"他步入大厅中央，手挥着帽子，脚跺着地，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耽搁下去了，你们在这里的时间够多的了，现在你们必须让位给更适合的人们——叫他们进来！"

门被打开，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了大厅，持枪而立。

"你们自称是国会，"他继续着，情绪激动得象着了火似的，"你们不是国会，我说其实你们不是国会！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他目光扫过议员们的脸，不点名地痛骂一些议员是"酒鬼"、

“淫棍”、“恶魔”、“居心叵测，道德坏败”等等，“你们是一些败德不正之人，玷污了基督的言行。你们怎么配成为上帝子民的国会呢？我说，滚开吧！让我把你们处理掉，以上帝的名义——滚！”

接着，他举起权标问：“我们怎么处理这玩艺儿？——让它见鬼去吧！”说着把它抛给一个持枪的士兵。

“把它弄下来！”克伦威尔余怒未消，瞧着汉辰伦索对哈里逊说。哈里逊走近议长：“阁下，我来帮您！”说着伸出手把他拉下了议长席。

然而，克伦威尔下令把所有议员赶出下院，他追着他们喊：“是你们逼着我这样干的，我日夜祈祷上帝，宁肯把我杀死，也比逼着我这样作强些。”于是走到议会秘书跟前，从他手里夺过已经准备好了的解散议会的法令，把它塞到自己的帽子下面。接着下令锁上大门，扬长而去。后来克伦威尔在谈到这次行动时说，议员们“象狗那样大叫一声都没有。”

当天下午，获悉国务会议照常在聚会，克伦威尔在哈里逊和兰伯伴随下来到国务会议的议事厅。他看来已从上午的情绪中恢复了过来，态

度冷静地说："如果你们作为私人在此聚会，我不来打扰你们；但如果这是一次国务会议，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今天上午下院发生的事情。很抱歉，国会已经被驱散了。"

就这样，长期国会被驱散，它的产物国务会议也消失了，在不列颠的土地上，除了军队总司令克伦威尔外，已经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权威了。

废了国王的是克伦威尔，而如今他自己却悄悄尝尝当国王的滋味了。

1653年4月，长期国会被驱散后，没有国王和上议院的一院制共和政治倒塌。于是产生了一个不容拖延的问题，即用什么来代替业已解散的议会政权呢？用什么样的宪法来巩固同盟者的胜利果实呢？

一向冷静、谨慎、当机立断的司令官，在作为一个面对复杂、矛盾的现实的政治家出现的时候，却忽然显得犹豫不决，疑虑重重了。他原本是躲在斗争各方的背后，而今，他自己消灭了长期以来掩盖他的专政的残缺议会，失去了这一掩蔽物，一切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克伦威尔一向相信自己特殊的世俗使命，但现今面临的实际情况，绝不是战场上的冲冲杀杀，他面对的是同自己昔日的战友在政治意图上的重重矛盾，奥利弗·克伦威尔开始动摇了，他转弯抹角，盘算一些可行的途径和解决办法。

早在1652年12月，在詹姆士宫的花园里，克伦威尔同怀特洛克曾进行过一次密谈。谈话是从这一年的秋天军队和国会的矛盾问题开始的。但后来克伦威尔忽然发问："如果有人以国王为己任会怎样?"

"这样的处方比疾病本身更糟。"怀特洛克嗫嚅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克伦威尔问。

怀特洛克随即指出："你当总司令较之采用国王称号所带来的嫉妒、危险、招摇和虚夸更少，而真正的权力和行善的机会却一点也不少。"

而今，长期国会已被他驱散，他便又想起这件事，但仍不敢肯定地下决心。为稳妥起见，1653年5月，克伦威尔和他的军官委员会秘密协商后，从各郡中提名选拔140来人组成新的

国会，史称“小国会。”

7月14日，克伦威尔在小国会的开幕式上毫不掩饰地指出：新议员的就任是通过军队选择而由上帝授予，是他和军官们旨意而使他们会聚一起，组成最高统治机构。他期望这个国会顺从他的政策，听从他的指挥。然而事情却出乎了克伦威尔的意料。

小国会中的那些宗教和政治狂热的成员，热切地从事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这却触动了许多军官集团的利益。1653年12月12日，一群忠于克伦威尔的议员早早地来到下院，猛烈抨击多数派议员的激进改革措施。这个动议立刻得到一些人的附和。而那些热忱的改革者，惊恐愤怒之余，挺身而出，为捍卫自己的事业进行辩解。

争辩难分难解，双方互不相让，就在此时，罗斯议长突然离席，宣布散会。警卫队长拿起权标，用肩扛着走在他的前面，大约40来人跟在后面，一起赶赴白厅。他们在一间密室中，仓促地起草了一份辞呈，递交给克伦威尔。

剩下的人仍然留在下院议事厅里，他们异常恼怒，惶惑，但他们的人数不足以构成一院，

但却不愿散会。他们正提出以祈祷来打发时间，两名军官——哥弗上校和怀特少校走了进来。

“你们在这里干啥?”少校问。

“我们在祈祷上帝。”议员答道。

“那么，”怀特说：“你们可以到别处去。因为就我所知，他不在这里已有12年了。”

随后，怀特召来了一小分队的士兵，当然拿着枪，封锁了大门，请出了议员，掌管着钥匙。

“小议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在它解散之前，却有一份统治方案被制定出来，名曰《施政文件》，这是英国历史第一个成文宪法。

1653年12月16日下午1点左右，克伦威尔乘着一辆崭新的马车，从他的官邸白厅出发，在由五个团步兵和三个团骑兵所组成的夹道军列中穿行，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厦。陪同他的是市长、市议员、法官和两名掌玺大臣。

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华丽的大红地毯上端放着一张至尊者才能坐的椅子。克伦威尔身穿素净无华的服装，披着黑天鹅绒披肩，脚蹬兵统靴，手执银白色宽金边帽子，走到座席前面。掌玺大臣分列左右，法官们站在座后，围成半圆形，民政官吏站在厅左，军队成员立于厅右。

什么事如此兴师动众？原来这是将要举行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的宣誓效忠仪式。

仪式开始。兰伯少将走上前来向勋爵将军致敬祝词。他陈述了“小国会”的自愿解散，说明紧迫的形势需要一种强力而稳定的统治，恳请勋爵以军队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个民族国家的名义接受共和国护国主的职位。

克伦威尔庄重地表示了推让之后，同意接受。

接着，一名军官委员会的秘书奉命宣读包括四十二项条款的《施政文件》。按照这个文件，克伦威尔被推举成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和国的终身护国主。立法权授予护国主和每三年改选一次的单一议院的国会，国会召开后五个月内，未经国会本身同意，不能被终止、休会或解散；护国主无权否决议会决议，但可以提出反对的理由促使国会取消决议。选民必须拥有200镑的财产，行政权授与护国主以及新的国务会议，参照国务会议意见，护国主可任命主要官吏，决定外交、宣战与媾合，征收必要的捐税。军事大权归由护国主和国会共同掌管，在国会休会期间则由护国主和国务会议掌握。

《文件》读毕，克伦威尔站起身来，高举右手，仰视天空，宣誓效忠并遵守《施政文件》。这时，兰伯双膝下跪，献上一把带鞘的公民剑，克伦威尔挂剑在腰，把自己的军队用剑解下旁置，表示将按宪法条款而不按军事权威进行统治。

尔后，他曲身落座，把帽子戴到头上。掌玺大臣呈上国玺，伦敦市长奉上宝剑，克伦威尔接过后，又庄重地还给他们，以示信赖，令其保管。

在履行了这样一个象征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仪式后，克伦威尔走出大厅，坐进马车，在人们的前呼后拥和好奇围观中返回了白厅。

同一天，政府发布公告，一个由护国主、国务会议和任期三年的一院制国会组成的新政体已经确立，克伦威尔便开始了他的护国政治。但好景不长，护国政体确立后一年不到，个人独裁与国会主权之间的矛盾便爆发出来了。

“护国主”是个什么东西呢？他同国王有什么区别呢？没人能回答，也没人敢回答。

1654年9月3日，根据《施政文件》规定

召开护国政体的第一届国会的日子，但由于这天是星期天而被推迟。

第二天，国会开幕。上午10时，护国主克伦威尔在数百名文武官员的簇拥下从白厅出发。威风凛凛的卫兵领先开道，一些国务官员分列克伦威尔敞篷车的两侧，步行陪从。后面接着是掌玺大臣、财政大臣以及国会其他要人的马车，殿后的是英姿勃勃的卫队。克伦威尔身着一套素净的衣服，更显得超凡脱俗，庄重非常。

一行人来到教堂聆听了神道后，进入议会大厅，克伦威尔在华盖遮蔽下的首席上就座，议员们分坐左右。在开幕词中，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谈到了包括远征爱尔兰和苏格兰在内的十年内战这个“严峻的阶段”，然后，话锋一转，严厉地攻击长老派的宗教上的强制，强烈地指责平等派们的妄想。

历数了护国政体以前的各政治派别的过错后，克伦威尔指出在他的统治下，内政外交都取得了许多成就，并认为国家已经获得了安宁。发言结束时，他呼吁议员们不失时机地把《施政文件》付诸实践，对共和国进行“恢复和整顿”。

然而克伦威尔一厢情愿的发言并未能引起

国会议员们的兴趣，他们不是讨论如何按照克伦威尔的意思去怎样行动，而是去讨论《施政文件》本身及其护国主这个头衔的权威性。这样的问题被提出：凭什么权力一个人依仗宝剑的威力就敢于指挥他的指挥者？国家是不是应由单独的一个人和一个国会来进行共同的统治？个人统治与国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

人们清楚地看到：护国主这个无冕之王的最高统治权受到了挑战。而更令克伦威尔吃惊的是，9月8日国会竟通过这样一个提议：国家最高统治权应属于国会，护国主“不经国会同意不能有所行动”。但仍有大部分人认为护国主的权力是得到了人民的认可的，人民应是权利的唯一来源，因此护国主的职能非国会所能改变。气氛紧张起来，在争辩过程中，反对护国政体的人数，大有增长之势。

克伦威尔不安地注视着国会的动向，最后，他获悉这个委员会最终确认：行政权可由单独的个人掌握，但立法权则应专属国会。这时，他恼了。他不能容忍以他为首的新的政治体制被人改变，更不能容忍国会对护国主这个“职称”横挑鼻子竖挑眼。

9月12日早晨，当议员们前往国会大厦时，有关国会解散的传闻接踵而来。议员们来到国会大厦前，却被卫兵挡住："这里没有通道，下院会议室的门已经锁上，我们奉命不准任何人进入。如果你是议员，请到会议大厅去，护国主马上就会到那里去。"

大约9、10点钟光景，克伦威尔象一周前一样，坐上了首席，开始发言："在上次聚会时，我告诉过你们这届政府的由来，也告诉过你们，是本届政府把你们召集来此的。那时我的确说过你们是一个'自由国会'……然而，我认为，现在有必要扩大一点我的职责了。"

他接着愤慨地说："你们是自由国会，但同时必须明确，我是护国主，是召集你们前来的权威……你们在这里聚会却不承认据以会聚的权威，这是违反护国政体统治的根基。"就此根基，他提出了四条原则：一，国家必须由单独的个人和一个国会共同进行统治；二，国会本身不是无间断的、永续的；三，信仰自由是人们的自然权利；四，军队必须由护国主和国会共同掌握。他严厉地警告议员们：这些原则只能接受、不能议论，更不能改变。"我宁可被碾得粉碎，"他斩钉

截铁地说，“以丑恶的名声被埋进坟墓里，也决不允许任意颠覆这个政府，弃置这些原则。”最后他责令全体议员在下次到国会议事厅开会之前，应当到指定地点去宣誓，接受他的统治原则。

议员们在听取护国主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觉到战剑已在他胸鞘里嘎嘎作响。下次开会的时候，当他们来到护国主指定的地方时，果然看到一张长长的羊皮纸，上面写着：

“我特此宣布，允诺并保证，我愿意忠诚于护国主及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的共和国；我愿意按照被选时誓约的旨意为本届议会服务，不提出也不同意改变由单独个人和议会所奠定的政治体制统治。”

面对这份誓约，签还是不签？签，表示屈从于护国主的个人统治；不签，意味着弃职回老家。结果，以克拉德肖·司克脱、霍斯里格等100多名议员拒绝宣誓，而多数议员则签了名。

国会被清洗了，护国主和他的护国政体保持了下来。可事情却差一点因一件偶然的事而断送。

“我谨向你们宣布，我决定解散这届国会。”这话听起来似乎不象是克伦威尔说的，倒象是查理国王说的。

1654年9月29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克伦威尔邀请秘书约翰·瑟洛与他的家属一起到海德公园去郊游。他们的马车由六匹尼德兰的佛里斯兰马挽拉，这是一种有名的烈马。克伦威尔性喜争强好胜，为了试试马的烈性，决定亲自驾驭。“没有问题，”瑟洛说，“这些马将会象您驾驭的三个王国一样地驯服。”克伦威尔登上驭座，扬鞭而去。

开始时，护国主赶得很稳当，马也显得温驯。克伦威尔奇怪这马怎么这么老实，于是便猛抽了一顿鞭子，马被激出脾性，翻蹄亮掌，发起疯来，车是飞快，但却已不易驾驭了。突然，一个颠簸，把克伦威尔从座上弹起，掉在车下，他的脚被挽具缠住，被拉了一段路。当他挣脱出来时，车子擦身而过，几乎将他拦腰横轧。更险的是他被马车拖着滚动时，随身带着的防卫武器走了火，幸而也没有伤人。克伦威尔很快被护送到白厅。

整整三个星期，克伦威尔很少接待宾客，也无暇顾及国事。事实上，前后有三个多月时间，他因动弹不得而不得不静心休养。

而这段时间内，国会大厦的议事厅内，环绕着护国政体和护国主的权限问题，争论始终持续着。一些虽然签了名，却不甘心屈服的议员们集中议论着护国主的军事权力，他们主张：护国主和国会共同控制武装力量这一点只限于护国主本人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克伦威尔的继承者没有控制军队的权力。国会还派出代表，与克伦威尔商谈按照《施政文件》来削减军队，并提出以民兵代替军队；对于军队给养所需的拨款，国会迟迟不作出决议。凡此种种，都使克伦威尔非常恼火，他不同意缩减军队，更恼恨国会在军队给养问题上的拖延，因为这是在削弱他个人独裁的基础。眼看着国会仍不听他的话，便决心摆脱这个无用而碍事的东西。

1655 年 1 月 22 日，议员们接到通知，要他们去会议大厅，护国主要接见他们。到了那里，议员们见护国主满面霜色，神情冷漠："我不知道，你们一直是存在的还是死亡了的；在你们的庇护下，和平没有恢复，存在于我们中间的令人

遗憾的混乱没有得到整顿。”他接着说道：“还有许多人阴谋策划把国家再次投入血泊之中，企图使我们流血和混乱。”

“我认为，”护国主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我有职责认定，你们要是在这里继续呆下去，耽得更久一些的话，对国家，对平民，对公共利益都是没什么好处不合时宜的，因此，我谨向你们宣布：我决定解散这届国会。”

就这样，克伦威尔解散了议会，在他们学会听话之前他是不会听议员们乱说乱动的。现在护国主距国王只一步之差，克伦威尔究竟想不想作国王呢？

人们都以为克伦威尔要称王了，可是克伦威尔毕竟是克伦威尔：“国王这个称号只不过是男人帽子上的一根鸡毛。”革命总算没有葬送在他的手里。

解散第一届国会后，克伦威尔通过派驻在全国十一个军区的陆军少将，来加强他的个人独裁，史称“陆军少将制度”。1656 年 9 月第二届国会召开时，他把 100 来名共和主义者，排斥

于国会大门之外。实际上他已在行使着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权力了。“他进入了权位至尊的境地”，法国一位政治家这样评论：“但他挂起一道帷幔，遮蔽着人们所论道和君侯们所崇奉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被遮蔽是在寂静无阻中进行的，虽然他从未得到这些权力本身的赞同。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克伦威尔再次面对国王宝座的诱惑。

1657年2月23日，第二届国会召开后不到半年，一个活跃的，有影响的前任市长、大商人克里斯托弗·帕克爵士，要求国会准许他宣读一份改变现存政体，名为《恭顺的陈辞与规谏》的文件，主要内容是提请护国主接受国王称号，国会由两院组成。

这一提议一经提出，如巨石击潭，在国会中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应，帕克几乎由于他的鲁莽行为而受到法庭的传讯，但帕克的动议，无非是说出并加速了国会中大多数人的心愿和行动。于是，一场朝野注目的关于克伦威尔应否称王的争论展开了。

在国会里，居于少数地位的倾向共和的议员竭力表示反对，他们责问那些要克伦威尔当

王的人："难道你们要使护国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伪善者吗？你们想把他送上已为上帝所推翻了的王位上去吗？"同样，以兰伯等为首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强烈反对，认为那将是对军队的背叛。

持赞成意见的是那些有产者的代表，政客、律师和富裕的乡绅。特别是律师，他们提出：国王这个职位是与法律的整体以及国家体制的全部活动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国王的特权和他的活动范围，不待言明，就能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可是谁能给护国主的权利和职责划定界线，明确范围呢？是英格兰的法制要克伦威尔作国王。于是国会开始逐条讨论帕克动议的内容。

在国会之外，伦敦商业区的富商大贾支持这个动议，因为他们越来越把克伦威尔看作是一现存秩序和私有财产的坚持捍卫者。但军队中的广大士兵则强烈抗议克伦威尔当国王，道理很简单，这将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拥护的原则背道而驰。军官们更是不愿看到克伦威尔登上王座而凌驾于全军之上。在帕克提出动议后的第四天，一百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护国主，告诉他广大战士的情绪，恳请他不要听从

一些人的劝进，否则，将有害于国家，也毁灭了他自己，到头来，将导致王党流亡者的卷土重来。

在这徘徊歧路的时刻，克伦威尔本人又怎样呢？

对于克伦威尔个人来说，他是有一定的权力欲的，但他唯一的顾虑便是军队，广大士兵的态度令他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要知道克伦威尔之所以能有今天，个人的英勇、机智抛开后，这便是他最具威力的支柱，他不能失去军队。况且，军官、士兵对他的拥戴，又怎能是一个国王所能比得了的呢？因此，他在会见军官代表时，表示自己没有参加此事，他本人对国王的称号并不关心。

国会此时仍在热烈地进行讨论。3 月 25 日，国会以 123 票对 62 票通过了文件。

六天后，即 31 日，文件以《恭顺的请愿和劝言》的正式名称在白厅的宴会大厅提交给护国主，克伦威尔当即表示："给我时间，让我审慎考虑一下，对如此重大的事情我该作出怎样的严谨的回答。"

4 月 3 日，护国主克伦威尔在给议长的信中

说："就你们而言，提出这样的劝谏是合适的，就我而言，接受这个劝谏是不妥当的。"但他在同一封信中又说："你们需要我无条件地作出回答，这样，我除了全部接受以外，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言外有言，话中有话。克伦威尔真是高明，但也正说明他仍在犹豫，或者说王位对他仍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赞同王位的一派人，嗅出其中气味，心领神会，立刻指派代表与护国主进行面对面会商。事情从国会议事厅转到克伦威尔的住处，有时很多代表参加，有时只三、四个人关门密谈。此时的克伦威尔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采，他放下架子，与代表们亲密无间，使其受宠若惊。他有时离开话题，吟诗颂歌，使与会者摸不着头脑，有时则悠闲地独自抽着烟斗，接着又回到了称王这个严肃的主题上来。会谈时聚时散，持续了一个月，克伦威尔的疑虑开始消除，接受王位的渴望又在他脑中泛滥开来，并决定在5月6日召开国会，作出答复。

5月5日，为了争取军官们赞同他的意图，克伦威尔以个人名义邀请反对最强烈的迪斯勃罗共进午餐，并由弗利特伍德作陪。席间，护国

主谈笑风生，气氛融洽，涉及到称王的问题时，克伦威尔轻描淡写地说，这个称号“只不过是男人帽子上的一根鸡毛而已”，要他们别因此喋喋不休，并说他们是谨小慎微的一对。第二天，克伦威尔在圣詹姆士宫花园里，把他接受王位的决定告诉迪斯勃罗，后者回答：他决不直接反对，但将与兰伯、伯利特任德一起辞去一切公职，从此不再支持他，其他军官中的有识之士也必将群起仿效，克伦威尔意识到事态严重，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日期推迟到5月8日。然而，军官们已行动起来了。

迪斯勃罗回家后碰到普赖德上校，告诉他护国主准备称王的决定。

“他不可能！”普赖德上校说。

“为什么？”迪斯勃罗问，“你怎样来阻止这件事？”

“给我搞一份拟好的请愿书，”普赖德说，“我就能阻止他。”

于是一份由约翰·欧文博士起草，33名校尉级军官签名的请愿书在5月8日早晨由梅森中校送呈给国会，它的内容大致是：我们过去曾经冒着生命捍卫国民的自由，但是我们注意到，

有些人力图把国民置于过去时代的奴役之下，他们所用的手段是，迫使我们的总司令接受国王的称号来执政，以便毁灭他。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要这样做的人，坚定不移地继续原来的事业，对我们来说，为了维护这一事业，我们甘心情愿献出我们的生命。

是将士们的真诚感动了克伦威尔，还是他害怕这样下去的严重后果，我们无从得知，但在克伦威尔获知请愿书一事后，立即派人去国会，中止了议员们的讨论。“我不能以国王的名义执政。”在白厅的大会上，他最终作出表态。

5 月 25 日，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在国会获得了通过，成为新宪法。它取消了国王的称号，但确认了护国主世袭，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同时决定恢复上院。

克伦威尔接受了这部新宪法，并于 6 月 26 日宣誓就职。在与会者的热烈欢呼和喇叭吹奏声中，克伦威尔登上了世袭护国主的宝座。

干得漂亮，英格兰的无冕之王！

第十章　尾声

在克伦威尔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他曾想多做几件有益于国家的事，但是他的使命既已完成，上帝自然要招他前去打听打听他的功绩。想想几年前被处死的查理，克伦威尔忽然明白了个道理：在历史面前，并没有真正的胜者。

克伦威尔避开了“王位”这一陷井，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否定他的权威。在历史的一场片断剧落幕之前，让我们把英国放回到世界这个大范围去。这样，我们才更能看清英国革命的意义和必然的历史局限性。

克伦威尔的胃口不小，英格兰对世界各地的殖民掠夺在这几年并没有被耽搁。

英国内战一经结束，它的工商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殖民政策也

得到了进一步推行。在不列颠土地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回事，对外殖民扩张，大赚特赚则又是一回事。也正因此，英国人才冒着风险，远征西印度各地，并顺手占领了牙买加。

整个西印度殖民地令英国的许多有头脸的和不知名的人物感兴趣，不仅是由于那里的财富，而是能够把宗主国不可靠的分子迁移到那里去。

早在内战时期就已经实行把政府的政治敌人向殖民地流放，在护国政治时期，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英格兰本土的人都被大批流放至该地。这些人是无偿的劳力，对那些梦想海外淘金发财的人来说更是大有用处，因此，对西印度的殖民成了大亨们和想成大亨的人们的最热衷的事。

但是，西班牙在西印度却早有根基，英国的强行插手，必然使其利益受阻。在调停无效的情况下，1655 年 10 月，两国开战。

对于西班牙，它一向是英国在海外的劲敌。许多主战的人都认为西班牙此时国势不如英国强盛，而且夺取西班牙已经开发的殖民地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同西班

牙人开战，道理很简单，与西班牙通商的商人们，每年要进口大批的西班牙羊毛，而这正是英国纺织业的重要来源，所以从事毛织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提出不满。战争一开始，英国商人就向克伦威尔写信："我国商品的出售即使不完全停顿也要遭受困难，因为当西班牙与任何国家作战时，他们就发布严厉的法律，禁止这些国家的任何商品的进出口。"

但战争终于开始了。事实证明英国海军不失为世界之霸，获得胜利的是希望这次战争能为国库带来巨大收入的克伦威尔。

在这期间，政治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西班牙作战，就要同西班牙的敌人——法国结成同盟。那样住在法国的查理二世就一定要离开法国而奔赴马德里。同马德里联系，必然会在英国国内降低查理二世的声望，从而减少拥护复辟的人数。这样对西班牙的战争不仅可以保障英国以新的殖民地，而且可以巩固共和国的政治地位。1655 年 11 月，西班牙大使撤离伦敦，同时，英法两国签定了条约，条约规定：贸易自由，双方停止掠夺船只；给与驻在法国的英国人以宗教自由，把查理二世和一些有名的英国流

亡保王党人驱逐出境。英国获得了名义上和事实上的支持。

护国主的外交活动，不仅限于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谈判，对葡萄牙和荷兰也签定了极有利于英国的和约。并且在对北方各国的交通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对共和国非常重要，因为英国要从那里运粮食、木材、大麻等等。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同瑞典、丹麦等国都签定了条约，以保证双方利益。

这一切当然又都是克伦威尔的外交功劳。就在英格兰的世界贸易日益兴旺发达的时候，护国主克伦威尔却已步入老迈之年。

克伦威尔可以解散国会，但他解决不了当时乱糟糟的英国社会现实。

1658 年 1 月 20 日，根据新宪法召开国会。上院的 63 名成员中，40 名是由护国主从原下院的领导成员中调任的。而下院则根据新宪法规定，1656 年被清洗的 100 多名议员重新就职。

但是他们一到下院就给克伦威尔大出难

题，提出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谁使上院成员成为贵族？谁给他们以传统贵族的特权？护国主同下院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克伦威尔先是感到不安，试图说服，但是下院并没有听他的。他们起草了一份要求恢复一院制共和国的请愿书，并要求把军事权交给“可信赖的人”。克伦威尔大为恼火。2月3日晚上，克伦威尔模模糊糊地梦见有人造他的反，于是决定立刻解散国会。1658年2月4日上午10点左右，他不同任何人商量，猛然冲出正厅的后门，想坐船去国会，但因河水冰冻，不能航行，只得赶到前门，招呼了一辆马车，带着六名卫士向威斯敏斯特飞驰而去。他女婿弗利特德知道他的企图后，想阻止他，但是没能成功。“凭上帝的神灵，我一定要解散他们。”克伦威尔怒气冲冲地吼道。

约11点钟，克伦威尔到达上院会议厅，召集了法官，唤来了下议员：“各位勋爵和下院诸位先生们！使我具有现在职位的，是你们下院的认定……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认为是我自己要得到这个职位……可是下院违背了承诺，企图搞乱军队，使他们对共和政治产生疑问；……而

这一切都发生在敌人正欲侵犯我们……流血和灭亡就在眼前……因此，”克伦威尔以异常果断坚定的声音说，“我要解散这届国会，一定要解散。”

克伦威尔能解散国会，但却不那么容易解除日趋紧张的国内外形势。查理二世在西班牙人的支持下，集结力量，准备进攻英国；国内的保王党分子仍屡禁不绝，四处作乱；而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不同政治需要使政府变得软弱无力，国家财政困难，商人偷税漏税，行贿腐化，赤字连年上升。这些都使克伦威尔心急如焚，但一个人天赋再高，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又能怎样呢？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多注意身体，克伦威尔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病魔似乎存心要找他的别扭。

正当克伦威尔为内忧外患而殚精竭虑的时候，家庭的不幸，又给他的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

1658年8月，他最疼爱的女儿伊丽莎白·

克莱普尔得了重病，克伦威尔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父爱，堪称掌上明珠。她患病后，克伦威尔立即送她到汉普顿宫，让她得到农村的空气和乡居的恬静。但这一切没有使伊丽莎白的病情好转，相反却日益加重。克伦威尔前往探望，住在那里，一直守护在他女儿的床边，直到8月6日她溘然去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最怕老年丧子女。伊丽莎白的死在克伦威尔的心灵上留下了无可弥合的创伤，戕害着他疲惫的身躯。18年征战的戎马生涯中，克伦威尔过早地变得虚弱和衰老。在伊丽莎白病危时，他自己也早已处在病痛之中。

7月23日，他中断对荷兰大使的接见。刚刚病逝伊丽莎白的汉普顿宫里一片萧索惨淡，护国主克伦威尔，英格兰不屈的战士病倒了，患的是痛风病。

8月20日后，痛风病继续恶化，结石，疟疾等也一齐向他袭来。

8月24日，经医生建议，他离开了触景伤怀的汉普顿宫，移居到白厅。牧师、清教徒以及他的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祝愿他早日康复，他自己也怀着强烈的生的希望，“我不会死于这项

发作的病！”克伦威尔对他妻子说，然后又嘱咐医生别那么愁眉苦脸，以前怎样对待病人，就怎样来对待他。

然而，事与愿违……

8月30日，一场百年未遇的强大台风，侵袭着英国的大地。它掠过荒漠的森林，骚扰着市区的大街小巷，扫荡着田里的庄稼，英伦大地正遭受着摧残。台风不久就过去了，但比台风更令人担忧的事却越来越重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上帝真的要招克伦威尔回到他那里去吗？

善良的人们在祈祷，想为克伦威尔多争一些时间，但保王党的人却死灰复燃，他们恶意地诅咒，恨不得要克伦威尔立刻离开人间。

克伦威尔的病情到底怎样了呢？

白厅。病床上的克伦威尔已经反复昏迷了几次，痛风加剧了，冷热病也频频发作。这位昔日“铁人”现在已经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

9月2日，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为他自己，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祈祷：

“主啊！虽然我是一个不幸的，可怜的生灵，但是通过神恩，我誓约于您，为了您的子民，我愿意，也决定到您那儿！尽管我很不配，但您曾

经让我成为您的一个微贱的工具，有益于人民，同时效劳于您。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评价过高，虽然另一些人希望并高兴我死去。可是。主啊！无论您如何安排我，请持续、永恒地赐益于人们吧！给他们始终如一的判断主见，始终如一的仁慈心肠，始终如一的互爱之情。请继续拯救他们，帮助他们的改革，让基督的英名光照人间；请教导那些人们，不要过于重视作为您的工具的人，而要更多地信赖于您；请宽恕那些意欲践踏弱小生灵，视之为尘芥的人吧，因为他们也是您的子民。千万宽恕我这篇简短祷文中的愚说。阿门！”

接着，便又昏迷了过去。

夜幕降临时，他的身体已经虚脱，但思绪并未中断，仍然断断续续地说：

“……上帝将不……将不离开我……但愿我能活着对上帝和他的子民再起作用……可是，我的事业已经完成了……我会尽我所能尽速归天。”

这一天，他显得烦躁，不安和痛苦。

面对一个伟人的一生，人们最终只想到了一句话：这条路是对的。

他躺在床上回想着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幕幕往事：他想起了黄昏中那双火红的眼睛；想起了在大学中的轻松与惬意；想起了他在亨廷顿的啤酒店；想起了他第一次接触了皮姆这样的朋友；想起了咎由自取的白金汉；想起了坦然赴死的斯特拉福德；想起了马斯顿荒原的那颗流弹；想起了不幸灭殒的汉普登；想起了死得干干净净的福兰克尔勋爵；想起了曼彻斯特的懦弱无能；想起了乔伊斯的果敢机智；想起了李尔本的挚着无畏；想起查理的断头……

他有理由为自己骄傲，他用生命来证明他是个伟人。

3日凌晨，克伦威尔又陷入了昏迷，从此再没有说话。

9月3日，对克伦威尔来说是个光辉的日子：

1650年这一天，登巴之役他一举击败了苏格兰人；

1651 年的这一天，任斯特一役，他几乎生擒查理二世；

1654 年的这一天，他召开了护国政体的第一届国会，确定了个人独裁。

而今，1658 年的 9 月 3 日下午 3 点多钟，克伦威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死在了权力的顶峰，令人敬畏而钦佩。

从前，有一个人要爬上山顶去看海，费了很大的劲去开了条路，就要登上山顶了，但他的气力却只能爬到那儿。他没能看到海，却用他的生命告诉了以后想看海的人们：这条路是对的！